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军事家毛泽东



序 言

应中央文献出版社之约，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教授徐焰写了《军事家毛泽东》一书，详细论述了毛泽东一生的伟大军事业绩，并请我作序。我们军队的新一代人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实践，是非常可喜的。就此，我也在这里写上几笔，以表示对毛主席的怀念。

哪一天是毛泽东同志的生日，60年代中期以前在党内军内曾长期是个秘密，就是跟随主席很久的许多老同志也不清楚。三十年前，即1963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突然叫我与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同志同他一起吃顿饭。这餐饭只是多了几个普通的菜，有一点酒，并没有什么太特殊之处，不过，上桌前我还是感到有点纳闷：因为主席生活一向简朴，除外事活动外，在党内请客是很少见的。上桌后，旁边的人悄悄告诉我，才知道这一天是毛主席的70岁生日。由于从我们党进城前的七届二中全会起，毛主席就带头立下规矩，在党内不许作寿，不允许宣传自己的诞辰是哪一天，所以主席一直不说自己的生日，我们也不便向他祝寿。毛主席在70岁生日这天约我们同他一起吃饭的情景，三十年后回想起来还像在眼前。毛主席以身作则，反对党内祝寿，尤其是反对过生日讲排场、铺张浪费，这对于我们党保持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的作风，至今看来还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纪念毛主席，也正是学习毛主席的宝贵思想以及他倡导的优良作风。对于我们这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有着几十年光荣革命传统的军队来说，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活动，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军事家毛泽东》一书的作者徐焰，是国防大学目前最年轻的教授。他虽然出生于解放以后，但是长期从事军事史研究，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著作，过去也有好多次向我问过有关毛主席的军事活动情况。每当提起毛主席的军事活动，总引起我许多难忘的回忆。我从二十年代末参加朱毛红军时起，就一直在毛主席领导下战斗。记得在那极其艰苦的长征途中，我带先遣团过草地前曾接受毛主席当面向我布置的任务，告别时主席见我没吃东西，还把他当晚饭的几个青稞面小馒头让给我吃；解放战争期间我率部进军绥远前，毛主席在西柏坡又向我详细交代了进军的意义及注意事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率第20兵团入朝前，毛主席找到中南海住处，在一同吃饭时向我提出了入朝后的几项要求；后来我在总参工作时，更是经常听取毛主席的指示，当面接受他布置的任务。我在同毛主席几十年的接触中，一直受到他老人家的深刻影响和教育。主席在处理军事问题时有着超出常人的远大战略目光，工作时有着过人的精力，平时深入浅出又充满风趣的谈话也体现了精辟深邃的思想。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毛主席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毛泽东指引下走向胜利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结论。尽管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毛主席在晚年的探索中有过失误，但是他的伟大思想和光辉实践，仍然是留给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认真地发掘这些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事业，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回忆历史是为了服务于现实和未来。今天，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的现状与毛主席在世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风云变幻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挑战。尽管形势有所变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

特别是其对待军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仍然应是我们军队的行动指南。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的宝贵实践，特别是他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也仍然是我们一代代革命军人努力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进一步开展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实践活动的研究学习，这是对他老人家的最好纪念，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衷心希望。

杨成武

1993年10月

军事家毛泽东

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

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如列宁所说：“伟大的革命运动会造就伟大的人物”（《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毛泽东正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巨人。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自1840年“英夷”用圣贤书中从无记载的坚船利炮轰开长期封闭的“天朝”大门，惊醒了四千年的沉梦后，近代史册上所写下的记录就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屈辱挨打的历史。伴随着沦丧国土的悲鸣，强国救亡的呼声也逐浪腾高：

林则徐、魏源首倡“师夷长技”，在军事上开眼看世界，昏愤的朝廷却无动于衷；

曾、胡、左、李以“西学为用”，随之创建了西式装备的陆海军，可是在甲午硝烟中灰飞烟灭；张之洞一曲《自强军歌》，唤起多少学子赴东流入军校习武，然而徒弟却依然在师傅的威逼下接受“二十一条”……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青年毛泽东这一热血男儿得知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后的奋笔疾书，道出那个历史时代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心声。早先曾进入水师学堂、又赴日本学医，后来想在精神上救治中国的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先生，也曾与许多人一起倡导“军国主义”，希望以“斯巴达魂”救治国家的病弱。振兴武备的强国之梦，与救亡与启蒙一道，长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交响曲中的主旋律。

军事上衰弱的中国呼唤军事家，可是在那些洋径滨式的武备学堂中造就的人才中，却多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阀武夫，战场和操练场上又只是一再抄袭德日式的战术教范。即使有如在日本士官学校获头名佩剑的兵学英杰蒋百里等，终身只能在军校讲台上和人少问津的书本上讨生活。当时谁能料到，问鼎近代中国军事泰斗者，却是那个出身于韶山乡间，从未进过军官学校，满身“书生意气”的农家子——毛泽东。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近代湖南，地灵人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如为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的豪言，曾在三湘志士中流行一时。

仔细研究中国近代史，人们可以发现，十九世纪寻求真理的杰出中国人多出于广东，如洪秀全（更准确他讲应是他的族弟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和跨世纪的伟人孙中山。二十世纪的中国英杰却首推湖南，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黄兴、陈天华、蔡锷外，更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以及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的三位——彭德怀、贺龙和罗荣桓。其中，毛泽东更是在政治、军事成就上前无古人的一代奇才。

历史巨人出自三湘，并非由于远古时舜帝南下到此奏过“箫韶九成”，给这座因韶乐而得名的山峰，以及山脚下的韶山冲带来过什么“王者之气”。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如同两块燧石相撞能迸出炫目的火花，两种文化的交会和冲突点上往往会产生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十九世纪的中国广东，正是东来的西方思想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激烈碰撞之地。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广东、上海和武汉等处的殖民地化和西方文化弊端的影响日占优势，清王朝首城北京和西“北内地”又仍被封建腐朽的暮气所

笼罩，地处广州、武汉之间的湖南则在新旧文化、东西思想的冲突中成为主要交会点。近代湖南星河灿烂的一代英杰，恰好在此背景下放射出他们自身的光辉。

清末至民初的湘人，在国内诸省中又以尚武著称。当朝廷和官军对太平天国无可奈何之时，曾国藩、左宗棠等文人以“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连同那个在任现职官的湘人胡林翼，用“保卫名教”的精神动员号召读书人，以重饱和打仗获利的物质刺激招募起“寒谷穷苦之民”。随后，以儒生为统官，贫困愚昧之湘农为兵勇，创立湘军，出省征战十载，平定东南。后人虽然从政治上认识到曾国藩、左宗棠辈以知识分子和落后农民相结合建军的所谓“创举”，只不过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和反动王朝命运的努力，可是当年集文才和武功于一身的“曾文正公”，以及他名下标榜的“湘学”，确实影响过一代湖南知识分子。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名躁一时；青年毛泽东的导师和岳丈杨昌济，也极为推崇曾氏的“经世治用”之道。

毛泽东本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一度最佩服的人物也是曾国藩。毛泽东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为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后来，当毛泽东接受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之后，大概又加上蒋介石奉“曾文正公”为楷模，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毛泽东不再颂扬甚至极少提及曾国藩。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曾氏的一些影响仍然存留在毛泽东治政和用兵之中。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力讴歌，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还风行一时的“正册”、“另册”制度，其发明者便是曾国藩。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大因素，即能不能争取“士人”拥护并参政人营献策，以及可否征集较多的农夫从军，自古代改朝换代的历次战争直至曾国藩等征讨太平天国，就一直是决定胜败的两个关键环节。出身于较为殷实的农民之家，长成后又出外求学的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恰好具备了既熟悉农民又兼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色这两方面的条件。“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环境和历史就是这样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后来一系列的回忆中对他的父亲没有说过多少赞扬的话，这位靠辛苦劳作起家，已经走上“小康”之路的富裕农民毛顺主，重的是实利，为人又有些刻薄。对于长子毛泽东，他多年当作小长工使用，所供给的伙食还不如雇工的待遇。不很和睦且时有冲突的父子关系，在家庭内部造就了毛泽东倔强和善于反抗的性格。毛泽东在解放后曾对堂弟毛泽连说过，正是由于他父亲为发财不顾骨肉之情，乘其二叔困难而买下人家赖以生活的七亩田，才使毛泽东认清只有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这段生活经历，确使毛泽东远比其他出身富家的知识分子更深刻地了解农民的特点及苦难，为他以后从事农运和“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基本上是唤起农民），奠定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基础。

毛顺生虽然以受毛泽东谴责的手段积蓄起了部分钱财，然而恰恰是由于有超出普通农民的这一经济基础，他才能够经过亲友劝说和毛泽东本人的争取，供给儿子离家外出求学的费用。靠家庭的资助和本人的勤奋，青少年毛泽东走完了从读孔孟之书的私塾，到新旧学校特色兼备的湘乡高等小学，最

后进入近代新型学校——湖南第一师范之路。古老与近代、传统和未来、穷乡和城镇，这多种不同文明和特色的交会点，恰好集中到毛泽东身上，并使他具备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特点。

本世纪初期中国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还有那一大批国民党内的留学日本和西洋的归国知识分子，包括当时还为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奋斗的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与他们相比，毛泽东的人生取向始终截然不同）那些后来的“党国要人”们毕竟出身于富家，以后的革命活动又一直是混迹于军阀、官僚之中排阖纵横，乃至最后同流合污，背叛了革命（当然是指背叛了民主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共产党）。毛泽东的出身虽然不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并没有怎么亲身受过地主的压迫，但是他的同情和立足点却始终在社会下层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一边，革命的基本宗旨是为他们谋幸福。直至他晚年位居全国之首，面对国内外出现的各种矛盾，同情之所在还是国内下层群众乃至受压的“造反派”，在国外也始终支持第三世界穷国乃至美国黑人，其初衷确实终身不改。

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其他领导人相比，毛泽东是出身于最下层者之一（据说只有原是铁路工人的项英家境更苦），而且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最广，对革命的策略思虑谋划最深。他没有陈独秀等人的书斋迂腐气息却有其学者风度，他不像王明一类纨绔子弟式的夸夸其谈而更善于争取群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几年，领导核心经“五朝更替”，最后全党选定了毛泽东，这与青年毛泽东的素质也是紧密相关的。

毛泽东青年时的志向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本人的职业选择却长期倾向于教师和报人，希望以讲坛和纸笔来唤起民众。他的一手好文章，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到长沙师范都被老师们称赞备至，在那个时代原可作为头等进身之阶，可是他却视万户侯如粪土，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以其超众的才华走上一条冲脱世俗的反社会潮流的新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正所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一阕《沁园春》，正道出岳麓山下、桔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的理想和追求。

求学时的毛泽东，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一直进行冷水浴、日光浴、游泳、登山、体操和露宿等活动，甚至故意不带钱而远途步行当文明“乞丐”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弱书生完全不同，近似古代斯巴达人的苦行僧式的磨炼，是由于青年毛泽东痛感以天下为己任需要坚强的躯体和意志。毛泽东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能有过人的精力和一往无前、不畏挫折的意志，正是由于在此时准备了基本条件。

处于近代中国政治风潮中的毛泽东虽然长期立志求学，可是标榜“经世致用”的湘学影响，以及他同情受苦人民和决心改造社会的人生目标，又使得他在斗争风暴袭来时不可能与兵事无涉。少年毛泽东就曾佩服暴力造反，同情长沙抢米的“暴民”，视因起义被斩首的哥老会首领彭铁匠为心目中的英雄。当毛泽东年满18岁时，正值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又马上弃笔从戎，在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了半年士兵。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指挥军队，只是革命的激情使他感到从军比读书更为重要。虽然他所在的新军没有上过战场，在军营中他却也受过一个士兵的基本操课训练，据说托四把枪和单个教练的成绩还相当可以，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凡猛将必起自伍卒”，亲身以士兵身份经历军营生活的实践，对这个没有受过军校训练却在日后担当统帅的人，无疑

起到了重要的军事课目的奠基作用。

由于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革命既不存，从军就失去意义，毛泽东主动退伍回到学校。进民国后的湘境却再无宁日，南北交通要冲的地位，使湖南中心地带尤其是长沙附近成为军阀们交兵的重要战场及通道，第一师范的书斋里也时闻枪炮声。为保卫学校，校内曾组织了业余的“学生志愿军”，有过当兵经历的毛泽东被选为连长。1917年南北军阀混战时，北军从长沙败退，其傅良佐部混成旅的部分溃兵乘乱在城南郊抢劫，一时全城恐慌，学校也要学生暂避。这时，“连长”毛泽东却挺身而出，指挥愿意听命的一百余名“学生志愿军”和南区一部分警察，只以少数枪械和木枪、爆竹出城迎击溃兵。在接近攻击对象时，毛泽东利用溃兵混乱无组织和欺善怕恶的心理，先以开枪和燃爆竹威吓，再施以喊话和许诺缴械即给资遣散相争取。终于使大批溃兵不战而缴枪，从而保证了市区的安宁，也向全校显示了毛泽东的组织才干和谋略水平。这次动用了武力和真枪，却又不战而胜的短途征讨，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出马即大获成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当过兵；在第一师范又以指挥收缴溃兵枪械一事得到同学们以普鲁士近代军事家“毛奇”相称的美誉，而此时从外表和气度举止看，他无论如何也不像军人，却像那个时代浪漫而又有些不羁的书生。这个高大英俊的男子不大修边幅，经常长发垂耳，也不愿整理内务和遵守作息时间。毛泽东虽然在第一师范和农讲所时常督促他人习武，自己却与一些行伍出身的人不同，从不喜好摆弄武器，只是酷爱书籍。这些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曾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过交往的尼克松对两人的外表对比后，在《领袖们》一书中评价说，蒋介石的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毛泽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写字信笔成书、不拘俗套，房间杂乱无章。然而，后来在战争较量中大获全胜者，却是这位从军人仪表上看来并不很及格的毛泽东。

进入二十年代后，毛泽东经历了由从师孔孟儒学，信崇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康德等人乃至追求日本新村主义的道路，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其后着力于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以后在改组的国民党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不久又在广州、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截止1927年大革命失败，仅34岁的毛泽东虽然从事社会活动只为时几年，就已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以至国民党政府在全国首批“清党”的通缉名单中也将他与陈独秀等人并列为头十几名之内。从这时毛泽东所具备的个人素质来看，他已经是一个初步成熟的革命家、政治家、策略家，一个擅长领导群众特别是有“湖南农民之王”称号的组织家，一个长于思索和思辩的哲学家，同时又是书写古文、时文都才华横溢的文章家，还是一个具有浪漫想象气质的诗人。然而，这时的毛泽东恰恰不是军事家。直至此时还未想去搞军事的毛泽东，却已经具备了世界近代战史上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所概括的一个优秀统帅所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坚定的个性、过人的勇气、深谋远虑及优等的才学机智，而且这几方面能够均衡发展。当历史呼唤他从事武装斗争时，这些素质很快就在军事舞台上放射出惊人的异彩。

群雄并起，时势造英雄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史册上，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批从事武装斗争和研究革命战争的人。可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却把毛泽东等大多数共产党人推向了军事斗争的第一线。当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一起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后不久，这位不久前还“风华正茂”的书生，就在群雄竞争的战争舞台上创造出比他人更加辉煌的业绩。

古往今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是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投身武装斗争，正值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组织暴动之时。看看中国革命史记载，当时有南昌起义、湘赣边的秋收起义、湘鄂边的洪湖地区起义、广东海陆丰的三次起义、赣东北的横大起义、鄂东北的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不到一年，一百多次武装起义的烽火就燃遍了大江南北。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为毛泽东在井冈山高举红旗创造了基本环境和政治气候。

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党”的屠刀四处挥舞之际，还能举行如此之多的武装起义，很大程度上在于自 1924 年黄埔军校创建开始，部分共产党员已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军事工作的重要基础。这一基础，包括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群众准备几个方面，为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创造了基本的客观条件。

武装斗争的思想基础，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并载入党的一大党章，见之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自 1922 年以后在公开文章中关于应建立革命军队的论述，以及大革命时期对苏俄红军建军经验的许多介绍。从建党至北伐期间没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条件。自 1926 年北伐开始之后，党中央的文件和瞿秋白等领导人的文章中，都提出过武装暴动的准备问题。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问题上也是“以俄为师”。其准备的暴力革命程序，也是先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搞“二月革命”，待消灭北洋军阀后条件成熟，再以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搞中国的“十月革命”。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的“克伦斯基”蒋介石、汪精卫辈却不待“二月革命”成功，刚刚北伐占领了长江流域，就决心“清党”，一个“四·一二”大屠杀，又一个“七·一五”“分共”，搞得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措手不及。原先准备在北伐统一全国即中国“二月革命”成功后再独立进行的武装斗争，这时被迫急忙发起。好在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从入党时起就信奉暴力革命学说，既有思想准备，行动提前，就只是步伐仓促了一些。

武装斗争的组织准备，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培养出一大批通晓军事的骨干，有了自己控制的一部分军队。1921 年党的一大后，虽然武装斗争还远未排上日程表，却已有部分党员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1921 年冬，中共旅俄支部派出肖劲光等人入红军学校接受初级军官训练，开中国共产党人学军事之端。

国共合作建立后，在“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的歌声中，中共各地组织先后选派了大批青年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周恩来、聂荣臻等一批共产党人还在学校中任教，和校内的苏联顾问一起创立了军队内的革命政治工作。自 1924 年 5 月黄埔军校开办，至 1927 年春夏国共彻底决裂，黄埔军校及其各地的分校共培养出 1 万多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成为蒋介石的起家班底。可是在这六期黄埔生之中，却也有 3000 余名是共

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共产党武装的参加者，这些人构成中国共产党最早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种子。特别值得书写一笔的是，当时共产党的军事骨干之中，以两湖（湖南、湖北）人比例最大，这正是由于当地共产党力量较强，党的领导对军事工作又比较重视的缘故。加上两湖距离广州又近，该地区的青年读书人还有尚武传统，当地党组织能够派较多的人去投考军校。这一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在当地进行武装斗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湖南的革命力量虽强，反革命的武力及其传统势力更强，在湖南燃起的武装斗争火种后来转向湘赣边界，又在江西形成燎原之势。

有了革命的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开始前建立了自己领导的军队。1924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以周士第等刚刚毕业的第一期共产党员黄埔生为骨干，会同工农积极分子，在广州建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建队时官兵不过120人，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这支“铁甲车队”其实并不驻在大元帅府，队部在郊区大沙头。部队成立后即配合广东工农武装行动，参加了打击地主海匪武装、封锁香港等战斗，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工农子弟兵的本色。

1925年11月，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一个团的正规军队。除了提拔铁甲车队原有的骨干当干部外，陈延年、周恩来等区委负责人又派出一批共产党员黄埔生到团内担任军官，再按旧军队的雇佣法招募士兵，以刚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叶挺为团长，于广东肇庆成立了第4军第34团，翌年改称第4军独立团，这支在北伐开始前只有2100人的部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山始祖（该团的老底子于解放后分别留在第16军第46师和第43军第127师）。

北伐期间，叶挺独立团在战功最为卓著的第4军中又以战斗力最强著称。北伐攻克武昌后，第4军获得刻着“烈士之血，主义之花；铁军威名，远近弥遐”字样的铁盾，被人们称为“铁军”，叶挺独立团又是铁军中的骄傲。“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着先烈的殊勋。……”《新四军军歌》的头几句，即道出了“铁军”的光荣历史。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后期扩编为第24师（辖第70、第71、第72团）、第25师（辖第73、第74、第75团）和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其中第73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而第74团是国民党拨给的，虽归第25师建制，却不是共产党的武装，后来在南昌起义时也拉不走。所以统算起来，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叶挺独立团扩编为6个团，当时如果不是受右倾思想影响，还可以再扩充一些。

此外，当时武昌中央军校学生（即黄埔第6期武昌分校生）多数受共产党影响，被称为“赤子赤孙”。武昌国民政府“分共”后，军阀张发奎还想利用这批军校生，将武昌中央军校第六期剩余的学生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这样，由叶挺独立团扩充而成的6个团，加上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这为数7个团、总共：万多人的兵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时拥有的基本武力，也是在1927年下半年发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暴动的骨干力量。

南昌起义以第24师叶挺部、第25师周士第部为骨干，加上原由绿林武装改编、当时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第20军贺龙部，以及蔡廷楷部第10师

（该师参加起义很勉强，不久即叛逃，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十九路军）发动。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原为叶挺独立团老底子的第25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辗转奔向湘南，后又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四军战斗力量最强的第28团，团长先后为王尔琢、林彪。

秋收起义以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因警卫武昌国民政府而通称国府警卫团）为骨干，会合萍浏农军和安源矿工武装发动。起义失利后，工农武装多溃散，毛泽东率领作为起义军第一团的原国府警卫团剩余的不足千人走上井冈山。该团后来成为红四军第31团，是朱毛红军的两支骨干之一。追根溯源，第31团与第28团同出于叶挺独立团的母体。

广州起义由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为骨干，会同市内工人武装发动。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撤出市区，奔向当时在中国最早建立了农村苏维埃政权的海陆丰，可惜这支部队连同海陆丰根据地不久即全部失败。

上面的追述和铺垫式的描写，不大熟悉历史的人看来可能会有些吃力。然而列举这些军队番号 and 事件，正在于说明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有着其承前启后的历史继承性，并且是在一定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开始的。

进行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所唤起的民众，特别是经过轰轰烈烈的农运所动员和影响的广大贫苦乡民。查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地图，人们就不难发现，早期的武装暴动和随之建立的红色根据地大都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东南几省，其原因正在于此。

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至国民党逃离大陆，几千年来一直以农立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占国民绝大多数的“载舟之水”——农民，虽然在封建重压下被剥夺了发言权，可是他们的动向却决定着王朝的覆亡和天下的兴衰。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只有两个时期，当奴才的时期和当奴才而不可得的时期，这对旧式农民最为贴切，他们受尽压榨尚可苟活时，就只是“沉默的多数”；一旦上逢昏政，下遇凶年，就会“弱者辗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农民起义的风暴便要改朝换代。不过在古代，这种危机的成熟和社会大动荡的轮回往往上百或几百年一次。进入近代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外来的商品和鸦片打乱了旧的生产结构，民国年间的战乱和横征暴敛又日甚一日，农户破产，饥民盈野，已造成危机无日无之，形成了干柴遍地、只待火种的情形。1927年“分共”后的国民党，又已经出现了其内部也承认的“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局面，即与北方军阀和各地豪绅同流合污。中国农民对过去喊过“扶助农工”、许诺过“减租”而不实行的国民政府彻底失望，这就给国民党的统治准备了为数最众的掘墓人。

有了掘墓人这个革命条件却远远不等于革命就能够成功，发动农民有其独特的艺术。中国旧式农民因苛政猛于虎，揭竿奋起造反，自古常有。近代因官逼民反而“落草为寇”的山大王，为数则更多。可是作为现代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先进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其领导者，要诱发起他们的革命性并克服其落后性，引导其走正确的道路却决非易事。例如：毛泽东上井冈山前，当地部分农民因官绅压迫所拥戴的造反领导者，就是当时还具有“土匪”头衔的王佐，其组织形式还是摆香案、拜把子、喝血酒之类。这类旧式农民武装在古代也许尚有推翻旧王朝的希望（纵如此也只能重蹈封建政权的

老路)，在近代却不可能成就任何大气候。对于这些代表十分落后的生产方式、却又蕴藏着极大的反抗旧世界的革命性的农民，陈独秀等满身书斋气的共产党领导人只是以“叶公好龙”的态度不愿接近和深入，而熟悉农村情况的彭湃、毛泽东等却以满腔热情和全身心的投入去进行当时党内多数人还不愿做的工作。北伐开始后，在同样是农民占人口多数的俄国取得革命成功的斯大林也向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于是，在国民党尚表示“容共”并公开宣布“扶助农工”政策的情况下，一批独具慧眼的共产党人就以合法的身份将农民运动在粤、桂、湘、鄂、赣等几个省内发动起来，从1926年秋至1927年春几个月内，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村革命高潮。

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当时就曾众议纷坛。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谈论“左”时，对当年一些需要矫枉的“过火”行为及其对后来的影响，许多人也感慨至深。其实，对于革命初期的一些幼稚行为，正如成年人不能嘲笑自己孩提时尿床一样，应该加以正确理解。在中国长期死水一潭的封闭状态下，一旦打开农民仇恨洪水的闸门，出现口号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打击面过宽现象就不足为奇。此外，“勇敢分子”往往最先起来造反，也会出现“地痞流氓，革命先锋”的情景。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早版本中所提到的农运积极分子们，许多是过去打尖的、踏烂皮鞋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农运蓬勃兴起后，社会上一切守旧势力都极度仇视和谩骂农民运动，称其为“痞子运动”。中国近代史上以反对维新和顽固守旧著称，又是湖南名儒和金石古文字学家的叶德辉，曾给农民协会成立大会送去这样一幅对联——“农运久长，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全是畜生。”横批则为“斌卡尖傀”，即不文不武、不上不下、不小不大、不人不鬼之意。叶德辉随之被他所激怒的湖南农民协会逮捕，旋即受公审处决。杀掉叶氏时，毛泽东正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后他从社会影响等斗争策略角度出发，以及出于读书人对学问家的一些特有的顾念，对此曾认为是失策并表示惋惜。然而，与站在群众运动之上和之外指手划脚的陈独秀等人不同，毛泽东从整个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对农民的感情出发，高呼这一运动“好得很”！后来，毛泽东还说：“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避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60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确实，我们如果从历史发展的主流来看，无论当时的农运在政策策略水平上存在多少问题，但是其大方向和伟大功绩无疑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的大旗下，过去长期受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欺压。愚弄、麻醉的千百万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夫村妇，此时终于明白了他们应该享有人的尊严、地位和民主权力（这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人权”），他们耕种而地主享受成果的田地应归自己所有。同时，他们又用粗黑的手，把象征侮辱的高帽子加在过去侮辱他们的土豪劣绅头上，将其游街、到豪绅的小姐少奶奶床上打滚。于是，过去似铁板一块僵死的农村，由共产党启发农民觉悟，发展到农民和地主公开形成阶级对立，又迅速进入到对土地、政治权力提出要求的社会革命，而且其势如疾风暴雨。正像西方人所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一旦偷尝了禁果，就再也不可自抑人的本性一样。这时，代表着一个苦难阶级的千百万人突然猛醒，朝着解放的道路

奔跑，确实什么力量都不可阻挡。

农民运动所带来的复仇和重新分配财产、土地的要求，使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湖广大农村很快出现了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那些被戴了高帽子游街，被抄家或“杀猪出谷”的老大爷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组织其掌握的地方武装挨户团，动员了其正在北伐军中当军官的儿子们，在国民党“分共清党”的旗帜下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扑过来，一时无数农运积极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多数农民刚刚获得的一点权益也全被夺回。那些尚存的农民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们，此时到了非鱼死即网破，不进行武装反抗就无法生存的地步，即如同毛泽东后来一度最欣赏的剧目《逼上梁山》的情景一样。从哲学上讲，这是以激化矛盾来彻底解决矛盾，首先破坏原有矛盾存在的基础，迫使矛盾激烈冲突以达到重新组合，从而实现社会变革。这种动员群众、激化矛盾并引导其走上变革之路，即是革命家的作用所在。毛泽东等人所发动领导的农民运动，又成为中国大地上促成这种社会变革的最为有力的杠杆。

在农村矛盾激化到白热点，遍地是土豪劣绅反扑的血雨腥风，又处处是农民积愤待发之时，“红旗卷起农奴戟”的起义时机就终于来临了。正因为如此，大革命失败之时，在有过农运基础的许多地区，共产党人登高振臂一呼，顿时应者云集。“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在这样的口号声中，就出现了毛泽东诗词中描绘的场景：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在深入农村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武装起义的烽火在南方数省到处燃起，此伏彼起，前仆后继。这些暴动出身的农民，如同《水浒传》中交了“头名状”、取了“生辰纲”的上山好汉一样，已经与官府和上豪结下了血海深仇，再无退路，又加上共产党的教育引导，因而在后来异常艰苦和漫长的征途中能坚持战斗到底。根据这一经验，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又一直是以农民渴求得到的土地和发动对地主的斗争，来动员贫苦的乡村群众，从而为人民军队提供了最广大的取之不尽的兵源。

我们到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武装起义时的旗帜，会发现上面的图形并不是来自苏联、以后成为共产党人标准徽记的铁锤和镰刀，而是中国农村的木犁或镰刀斧头，并没有象征工人的铁锤。这一旗帜上的“中国特色”，也反映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自身特点。新式的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再加上共产党的领导，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驾驭这三项内容时，对每一项都堪称最高明的大师，也就被历史推到了战争最高领导者的位置。

中国的社会环境，又使中国农民具备近代军队所需要的优秀士兵的各种潜能。长期的封建宗法制所造就的等级服从习惯，艰辛劳作所锻炼出的坚强意志和对恶劣条件的生存适应性，悠久文化传统所培养的机敏才智，为摆脱

生活极度苦难而奋斗时对生死感到漠然，这些恰恰是许多生活优裕的西方国家士兵所不具备的。从清未来华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直至在印缅和朝鲜战场上和中国军队打过交道的美国军事人员，都曾不无惊讶地发现，中国兵除了许多人体力差一些，在其他方面都具备第一流士兵的素质，其战斗能力的发挥关键在于领导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创造的军事奇迹，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发挥了中国农民的传统优点，又克服其保守、散漫等缺点，终于将这些本属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培养成先进军事科学指导下的出色战士。

总之，在毛泽东于 1927 年正式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时，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的集体努力，已经在军事舞台上准备了布景、道具和演员。当然，剧目是否演出成功，则要看导演的组织领导才能。毛泽东在军事上高于他人之处，恰恰在于以同样的条件，却能导演出更加威武雄壮的活剧。

毛泽东于领导武装斗争起步之时，除了本人政治、文化和体魄等方面的优越素质外，在事先就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武装斗争所进行的思想、组织和群众条件的准备，在这些方面都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在思想准备方面，毛泽东早在 1920 年 12 月复信远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时，就表示完全同意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并认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采取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方式。在组织准备方面，毛泽东虽然没有像周恩来等人那样亲自参加军事工作，却也曾选送过于部习武，并在主持广东、武昌的农讲所时要求学员必须进行军事训练。在群众条件的准备方面，毛泽东则做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最出色的工作，曾亲自投身并长期领导农民运动。1927 年以前的毛泽东虽然无意于自己亲自担任军队和战争的领导，却也在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中锻炼了身手，这些，无疑为他日后在战争领域大展宏图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国革命战争史证明，是历史造就了毛泽东，而不是像过去造神运动时所描绘的那样是个人造就了历史。如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03 页）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正是站在继承先贤、启发后昆的历史交会点上。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又反作用于时势，以其改造社会的伟力重写历史。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灿若星河的群雄之中，毛泽东堪称一颗最为光彩夺目的启明星。

走上独特的革命“山大王”之路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历史潮流中随浪逐波者，只是常人之举；取于反潮流超出常轨者，方成伟人之业。1927 年大革命失败时，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这固然是人们应该称道的精辟总结，不过在这一时期党内许多人的认识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一程度，党中央也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独特超众之处，正在于提出了“上山”这一主张，随即又以率军上井冈的实践，向全党开创并展示了一条在中国唯一正确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 1927 年那个“烟雨莽苍苍”的春夏，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

后，反动军阀许克祥也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反共的“马日事变”，这时党的领导集体内就已经有许多人主张共产党独立进行武装斗争。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决定“分共”后，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然而这时共产党人的目光，还普遍瞄准着城市，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挥者”。在这种“城市中心论”指导下，以土地革命为旗帜发动农民暴动只是作为直接夺取城市的一种辅助手段。

南昌起义，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掌握的绝大部分军队，起义后的攻击目标仍是南下取广州，再接受苏联的海路援助，开办共产党的黄埔式的军校，练兵扩军，然后搞一次共产党的北伐。

秋收起义，虽然主要是在农村发动，可是根据预先的计划，也是安排各路起义军在湘东发动后“取浏阳直攻长沙”，夺取省城。

广州起义，更是以直接占领广州为目标，一度占领城市后即转入守城战，企图保住广州再进而夺取全省。

即使在那个中国最早建立了农村红色政权的广东海陆丰，共产党人斗争的目标也指向县城。刚刚占领了县城，就把只有小操场那么大的片镇中平地命名为“红场”，严然是克林姆林宫前阅兵者的气概。

后来者无法苛求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为历史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认识水平。这一阶段在党内普遍信奉的武装斗争模式，只是共产国际确定、马列“本本”上载明、俄国人已经做出先例的城市暴动道路。共产党又是产生于城市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怎么可能想到以极其落后的、封建宗法制统治下的农村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呢？

可是这时中国却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毛泽东。在武装斗争的道路问题上，他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并冲破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条条和框框，体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中国传统格言“实事求是”和湘学提倡的“经世致用”传统，加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态度，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毛泽东与同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一同主张进行武装斗争时，就已经显示出他的一个独到之处，即超出当时人们仍认为是金科玉律的城市武装起义模式，主张“上山”。在1927年5月下旬的“马日事变”使湖南形成一片白色恐怖后，毛泽东自报奋勇回湘担任临时省委书记。6月底掌握两湖军事大权的湖南军阀唐生智公开表明了反动态度，武汉国民政府转向“分共”已势在必行。这时，由毛泽东主持的省委立即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其中就提出保存武装的方法——“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则将枪枝分散埋入土中”，同时还出现了“上山学匪”的提法。这一文件的主要精神还是隐蔽力量，但是在列为“次之”的计划中，已经表现出“上山”的思想萌芽。

同年7月4日，毛泽东又在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发言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上山”的思想，认为革命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武汉参加了确定开展武装斗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八七会议”。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布置各地的武装起义组织工作时，曾为毛泽东这位在湖南知名的人物回湘后活动的安全担心，好意地建议他到上海中央工作。毛泽东则表示，要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

上山和绿林交朋友，虽含有毛泽东习惯的诙谐幽默之意，却是一种严肃的政治表态。随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并与当地的山大王为伍（当然后来是改造他们而不是将自己降到他们的水平），其思想基础正在于此。这一思想，在当时主张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可谓最高明的真知的见，这也预示着毛泽东将为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独辟一条蹊径，并从此走上带有显著中国特色的军事家之路。

独具慧眼的见解，在于与众不同的实践道路与高出他人的理性总结。自幼生活在农村，以后又周游南北大城市，有过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双重经验，在国民党内任过职并熟悉其情况，还有当兵的经历和理论家的深邃分析，这使得毛泽东在当时多半出身于城市学生的党中央领导人中，对国情和形势发展的认识比他人更深刻。在当时的中国，反动统治者以城市为据点，并掌握强大的军队，只有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山乡，才是其薄弱环节。当时中国的人口百分之九十又在农村，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又已在农运中充分显示出来。在这时“上山下乡”，革命者才有进行武装斗争和建设军事力量的广阔驰骋之地。

这时毛泽东的“上山”思想，除了蔡和森当即表示赞同外，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还难以接受。湖南省委和一些领导人对此也不理解，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绝大多数干部又系出身黄埔军校的学生官，对于“上山学匪”更感到大谬不然。甚至毛泽东本人在此时此刻，对于当革命的“山大王”这一独创能否成功也不无疑虑。因此从“上山”思想的提出到进入上山的实践，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毛泽东到湖南布置的秋收起义，仍是以各路起义军会攻长沙为目标。在起义前的8月20日，毛泽东为省委起草的《湖南至中央函》，也雄图颇大他说明了对形势的看法及起义的目标：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03页）

这段话，与毛泽东前一段提出的准备“上山”的意见似乎有些矛盾，可能在当时党内普遍过“左”的气氛鼓动下，毛泽东头脑的热度也一度升高，认为中国“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不过亲自深入斗争实践的人，最容易纠正自己的偏激。秋收起义一经发动，本身即没有达到预想的规模。参加起义的农民武装数量不多，暴动地区亦少，工人武装除安源外几乎都未组织起来。结果“霹雳一声暴动”后不过几天，三路起义军都在优势敌军的反击下受到重创。这时的毛泽东立即表现出高度的清醒，马上决定停止执行进攻长沙的计划，在文家市集合了工农革命军，随后向罗霄山脉南段进军。

过去几十年间的许多党史书上，常常认为秋收起义部队自文家市南下目标就是井冈山。近年来经考证，可看到历史事实并不尽如此。秋收起义部队失败后，领导者的意见多是南下寻找南昌起义后去广东的叶、贺部队，工农革命军行动的部署也是以此安排的。一直走到井冈山脚下的古城，部队还没有上井冈山的打算。

10月初，南下部队突然听到叶、贺部已经在潮汕失败的消息，形势的急

剧变化，使领导人心中的潜意识猛然爆发出来。在工农革命军中担任主要军事领导责任、过去颇有名气的共产党员黄埔生余洒度、苏先骏对前途完全悲观失望，以向上级汇报之名离队而去，走上脱离革命的道路，许多军官也步其后尘。一部分干部则主张以过去的方式继续攻城占地，依此而行实际上只能迅速招致灭亡。力排众议的毛泽东，这时开始把他“上山”的思想付诸实践，决定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安家，并与当地武装王佐、袁文才搞好关系，从此走上一条唯一正确的武装斗争之路。“跨上通往井冈山的道路固然是形势所迫，属于“逼上梁山”，却是毛泽东人生道路所造成的历史必然。上山起步之时，很大程度上仍是在探索，对其意义在理论上并没有总结，翌年才开始将其概括为“工农武装割据”。但是迈出这一步，却为整个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笔者去过井冈山多次，那儿近年已是公路四通八达，风景如画的参观旅游胜地。据当地干部讲，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时，地方领导曾问主席对此地的观感，特别是问这里建设得好不好。毛泽东深有感慨他说，好是好哇，可是当年如果是这样好，就建不成根据地了。确实，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早期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往往都带两个字：“山”和“边”，都是交通不便、闭塞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如今的扶贫重点“老、少、边、穷”地区，只是少数民族区域，当年不适于建立根据地，并已为红四方面军在西康藏区的困窘及西路军在甘肃河西回区的失败所证实。而各，省疏于管辖的边区、穷困之地和山区（三者往往都集为一身），正是建立红色政权并实行武装割据的大好条件。井冈山在湘赣边、大别山在鄂豫皖边、桑植山区在湘鄂边、大巴山在川陕边……对这些边区山地，高居城内的反动者统治往往疏于防范，即便派兵进剿也是路途艰险、进军不便，难以携带重火器，加之官兵叫苦连天，无法久战长驻。

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落脚几个月，改造了山上的王佐、袁文才部，扩大了队伍，并在山下打土豪，消灭地方反动武装，还相继夺取过周围的几座县城。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吸收秋收起义失利的教训，并不留恋城镇，只把攻城看成歼敌、筹饷和扩大影响的手段，自己的后方一直放在井冈山上。有人计算过，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在山下住的时间超过山上，对根据地的中心也有山上的茨坪和山下的茅坪之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时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根扎在了山上，大部队和毛本人在山上住的时间不长，关键在于给养困难。而且不论山上或山下，也都是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上井冈山大展身手的最初几个月，除了当地民团等反动武装因切肤之痛而与之交战外，湘赣两省的军阀迟迟未出动正规军前来，这与对城市或邻近城市地区的起义的反应，确实截然不同。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特有的军阀割据和相互混战，也给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统治缝隙间建立根据地提供了天赐良机。革命有了这样一个立足点，刚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暴动受挫的共产党人，终于得到了休养生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在湘南发动起义后难于立足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合，声势壮大，一时威震湘赣和南方数省。刚刚为城市暴动纷纷失败而苦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都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井冈山从这时起，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光辉旗帜。黄克诚于1980年针对社会上一些否定毛泽东的思潮有感而发的讲话中，对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道路的意义作出了非常公正的评价，他说道：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对我们中国革命关系非常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黄克诚回忆录》（上）第3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进行武装起义，道路不同所得到的不同结果。很快验证了过去从来没有带过兵、从未指挥过实战的书生毛泽东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南昌起义是规模最大、集中兵力最多的一次起义。参加者不仅有正规军5个师2万余人，领导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如周思来、张国焘、李立三、谭平山等，以及国内军界已经闻名的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名将。可是队伍却在南下远征的道路上被拖瘦，并在潮汕地区的正规战中被打垮。主要领导人离队赴上海找中央之后，朱德、陈毅等率余部不足千人到达湘南，后又走上井冈山，才重新获得了生机。

广州起义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却由中央领导人张太雷等和隐蔽在领事馆内的苏联顾问亲自指挥。起义骨干——拥有1300余人的教导团由军校学生组成。都是当时难得的可充任军事干部的人才。起义后由于坚守城市与强敌对垒，不到三天就遭失败。余部奔向海陆丰后，又把军校生当普通战士使用，在硬打硬拼中仅几个月，就把这些宝贵人才大都耗尽。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队相比，无论从领导干部的参加者、部队的素质，以及军事骨干的数量看，都要弱很多。可是由于毛泽东超出了革命战争过去的常轨，当上了革命的“山大王”，就能够保存力量并建立起红色政权。当然，这时的红色政权只是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坚持实行狭小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还谈不上以农村根据地去“包围”城市（真正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因日寇占点、线，八路军占面才形成对其包围之势）。然而这一创举，为中国革命战争指明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途径，很快成为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进行军事斗争的一面旗帜。

在全国各地的起义暴动的成败结果面前，井冈山的斗争及毛泽东本人的威信在全党迅速得到提高。1928年6月至7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对农村根据地的认识有不足之处，但是仍然很重视井冈山斗争成功的经验，并以此为主要借鉴材料，制定了在全国各地创建根据地和红军的规划。在这次大会上，远在国内山中的毛泽东也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为中央委员。

不过，由于党的“六大”强调党的领导人中增加工人成分，毛泽东既非工人又远离中央，所以在政治局委员中并未列名，党内的军事工作也仍由周恩来全面负责。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武装起义仍继续发展。而且这时的起义与前一段以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暴动不同，起义后基本上都转入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毛泽东和井冈山的斗争，又成为许多新创建的根据地和红军的榜样。朱毛红军虽然与其它多数根据地并无隶属关系，但是通过中央军委的介绍，井冈山的经验仍然传到各个新创建的根据地中。

与毛泽东是同县乡亲的彭德怀在湘东北领导了平江暴动，成立了红五军，随后在湘鄂赣地区建立了根据地。不过，平江起义的这一个团旧湘军是

由“闹饱”（即反对官长克扣士兵军饷）为动员口号发动的起义，真正当上红军后，生活反而比“欠恫”时更苦，许多官兵开小差，打仗时甚至有成连叛变者。如何改造军队，如何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许多问题对于这位刚刚由湘军团长成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都是难解的新课题，于是他产生了向毛泽东学习的念头。尽管彭德怀过去与毛泽东并无交往，但是他早就对井冈山的榜样钦慕已久，曾在诗中赞道：

“‘马日事变’教训大，
革命必须有武装。
秋收起义在农村，
失败教训是盲动。
惟有润之工农军，
跃上井冈气象新。
我欲以之为榜样，
或依湖泊或山区。”（《彭德怀自述》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此时，彭德怀对毛泽东的看法，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的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二八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同上书第112页）

由于有了这个看法，彭德怀主动率队奔向井冈山，去学习红四军的经验。上山后正值敌军“会剿”，他接受了守山的任务，并担任了红四军的副军长。其实，“红五军”的番号当时是党中央给的，身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在组织系统的关系上并非朱毛的下级，而是平级。此举正反映了他拥戴自己敬仰的毛润之“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

同一时期，鄂豫皖地区的党组织在黄麻暴动失败后，也提出了学井冈山的榜样。他们通过在大别山区的奋斗，创建了后来成为驰名中国的将军摇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和第二大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基础。

湘鄂西地区革命武装也响应井冈山的斗争，创建了苏区并建立起另一个红四军，随之发展成为红二军团，以后成为构成红二方面军的两支主力之一。

在广西左右江，也成立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的红七军、红八军。以后，红七军主力又进行了一次七千里长征，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加入了朱毛红军的行列。

井冈山的威名远播，不仅使革命者为之振奋，也使全国反动统治阶级开始为之担心和恐慌。国内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朱毛的消息，尽管多出于污蔑不实之词，却也更进一步提高了其知名度。毛泽东在家乡的田产本已被国民党没收，算作党部财产租给农民，可是耕地的农民时时认为毛泽东很快就可能回到家乡查看，因此不敢砍掉地里的一颗树。湖南省主席、军阀何键“剿共”技穷，曾效法古时“泄王气”的办法，派一连兵来挖掘毛泽东的祖坟。可是带队的军官仍为毛泽东的威名所慑，只敢夜间行动，结果不仅未挖到真坟，其家人还认为日后毛泽东若得天下，将会有灭九族之祸，因

而抱怨不已，使此人惊惧而成疾，未待毛泽东真得天下就一命呜呼。当时，就连国内其它省份闭塞的穷山僻壤中的土豪乡绅们，也有许多人知道赣省出了令其胆寒的“朱毛”。不过他们所了解的还只是：“所谓朱毛者，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仍是满身文人氣息，曾表示“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何长工：《伟大的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在朱毛会师举行仪式时，毛泽东身兼师长，以新鲜之感挎了一下匣子枪，并诙谐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会师仪式一结束，毛泽东就把枪交给警卫员，此后再也未见他带枪（陈士渠：《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可是武装斗争的历史需要，却已经把这位始终不愿带枪的“文人”推上了“革命山大王”的位置，而且在随后的群峰竟立之中，又被拥为中国革命军队的全军统帅。

井冈山斗争为时不过一年多，在毛泽东几十年漫长的军事生涯中确实算是短短的“弹指一挥间”，可是这一段历史极为重要。这段以“山大王”身份在军事方面进行的探索，其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冲破不切合实际的“本本”和框框束缚的思想解放，毛泽东自幼养成的反抗性格和藐视传统的勇气，无疑也在这时起到了作用。这种思想解放在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并不亚于五四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伟大的解放运动。当时毛泽东就“上山”问题进行的探索，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向苏联模式提出的挑战：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斗争道路。尽管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直至四十年代前期的延安整风中才得以完成，它的伟大历史开端却在井冈山。

万众欢呼毛主席

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在1935年、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然而，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则要比这一时间还早三年多。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一片喜庆气氛，入夜还举行了提灯游行，这个赣南县城一举成为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全国性革命政权的首都“瑞京”。当天，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并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苏式职衔相当于总理）。从此，“毛主席”成为人们对毛泽东的专有称呼，以后一些年里甚至发展成为中国语言词汇中使用频率最高之词。就连战争环境中与毛泽东嘻笑怒骂无忌的彭德怀，在长期叫惯了“老毛”后，在众口一辞中也不能不略有吃力地改叫“主席”。

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这一“主席”，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但是已经反映出他在党内、红军内和全国革命人民中享有他人难以比拟的崇高威望。1931年11月间，毛泽东党内职务只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国家副主席、只能算毛泽东副手的项英、张国焘，却都是老资格的现任政治局委员。然而，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中央苏区是毛泽东经历了数年转战亲手开创的，红军的胜利特别是三次反“围剿”的大捷是毛泽东指挥的，过去为苏区广大党员、广大军民崇拜的“毛委员”，在建立中央政府时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最高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外发布文告，多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政府的名义，连远在莫斯科的王明起草的对日宣战的文告，也用毛主席的名义发布。在那种信息不灵、各支红军还被分割在穷山僻壤的各个根据地内苦斗的情况下，一般党员、干部和战士极少有人知道掌握党内大权的陈绍禹、秦邦宪是谁，对其别称“王明、博古”更属茫然，只知道中国革命政权的象征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象征朱德。对毛泽东长期抱有仇恨的张国焘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承认，在与中央红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并不太清楚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却无人不知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字。处于偏远的陕北的红军干部，尽管几乎都与毛泽东素未谋面，可是一听说毛主席来到陕甘苏区，都肃然起敬，并悉心让毛泽东来解决他们的内部纠纷。毛泽东的这种威望，也是他能够在遵义会议上确立党内领导地位，并在随后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狂热的个人崇拜风潮中，毛泽东也明确反对“大树特树”他的“绝对权威”，强调权威是在斗争实践中树立起来的。尽管那个荒唐的年代里许多理论颠倒错乱，这一解释还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如此崇高的威信，根本不可能靠人为地去“树立”，而是靠他本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的表现，才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推崇。在那个战火纷飞、枪杆子起决定作用的年代，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的功绩，又成为他确立权威的最重要的因素。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树起全国为之瞩目的红旗后，引起白色政权的恐惧和重视，随之招来两省军阀的重兵“会剿”。毛泽东不得不与朱德率部突围，进军赣南，以后又开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从而形成后来的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创立，使南京政府更为惊恐，于是出现了倾国之力的“围剿”。在这种红军根据地以奋斗求生存、险象环生的境遇中，毛泽东表现出“每临大节见真知”的过人之才，使中国革命力量如缕殆绳的脉络幸免中断，并走向了堂煌光明的发展之路。

1929年初红四军自井冈山突围后的日子，可谓惊险危殆相继，一旦脱离了根据地，红四军就反主为客，遭敌伏击、穷追，连连失利，朱德的妻子都在途中被俘牺牲，红四军内部许多人对前途也感到茫然，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这时的上海党中央也十分悲观，发来了“二月来信”，要红军分散，朱毛离开红军，“速来中央”。如照此执行，已无根据地依托、思想又出现动摇的部队就会立失领导重心，分散活动的前途也只能是被敌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各个消灭或瓦解。在此危难之时，作为下级的毛泽东敢于以反潮流的精神，抵制了党中央的错误指导，直接致信中央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3页）在信中，毛泽东还预言蒋桂战争即将爆发，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此信刚刚发出，果然如毛泽东所言，“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蒋介石的军队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展开了一场混战。红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恢复了元气，还开辟了广大的新根据地，出现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匝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红四军在闽西站稳脚跟，毛泽东却有近半年被排除在红军领导之外，他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也由陈毅接替。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复杂，后人可以再去评说。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红四军离开了毛泽东，又连遇挫折。

特别是不听毛泽东之言，进兵民俗、方言大异而且敌军又很强大的广东，红四军折兵三分之一。同时，红四军内还出现种种错误思想，种种矛盾一时难解。在这种形势下，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的陈毅与周恩来相商，决定支持毛泽东重返红四军领导，并发出著名的“九月来信”。于是，毛泽东在古田召开会议，重整红四军，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很快出现新气象。

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党中央又于1930年夏天出现“立三路线”的错误，要求红军攻打各大城市。兵力已有2万多人、由朱毛领导的红一军团，被赋予攻打南昌、再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会攻长沙的任务，并准备与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毛泽东开始也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执行了这一计划，并在途中赋下“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的词句。可是一经进入战斗第一线，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未执行攻南昌的命令，并随之从长沙城下撤围，会同已与红一军团合组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进至赣南地区。这样，在立三路线统治的三个月里，朱毛彭黄的红一方面军不仅未像许多地区的红军那样因盲动而损失惨重，反而发展到5万余人，其兵力占全国红军总数的一半还多。

从1930年末至1931年秋，红一方面军又连续经受了三次“围剿”的严峻考验。这时毛泽东经过多次战斗实践的磨炼，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军事指挥员。在作战中，他巧妙用兵，深为全军折服，而且重要的是，他在党内关于红军发展方向的争论中，又以其正确见解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在第二次“围剿”来临之际，面对敌20万大军“步步为营”的筑堡前进，刚刚由上海中央派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毫无军事经验，主张放弃根据地。多数人一时还支持这一意见，甚至有人搬出共产国际某个领导的话，称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毛泽东却坚决反对红军离开江西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一个月无结果，敌军已经进到富田到东固之间，毛泽东果断指挥出击，于是出现了“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位，为营步步嗟何及”的场面。

直至1980年，黄克诚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仍深有感慨地说：“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1931年秋天以后，由上海的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的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批判了毛泽东，也一度让毛泽东交出军队指挥权。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前一段已经树立了无可争辩的功绩，仍然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政权中名义上最高领袖的地位，尽管有人抱怨这一职务是有职无权的“加里宁”。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还把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由于博古、李德等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长征。长征开始又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尤其是过湘江时为掩护笨重的坛坛罐罐，让战斗部队进行甬道式的两侧防卫，以致于全军过江后总兵力已较出发时折损过半。红军离开了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就一败至此，使多数指挥员又重新呼唤毛主席。于是，遵义会议应运而生。尽管这次会议是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规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由于张周二人都心悦诚服地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实际上

成为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重新掌握指挥权后，率领红军四渡赤水，虽然一度摆脱了追兵，部队仍相当疲劳，也遭致林彪等人的一些怨言，不过在渡过金沙江后的会理会议上，这些发怨言者受到毛泽东一番批评即无声息，说明他们已形不成什么气候。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却出现了新的严重挑战，掌握了红四方面军指挥权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要中央服从于他。在中国，历来是有军则有权，四方面军这时兵力有 8 万人，是一方面军的 4 倍，何况四方面军过去未受过毛泽东指挥，张国焘又以愚民政策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可是在当时双方争执的最重要的问题，即红军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又显示了自己的正确。如依张国焘之见，红军向康藏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那么只要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封锁住几个山口，基本上以汉族构成红军被阻于民族隔阂甚深的藏民区，既没有条件扩大军队，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贫瘠高原上又没有可能搞生产，很快就会陷入绝境。毛泽东坚持北上尽管被张国焘诬为“逃跑”，却打开了局面；张国焘西进并自立“中央”，却真正陷入了一筹莫展之地。面对无情的事实，红四方面军多数干部也要求步中央之后北上，长征到达西康的红二方面军又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张国焘不得不取消自立的“中央”，率部北进与中央会师。实践检验的结果，终于使三个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干部拥戴毛泽东的领导，于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虽非出自内心，却也公开向党中央、毛泽东检讨认错。1936 年 12 月，毛泽东成为军委主席团主席，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红军最高统帅。

在全党全军确立了领导地位后的毛泽东，后来遇到党内最大的一次挑战，是来自于 1937 年 11 月下旬由苏联回国的王明。那个在十年内战的白色恐怖中既不敢去农村苏区、又害怕在白区城市久留，有八年之久躲在莫斯科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幻想当中国革命胜利具备基本条件之时，自己再像列宁在十月革命前那样归国，在欢呼声中充当领导。可是当他在延安下飞机后，才发现已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人们关心的主要是他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并不把他本人当作领袖拥戴。如果没有毛泽东在机场介绍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并说明他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者，那些长期在朱毛指挥下通过战争成长起来的军事干部们，大都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这位一直置身于中国革命战争之外、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毫无功绩可言的王明，回国后虽在军队中指挥不动一兵一卒，然而却握有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尚方宝剑”。王明回国后，在有关抗日民族战争的领导权及战略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毛泽东主张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共产党的兵权；王明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内军队实行“七统一”，即要共产党的军队接受国民党的“统一指挥”。在八路军的战略指导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以“山地游击战”为主，向敌后发展力量；王明则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并要共产党的军队主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由于这时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反对王明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与斯大林的指示“对着干”。在这又一次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再次以实践所验证的正确，使全党信服了他的主张。抗战开始后仅一年的结果即说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华北敌后大发展的八路军取得巨大的成果，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工作却是既“轰轰烈烈”又“空空洞洞”。

尊重现实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事实面前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由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出自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之口的指示（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意见），强调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领导，否认了王明的领袖欲望，在国内本无基础的王明失去这一“尚方宝剑”，立即又以其一向擅长的吹拍之术献媚于毛泽东，以后还在《新中华报》专门撰写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当然，王明的这种表演，依然未能使他在随后的整风中逃脱批判。以后抗日战争的结果证明，毛泽东在抗战初期确定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以敌后为发展方向战略决策，成为整个中国革命战争进程的根本转折点。从宏观角度看，继土地革命战争作为中国革命军队诞生并在奋斗中求生存时期之后，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特别是革命军队空前大发展阶段，为解放战争时期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春天，当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走进高悬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横幅的会场时，人们都看到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经过近八年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原来只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直至东海之滨，已经拥有近1亿人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开始只有4万多人的八路军和1万余人的新四军（南方游击队下山集中时还只及此数一半），发展为近100万人的大军。中国革命力量的这一空前发展，不仅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制止国民党妥协投降的中流砥柱，而且为抗战胜利后同反革命力量实行总决战准备了雄厚的实力，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这时的毛泽东以其英明正确的领导，特别是对战争的胜利指导，在全党全军终于赢得了一片由衷的欢呼。

七大的另外一个光辉标志还在于它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过去由于“群雄并起”创建军队及根据地的历史原因，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都分为不同的“山头”，大“山头”内又有小“山头”。如红一方面军内还有一军团、三军团这两个主要“山头”。不同山头的干部刚到延安一起学习时，听到了防空警报去躲飞机，常常都是一个山头的人向一起跑。经过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以及本着承认山头、尊重山头、反对山头、消灭山头的态度，对各根据地的干部尽量摆平，并以其正确的领导使各方面的干部心悦诚服，从而基本消除了明显的山头主义，使全党全军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统一。“毛主席万岁”这一曾长期为中国人耳熟的呼声，正是从此时起开始响彻中国大地。

党的七大刚刚结束，日本就宣布投降。在此形势突变之时，毛泽东又受到美国的威胁和斯大林的压力，敢不敢于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敢不敢于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又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问题。当时号称“世界霸主”的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并以直接干涉威胁中国共产党，中共在国际上仅有的政治同盟者斯大林又要求毛泽东与美蒋反动派妥协以求得和平。1958年夏天，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一次长谈中，曾以合盘托出之势倾诉了对斯大林许多错误的积怨，其中特别指出，在中国革命的最紧要关头，不许中国革命，反对中国革命，犯了同季诺维也夫一样的大错误（余湛、张光祐《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引自《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面对来自敌友两方面的压力，毛泽东在进行和平努力时，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主张，尤其是坚持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颗子弹，都要保存，

不能交出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新版第1161页）这样，就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努力未能实现之时，能够马上进行反击蒋介石进犯的自卫战争，并随着战争的顺利进展将其发展为全国解放战争。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转战于丛山沟壑之中，身居土窑洞，在世界上最小也最简陋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内革命战争。三大战役，乾坤扭转，百万雄师，排山倒海。这场战争完成之迅速，胜利之辉煌，不仅出乎国内外朋友和敌人的想象，也超出了毛泽东本人事先的预计。当毛泽东在万众欢呼声中走上天安门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终于在新中国诞生的实践中得到最好的验证。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军事上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抗美援朝战争前夕确定是否出兵的问题。面对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实力、最先进装备的对手，毛泽东曾有多少天日夜不眠，在确定决心前踌躇再三。尽管党内最高领导层中提出了不同意见，担心“引火烧身”，把新建立的国家打烂，苏联领导人也表现出犹豫退缩，毛泽东还是最后下定了出兵入朝参战的决心。出兵朝鲜作为毛泽东一生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很快又被事实证明是英明和富有远见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军队一百多年来在世界战争舞台上一次最为出色的表现，过去任“八国联军”欺凌的古老神州，一举以打败“十六国联军”的辉煌战绩被自己的对手公认为世界军事强国。历史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决策的正确，使党内许多人相信毛泽东超过相信自己和相信领导集体，并产生了以后一些逐步走向反面的现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确实站到了那一个时代的其他人无可企及的高峰。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党外，熟读兵书、长期研究军事理论和指挥作战的人很多，可是任何人在指导战争的成就上都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相比。在本世纪的国际战争舞台上，毛泽东也以他世所罕见的军事成就受到推崇。尤其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是毛泽东作为军事家的黄金时代，其理论和实践的正确，举世公认。把毛泽东视为“民族主义者”，内心对他深有成见的苏联领导人也不能不尊重和敬佩这位“不受谴责”的“胜利者”。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所评价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青年毛泽东并无意成为军人，可是时代的进程却把他作为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战略家和杰出的统帅，永远铭刻在史册之中。

第二章 天才来自实践，智慧源于群众

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集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者实属少见。拿破仑是公认的杰出统帅，但是他仅仅留下一些片断的军事格言，并没有传世的军事理论著作。被西方军界视为军事理论家的若米尼、克劳塞维茨等人，又只担任过军中幕僚，未曾独当一面地指挥过作战。克劳塞维茨还认为：“统帅不是学者”（《战争论》第一卷第19页）。然而，作为伟大的军事家的毛泽东，恰恰既是一位指挥千百万大军的统帅，又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军事理论家。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卓越成就源于其正确的军事思想，而这些思想又源于实践、源于群众。正如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所阐述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正确思想，同样也经过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然后再到实践中去验证的过程，从而得到形成和升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得到最突出的体现。

伟大在于“不二过”，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旧中国，作为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军将领都习惯于以黄埔几期或陆军大学几期出身来说明自己的身份。清末和民国年间中国军界以之为师的日本陆军，也是以士官学校几期生和陆军大学几期生来标榜。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中培养出的将帅，却几乎是清一色的自己戏称为“青山大学”即山乡的战争环境中学成的军事人才。即使作为早期发动武装斗争骨干的共产党员黄埔生，原来在军校所学到的也不过是几个月的初级军官课程，而且黄埔军校所沿用的保定军校和苏俄的教程中也根本没有红军作战所需要的战略战术课，他们在上山搞武装时也是从头学起。作为自1927年起开始从事军事，三十年代即成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同样也是在自己开办的“青山大学”中成长起来的，正如他所总结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81页）

当国民党的报纸开始登刊“朱毛”在井冈山进行武装活动，并震动了湘赣两省的消息后，毛泽东过去在上海、广州的一些老朋友得知此讯也感到惊讶，他们对这位完全是书生形象的故人如何能指挥军队纵横驰骋，一时感到难以理解。由“挥斥方道”的书生到军队统帅，同“老百姓到军人”一样，其间虽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过渡却也十分不易。

上井冈山之后的10年间，毛泽东经历了一条从原先还是纸上谈兵的“枪杆子”爱好者到全军统帅之路，在这一期间，毛泽东吸收了自己和他人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仅从胜仗尤其注意从败仗中学习打仗。过去以个人崇拜的方式宣传领袖时，只言胜而忌败，突出毛泽东“用兵如神”，所描写的毛泽东从上井冈山起直至中央苏区反“围剿”，几乎每次作战前都能预先算定战况的演变，军事斗争的正确的指导方针只是毛泽东头脑中固有的“妙算”的向外延伸，曾使不少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在指导军事斗争时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通过从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才在实践中

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完善。毛泽东早年并没有想过要当军人，也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成为一个统帅前看过多少古代兵书。据毛泽东自己讲，他在上井冈山以前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于光远时曾深有感慨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引自逢先知：《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986年版，第266页）

在战争历史上，一向正确的“常胜将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战争的指导者作为人，在复杂多变的斗争过程中其认识总有种种局限，都需要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指导，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三国演义》所描写的诸葛亮，战前把“锦囊妙计”交给部将，开战时下属拆看后备计而行，便可取胜，然后再叫一声“丞相真神人也！”就是把人神化的典型，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体现，历史上也不会真有这等事。

毛泽东作为军事家之初，最突出的才干表现在对武装斗争道路的战略谋划上，对于具体的战役、战斗指挥，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摸索过程才逐渐成熟起来。历史证明，毛泽东伟大之所在，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他能不犯错误而处处正确，更不能像某些作品所描绘的那样事事能未卜先知。毛泽东之伟大，正在于他能比别人长于总结经验教训，一发现问题马上更改并总结经验，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及战争指导中愈来愈高明，能够比别人更好地驾驭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并能根据这些规律越来越得心应手地指导革命斗争。

毛泽东开始领导秋收起义时，也是要攻打大城市，并以长沙为目标。起义部队受挫后，党内其他同志还是热衷于城市暴动，可是毛泽东却最先改变了斗争方式，走上井冈山，开创农村根据地。在井冈山斗争中也正是通过一系列挫折、教训，才形成了正确的建军原则、战略战术以及实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的政策。

毛泽东于1964年所说的井冈山斗争中有“两个大败仗”，当系1928年5月间派湘南起义上井冈山的农军数千人返回湘南的全军覆没，以及同年8月红四军主力去湘南所招致的“八月失败”，其中前一次失败与毛泽东的决定不无关系。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湘南有8000农军随朱德部一同前来，许多人还携家带口，军容不整，纪律也差。此时山上给养极为困难，毛泽东对湘南农军的大批涌到十分不满，在致中央的信中曾说过：“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引自肖克《朱毛红军侧记》第1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随即军委决定，已编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后来的红四军）的原湘南农军除留下第29团外，全部返回原籍开展游击战。

当时这部分农军未来得及进行很好的整训，湘南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基础又不好，此时匆忙派数千人脱离根据地远途去湘南，结果回去的队伍很快就被敌人消灭或自己溃散。在此革命极其困难之际，一兵一卒都是宝贵的，如此处置确有失当之处。后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指出：“当时军委太无准备、计划，不估量湘南敌情，简单的因经济困难，没有整顿，这是不对的。”（注：同上书第122—123页）

吸取了湘南农军第一次返乡失败的教训后，同年8月毛泽东就坚决反对

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并在主力去湘南失利后亲自率队将其接回。据黄克诚同志回忆，陈毅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同他谈起对毛泽东的印象，特别联系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两次返回湘南均招致失败的教训，深有感慨他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黄克诚回忆录》（上）第1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这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伟大和高明之处的精辟概括。

通过10年内战期间以无数鲜血和生命进行的反复实践，毛泽东驾驭指挥战争的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其间，毛泽东亲自指挥打过许多胜仗，如井冈山斗争时反“会剿”作战，以及后来在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许多战例，都是巧妙用兵，指挥有方的典范。但是，毛泽东本人也说过，在10年内战期间他指挥过的作战中也有过败仗。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1956年9月1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在这里，毛泽东讲到自己所指挥的四次败仗，其实严格讲来都只是仗打得不理想，并不是大的失利。根据战史来看，其具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高兴圩战斗是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中在江西兴国县进行的，因对敌十九路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和未集中优势兵力，结果猛攻不克，打成对峙，出现了红军一向力求避免的消耗战。

南雄战斗即1932年在南雄县水口圩地区进行的作战，虽然击溃广东军阀陈济棠的20个团，但因兵力又未集中，打成了消耗多而缴获少的击溃仗。

土城之战和茅台之战（即鲁班场战斗），则发生在毛泽东称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期间。

土城之战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一渡赤水之时，中央红军主力同川军郭勋祺部激战受挫，主动撤出战斗，随后不得不改变遵义会议上确定的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重新回师黔北。

茅台之战（战史上通称为鲁班场战斗）发生在桐梓、遵义作战获胜之后，中央红军又在怀仁（茅台）以南的鲁班场寻歼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结果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作战不利，被迫撤出战斗，随之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这两次作战失利所造成的影响，正如彭德怀后来所总结的：“在鲁班场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被迫的带着极大冒险性的长征，幸赖红军英勇和巧妙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复灭到达陕北。”（《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25页）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曾将自己指挥的高兴圩、水口圩这两仗，都作为打败仗的典型战例。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这段讲话中，毛泽东本人又以坦荡的胸怀正视自己在军事上的指挥失误，这些正反映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描写军事家毛泽东的成长过程，只写成功、不讲失误，以神化的手法来描绘我们军队的统帅，这既是片面地曲解毛泽东

的活动经历，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实践。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还说明了自己土地革命和肃反中的失误（即最早提出土地归公的《井冈山土地法》及后来的打“AB团”），这更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同时客观地阐明了人们对于革命斗争中的许多事物都要经过失败和挫折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毛泽东正是以这种“不二过”的态度，打一仗进一步，在挫折和成功中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在军事上取得了越来越突出的成就。与此相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却坚持那种“前面乌龟扒开路，后面乌龟跟着来”的笨拙方式，明明碰壁还硬不回头。党内军内提出批评意见，还要对之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盲目坚持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把红军几乎引入绝境。由此可见，同样是出现失误，却有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的对待方式，这也恰恰是伟人与庸才，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区别之所在。

经过10年内战的反复实践，毛泽东不仅在武装斗争成败的检验中获得了全党全军心悦诚服的拥戴，而且其军事思想基本上全面成熟。红军到达陕北后的一段作战相对较少的时间里，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这一名篇的中心点，正是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在文章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是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71页）由他随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讲演所整理而成的《矛盾论》，更是阐述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奠定了哲学基础。

光辉的理论著作，是丰富实践的精辟总结。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论及党内熟悉马列主义原著者并非毛泽东。同时，不管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党外，熟读兵书、长期研究军事理论和指挥作战的人也很多。然而在随后的战争实践中，任何人指导战争和军事理论的成就都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相比，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比他人更深入实践，并且兼统帅和理论家于一身，因而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及在中国土地上所进行的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有着比其他人更为深刻的认识。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此曾说道：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正是积10年内战之实践经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代表全党智慧的军事思想，就此终于走向成熟。历史证明，毛泽东指导战争的最高明之处，并不是在每个具体战役前都能龟卜算定，而在于他能向全党全军最深刻地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并根据中国特殊情况确定不同于世界上一般战争规律的指导方法，从而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战争引向胜利的有效途径，并由此找出战争中每一阶段克敌制胜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所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理论上高度的成熟，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也终于站到那个时代其他人无可企及的最高峰。

注重“第二个飞跃”，不断完善认识

过去很长时间里，战史书上曾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模式，即在描写毛泽东指导战争时，在每个阶段都事前有正确的预定方针，作战的胜利只是事先确定的方针和固有思想的延续。在对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描写中，这种现象更多。在苏联斯大林时代出版的战史书，亦完全是如此的格式，这其实是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产物。按此种模式写战史，只能把曲折生动、变化多端的战争过程写得一帆风顺，不仅内容干瘪味同嚼蜡，也违反了毛泽东所阐明的人的认识规律。

从人的认识过程看，实践中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达到认识的第一个飞跃；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也才能达到更为重要的第二个飞跃。作战指导也是同样，根据以往战争经验总结出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在新作战指导中验证。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恰恰最重视这种将理性认识再返回到实践中去的“第二个飞跃”，并通过这种飞跃一步步地深化和完善自己对于战争的认识。

如果客观仔细地研究毛泽东指导历次战争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在每一个战争阶段开始时，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并非都能无误地圆满执行，往往需要在战争过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指导方针，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所概括的：“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许多时候须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毛泽东本人在军事斗争中的决策活动，恰恰又提供了这方面的生动例证。

著名的十六字诀的形成，就是汇集集体智慧，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认识逐渐完善的结果。毛泽东上井冈山初期经过游击战的实践，于1928年1月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上初步总结了作战经验，提出的原则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同年春夏，经过攻打茶陵、遂川和新城，又经过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战斗，毛泽东和朱德等人一起进一步总结经验，终于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这种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作战指导的方式，不仅在人民军队弱小困难时期是如此，在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也仍然是如此。当时，作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最重要的是战略指导，而这种指导仍然是通过在实践中反复探索才最终确定的。

1946年夏天全面内战开始时，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像有些书中所说的“大踏步后退”，实行内线歼敌，而是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根据这一方针，当年6月下旬毛泽东要求晋冀鲁豫、山东和华中三支野战军向南线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在北线要求晋察冀、晋绥军区部队夺取三路（平汉北段、同蒲、正大铁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这种外线出击的目的，是以战促和，即争取六个月内我军大胜，必可议和。

随后的作战实践，使毛泽东很快修正了原来的作战方针。当时在内线作战的部队取得苏中战役和定陶战役胜利的成功经验，在北线攻击大同等敌占城市却不顺利。吸收了这些经验教训，同年秋天毛泽东才确定内线作战的方针。同时经过实战的验证，摸清了国民党军战斗力的底，使全党全军确立了“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心，毛泽东也改变了原定以战促和的战略意图，确定将自卫战争发展为全国解放战争，直接达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局。

到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之前，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角度看，也并没有像一些书上所说的那样已经决定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策，并首先把战场选定在东北，而只是把歼敌计划指标定得略高于上一年。在攻击锦州开始时，毛泽东仍设想在八个月内不占领沈阳，对此，可见早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毛泽东于1948年9月7日起草的电报。直至辽沈战役（当时只称为北宁战役，辽沈战役这一名称是在战后追加的）开始一个月后，因战局发展顺利，才确定这一战役要争取全歼东北守敌。

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更是经历了一个原先只准备歼敌十几个师的“小淮海”到歼敌四十多个师的“大淮海”的演变过程。1948年9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前委和中央军委提出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时，都是以歼灭敌军十几师为目标，后来根据战争实际的变化，作战计划也不断加以修正，至战役开始几天之后才确定了以全歼敌徐州集团为目标的决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于进行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全新的战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又经历了一番曲折的探索。经过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和志愿军上下都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双方在现代化装备方面的差距有了全面的认识，因而1951年夏天定战略方针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有的书籍把抗美援朝战争的五次战役写成“五战五捷”，把作战指导说成一帆风顺，那么读者不禁会反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争取在三八线停战？辩证地看，第五次战役后期吃了些亏，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这对于深入地认识世界型战争的新条件，对于五十年代我国大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都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自1951年夏天，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转入阵地战，这其实也是根据战争进程不断修正预定方针的结果。当年5月下旬，毛泽东总结了入朝后五次战役的经验，提出：“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营就够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被称为“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歼灭战的原则，还是以打运动战为前提的。同年7月下旬，毛泽东又提出应准备9月间的攻势作战，仍然是想打运动战。可是第六次战役还没有来得及发动，8月间“联合国军”抢先发动了“夏季攻势”，随后又发起“秋季攻势”，志愿军转入了防御作战。通过阵地防御的实践，证明打阵地战可以用少于运动战的代价换得更大的战果，解决了毛泽东曾担心的“能不能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2页）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和志愿军领导终于确定了阵地战的作战形式。

1958年夏秋炮击金门时独特的作战形式，也是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复杂交织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对金门岛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大规模的炮击前，毛泽东就提出，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而定，走一步，看一步（《当代中国

军队的军事工作》第三编第 39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正是由于在后来“走”的过程中看到美蒋矛盾的激化，看到争取台湾当局以和平统一祖国的可能性，才取消了登岛作战的打算，改用象征性的炮击方式。

总之，真正深入细致地研究毛泽东指导战争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战争本身充满了矛盾和运动，毛泽东在指导战争时也处处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和灵活性。在真正的战争进程中是容不得片面性、神化性的东西存在的。所谓“运筹帷幄”只能是对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不可能是指导战争的源泉。

由于毛泽东在精通理论的同时又深入战争实际，并在战争进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和指导，战争本身的辩证运动也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中得到最生动的体现，他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辩证法浑然一体，水乳交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创造。

毛泽东由一个“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人很快成长为一个军事家，是唯物主义的“实践—认识—再实践”这一基本认识规律的生动体现，是认识达成飞跃的典范。在军事领域里，一个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人，或只长于某一方面的单纯军事指挥员或单纯的兵学家，想在军事上达成认识的飞跃是很缓慢的。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既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理论造诣又高于他人，二者的紧密结合使他身兼统帅和军事理论家的这两种素质能同步得到提高。

如果说，在 10 年内战中毛泽东的精力主要偏重于深入战争实践，那么在到达陕北后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他又偏重于从事理论研究，对以往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据当时在延安的徐懋庸回忆，1938 年 9 月间他和一些军事将领每周一次去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开哲学座谈会。其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得不大高明。每次听完出来的时候，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尤其是他自己发挥的时候，简直是闹笑话。譬如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大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主席却听得很认真，还拿着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的记录。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的。”（徐懋庸：《和毛泽东在延安的接触》，1981 年《新文学史料》第 1 期）

通过在陕北 10 年的生聚教训，尤其是通过理论研究工作，毛泽东将过去在军事斗争第一线指挥战争的经验加以总结升华，在军事上所创立的基本理论终于趋于成熟。随后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根据斗争需要又将其总结的经验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并在解放战争的宏大进程和辉煌胜利中进行验证。特别是他转战陕北过程中，亲临作战第一线，又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验。理论与实际在这里达到了前人所罕见的紧密结合，思想认识也就很快达成了又一个飞跃，使这位后起的军事家迅速跃居到前人和同辈所未能企及的高度。

吸取集体智慧，发挥两个积极性

著名美国记者斯诺于 1936 年访问过陕北苏区，在保安的窑洞中曾与毛泽

东连续多日长谈。通过这次访问写成的轰动世界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后人通称为《西行漫记》），在国际上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军民的英勇奋斗，也首次以传记形式介绍了毛泽东个人的生平。斯诺在抱着极大兴趣听取毛泽东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突然有一个发现，即在叙述早年的事情时，所用的人称基本都是“我”；谈及“红军的成长”这一问题时，人称却出现了变化。如同斯诺所记述的：

“毛泽东的叙述，至此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作为学问家的毛泽东，在人称使用上的这一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其实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身居中国革命军队领导人位置的毛泽东，其对军事工作的正确指导，已经是领导集体智慧的总汇。如同《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人们所科学表述的那样，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即便毛泽东个人的正确思想，同样是对来自群众和领导集体中正确思想加以归纳的结晶。

人的知识都来自于两方面：直接知识，间接知识。毛泽东投身军事斗争时，就是一个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以后又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在面对复杂的军事问题时，他不可能事必躬亲，需要通过获取大量的间接知识来了解情况。这些知识，主要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下级指挥员的意见，也包括领袖集团其他成员的智慧。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总结解放战争的经验时曾有一段精彩的讲话，其中说道：先向下级学习，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示，然后再下命令。中央领导的正确，就是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意见；各地如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发号施令，就只好吃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7年，第12期第6页）。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事实正是如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的形势下，对以往党史上许多问题又进行了新探讨，其中包括对“十六字诀”的发明权属谁也有争论。在那种领导人终日寝食与共，逢事集体研究的情况下，是很难把确定一项复杂决策的功绩只归于某一个人名下的。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肖克在回忆1929年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情景时，就确定方针的程序曾这样描述说：

“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总是每隔两、三天就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一次会，会议时间不长，个把小时。每到开会时间，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提上马灯，准时到会。毛泽东总是说，把你们找来，一是及时了解情况；二是请大家研究一下行动和工作。后来他告诉我们，这是个好办法，打胜仗是大家的，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互相埋怨，不推诿。”“那时，前委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陈老总三个人领导。有时我们在一起开会，遇到有不同意见，就在会上辩论。在会议中间，毛主席总是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叫你讲话。会议结束时，他根据大家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结论。毛主席从来就不主张按‘长官意志，办事，反对那种谁的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的封建主义思想。”（《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0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为了很好地集中集体智慧，战争年代中毛泽东很注意发扬军事民主，鼓

励下级指挥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以此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战略思想和指导艺术。毛泽东对战略形势的观察和进行战略决策往往能高于他人，主要在于他能集中群体智慧，并能从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概括。毛泽东曾把人的头脑比喻为一个加工厂，主要起综合作用。毛泽东个人的许多高超的决策，也与群体智慧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仅就解放战争期间而论，毛泽东在 1945 年末所确定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和部署，就是吸取了东北局内部陈云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并建筑于刘少奇在此之前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在 1946 年秋天确定的于解放区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的启示，并听取了刘伯承、邓小平对定陶战役成功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确定发起淮海战役，也是同意了粟裕首先提出的建议。

这种依靠集体智慧，共同切磋的指挥方式，一直沿续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本人没有去过朝鲜前线，对战况了解更有赖于下级的汇报。例如在第五次战役后期提出打小歼灭战，即“零敲牛皮糖”的原则，就是 1951 年 5 月下旬毛泽东接见陈赓、解方和志愿军四位军首长时，经毛泽东一再询问，并由这些指挥员讲解战场实际，使毛泽东了解到志愿军因技术条件差，一次作战难以吃掉美军一个团，才最后确定了这一新的作战方针。

在战争年代，即使是以毛泽东本人名义发出的指示，同样也有许多并非一定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如今查阅已编入《毛泽东军事文集》的三大战役时的指示电的原稿，有些还是周恩来的手迹。当然，这些指示是由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最后确定并同意发出的，不论由谁执笔，将其算作毛泽东的指示自然没有错。但是更准确他讲，应该表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

集体的智慧能够归纳并成为宝贵的“结晶”，这就有赖于最高领导人的正确引导和总结。毛泽东作为一个统帅和军事家伟大之处，也正在他不仅能鼓励下级提意见，而且能够去粗取精，对其中不正确的意见采取帮助引导的态度，对其中正确的意见则进行科学的归纳、概括和提炼，并在一系列军事著作中对此加以理论升华。所以说，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是我军付出无数鲜血和生命所进行英勇战斗的最宝贵的经验总结，是群众路线的光辉思想在战争指导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本人在汇集总结这些经验时，发挥了他人所不能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中以集体智慧形成的军事思想，都冠之以毛泽东的名字，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实施决策时，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将帅协谋，发挥上级和下级指挥员两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很注意积极了解下情，认真调查研究后根据下级反映的情况确定决心。但是，要使这些决心能按照战场实际得到很好的贯彻，还需要下级根据实地情况灵活贯彻上级指示。在那种战争年代中如果坚持“两个凡是”，处处按“最高指示”机械地“执行不走样”，是必定要打败仗的。毛泽东在要求下级灵活执行其指令的问题上，也做出过杰出的榜样。

自古以来，在千里之外“遥控”，要下级机械执行命令的，通常都要犯主观指导违背客观实际的毛病。北宋朝廷一向靠千里外送阵图指挥下级作战，战场上的主帅还没有改变之权，结果对辽作战多年总吃败仗。蒋介石为严密控制其下属，也经常越级指挥到师、团，不论指令是否适合战场情况，

下属只能唯命是从。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恰恰是那些只能机械执行蒋介石命令的中央军，作战行动最为僵化，因此易于歼灭。反而是那些装备、训练不如中央军的白崇禧、傅作义等“杂牌”，由于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战场上比较灵活，倒不大容易对付。苏军在卫国战争初期败绩一再，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其统得过死的领导体制，使下级毫无自主权，明知上级指示不适用也不敢变通。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李德这些只在图上作业的指挥者不了解战场情况，就下达一个个僵死的命令，也给弱小的红军造成过重大的灾难。

毛泽东在未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时，就坚决反对下级机械地按“本本”执行上级指示。1930年，他写下了后来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其中特别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毛泽东本人在执行党的六大决议时，就根据农村根据地的实际作了一些灵活的变通。如六大决议要求红军对待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消灭其首领。毛泽东则考虑到井冈山上原为土匪首领的王佐等人经过党的教育，已经成为革命战士，不能采取消灭的办法，所以未执行六大提出的这一要求。可惜的是，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当地一些党的领导人不根据实情，再加上地方主义情绪，机械地执行了消灭土匪首领的要求，杀害了王佐、袁文才。这一行动，得罪了当地许多群众，出现了严重的“反水”（即反共投敌行动），在敌军重兵一次次进剿时都没有丧失的井冈山根据地，却因自身的错误行动而丢失。

毛泽东成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之后，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在决策和下达命令时一般只是规定总的战略任务，在具体执行问题上都给下级指挥员以很大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集中指挥和机断行事巧妙地结合起来。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各战略区通常只是下达歼敌若干个旅的总任务，至于每一仗具体歼击那一部分敌军，通常只以商量的口气提出建议。毛泽东常说，要给干部以机动，因为你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清楚，下面的具体情况，上面也不一定全知道（《聂荣臻回忆录》（下）第731页）。因此，毛泽东下达命令一般不规定得很死，下级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上级的指示。而这些灵活处置，还经常得到毛泽东的表扬。

查阅一下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文电，在大量的作战指示、命令后面，毛泽东常常写着“望酌情处理之”（《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19页），“请按实情决定”（《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651页）等语句。例如在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鉴于战场指挥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更了解第一手情况和战局的变化，因而指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559页）再将毛泽东的许多作战指示与战史实际相对照，就会发现一些指挥员在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时根据实际作了变通。“文化大革命”期间罗织罪名的一些材料，常将此类灵活变通的情况当作“对抗”伟大领袖的“罪行”，其实这种根据实情机动执行上级指示的作法正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时期倡导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的这种领导作风，也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一大特色。五十年代初前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的苏联顾问起初看到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后，都感到非常奇怪，提出：“这像命令吗？”（《聂荣臻回忆录》（下）第731页）“军委主席的命令怎么还让彭德怀酌情办理？”其实，这正是毛泽东驾

驭战争全局时艺术高超的体现，与那种将一切都统得过死、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相比，确显出其优越性。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考虑到和平环境中的对外军事斗争需要更强的政策性和统一指导，毛泽东强调了对外斗争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不过，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他还是尊重第一线指挥员的意见。注意听取下级意见，强调按实情执行命令的精神，这正是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指导战争时的重要体现。

以群众作为大地的“安泰”

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名叫安泰的英雄，他的母亲是大地。在与敌人搏斗之时，他的身体只要一靠上地面，立即就有无穷的力量。他的敌人开始无法取胜，最后还是使他脱离了地面，才在空中将他打败。对于一个革命的领导者来说，人民群众就是须臾不可脱离的大地。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成就和晚年的不幸失误，恰恰都可以从是否脱离“大地”这一点得到解释。

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统帅和思想家，有着过人的才智，尤其是他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使跟随他多年的同志无不佩服。在极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对各主要战区的人文地理情况一般都了如指掌。曾长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回忆毛泽东说：“他一是求知欲强，特别爱学习；再就是记忆力特别好。有的时候记起什么诗、什么词，让别人去查找，他能背下来，比如昆明大观楼那个一百八十字的长对联，他就能背下来。”（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同毛泽东接触过的许多人都反映，在他身上有一种令中外人士倾倒的神韵和魄力，即使曾与毛泽东有过激烈个人冲突的梁漱溟，在回忆起毛泽东时也是钦佩不已。尤其是讲到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对战争结局的论断，梁漱溟记忆尤深，并对此追述道：“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梁漱溟问答录》）毛泽东出众的军事才能使党内的同志们折服，重要的一点也正在于他对战争进程经常能作出这样天才的预见。

天才在于勤奋。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在长期的多方面实践中通过无数艰辛奋斗刻苦磨练出来的。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作为人民军队统帅的毛泽东，他个人在工作上的忘我精神的确为一般人所不及。即使到了五十年代前期，他的秘书们虽然年纪都比他轻得多，精力却不如他。从那些年代的毛泽东工作日程表上看，名符其实地到了日理万机的程度。据杨成武回忆，在建国初期，聂荣臻代总长每天都要向毛泽东汇报三次军事情况，全军步兵的团以上单位、特种兵营以上单位的调动都要向他请示报告。当然如遇战斗情况，指挥员有机断处置之权，但事后也必须迅速汇报。全国的党务工作、国民经济恢复、土地改革等各项要务也都要由毛泽东批示，而我国外交战线处理各种大小事务则必须经毛泽东最后定夺。此外，无论工作

多么忙碌，毛泽东每天阅读书报不可或缺。他每天的工作量之大，以及所看的书籍之多，确实到了今后人惊讶的程度。毛泽东青年时代“野蛮其体魄”的锻炼，以及此后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环境中培养出的顽强意志，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出来。

人们承认毛泽东的过人才华，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以他业绩最为辉煌的战争领域而论，其指导战争的卓越艺术才能，同样也来自于群众的经验，来自于党和军队领导集体的智慧，在这里，他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加以综合归纳。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革命战争中一切正确的指导思想，归根到底只能源于进行战争实践的广大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所概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思想方法，是战争指导者实施正确领导时必须坚持的根本方法，也是在思想领域中坚持群众路线的体现。

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归纳正确的意见反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无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证实的真理。

从二十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直至四十年代末，毛泽东走到哪里，调查研究就搞到哪里。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就详细调查了湘赣边地区的地形及群众基础，这为起义失利后走向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此后转战赣南闽西，毛泽东都注意调查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制定政治和军事上的各种政策都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当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习惯于照搬外国的教条，刚从莫斯科回来就以“闭着眼睛捉麻雀”的方式，下车伊始便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对此，毛泽东深恶痛绝。早在1930年，毛泽东深入寻乌地区进行调查时，就写下了《调查工作》（以后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其中特别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9页）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又将这种不调查研究就“瞎说一顿”的主观主义作风，称为“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0页）。过去只被看作一般性毛病的主观主义，被毛泽东上升到如此高度来认识，既反映了毛泽东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所造成的危害痛心疾首，也说明了他对调查研究的极度重视。

在担任了全党的最高领袖之后，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还保持了这种深入群众做调查的作风。1945年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因身体不好到柳树店原中央后勤疗养院养病，只住了一周，就将柳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跑遍，同各村的群众都谈过话。1947年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尽管已五十多岁，还是亲自找群众了解情况。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所选的警卫战士，要求来自全国不同的省份，战士回家探亲后都要向他汇报当地的实际情况，以这种方式间接地了解群众的疾苦和反映。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到一地首先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等情况；二是向书本做调查，如饥似渴地寻找和阅读介绍各地区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书籍。他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89页）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还计划骑马到长江、黄

河两岸进行实地考察，并带上地质、历史等方面的专家同行。另外，毛泽东还说过想回陕北走一走，并要人预先准备。如果这些计划真能实现，也许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会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可惜以后毛泽东因投身于政治运动的筹划，未能真正实践他研究自然科学以及到基层考察的设想，这对他个人及整个国家而言都是一大憾事。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时特别注意找穷苦的劳动人民了解情况。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确立的人生取向，就是站在最穷最苦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即使在身居领袖的位置后，仍时时关心着穷苦的群众。在延安时期就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师哲回忆说：

“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姓杨的贫农，他们的窑洞像那时陕北一般穷苦人家的窑洞只有门，没有窗子一样，里面黑洞洞的。杨家一做饭，满屋子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变成了烟黑色。门口有个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只有三十几岁，不仅手很脏，连脖子都是黑油油的。他们看见毛主席走过，经常向他打招呼。主席也亲切地向他们问长问短，有时还到屋前站站。他很有感触地对我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看不起。’”

“主席对高居群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一次，我陪他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他手里拿个拐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转，见到主席打了个招呼，手中的拐杖仍不停地挥舞着；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主席气愤他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者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235—2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正由于毛泽东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在调查研究中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毛泽东回忆在江西苏区调查的情况时就说过：“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0页）。正是通过这种与群众心贴心的调查，毛泽东才制定出一系列真正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而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都未能形成切实符合中国农民要求的土地纲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制定的第一个正式实施的土地纲领——井冈山土地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俄革命时没收地主土地归公的先例，规定把一切土地归公，只给农民耕种权而不给所有权。这种“打土豪”却不真正“分田地”的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调动农民参军保田的积极性，井冈山斗争期间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就遇到困难。通过这段实践，在党内又是毛泽东最早察觉到这一问题，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在随后制定的几个土地法中，就逐步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的规定，确定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个人，并且允许买卖，真正将农民祖祖辈辈渴望得到的土地归其私有，这样才将“打土豪、分田地”同扩大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紧密联

系起来。广大农民才踊跃参军参战，只有二三百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就能坚持长达数年之久的抗击敌人“围剿”的战争。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还尤其注意亲临战地进行实地调查，而不管这样做要冒多大的危险。在1961年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曾回忆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说道：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反对第二次“围剿”兵少的时候，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我说，彭德怀你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正面，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66页）。

正是由于进行这种实地的调查研究，才随之出现了毛泽东诗词中所描写的情景：

“白云山头山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宵入。”

调查研究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同样是下到基层去调查，态度不同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材料，分析综合的方法不同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因而毛泽东于1933年进一步指出：“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此后，他还具体提出了调查研究时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0页）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把亲身实践和间接了解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将听取各级干部汇报和倾听群众直接反映全面地加以兼顾，基本达到了“兼听则明”，防止了“偏听则暗”。在此基础上实行正确的综合总结，就能力正确的决策创造前提。

当然，深入群众调查时还有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群众也分为不同层次。尤其是建国之后，向科技进军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时，更应注意倾听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如果把自己的眼界只放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主要依靠对象贫苦农民方面，就很难获得有益于经济建设的全面知识。在这方面，历史确实曾给毛泽东造成过局限，不过毛泽东本人也做过接触社会各阶层的努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曾主动与一些科学家交朋友，向他们请教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毛泽东关于发展我国核工业和尖端武器的许多决策，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一层次上深入群众的结果。

毛泽东本人一向作为法宝的调查研究，在他的晚年不幸一度黯然。在“大跃进”期间，年已六十多的毛泽东仍经常下去视察，足迹及大江南北。1961年以后毛泽东又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以此认识和纠正了具体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然而此时的毛泽东由于环境所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造成的墙与真实的下情相隔绝。毛泽东尽管很反对领导人所到之处层层护卫、戒备森严，以致使人望而生畏的办法，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体制及搬用苏联的保卫工作经验，事实上又不可能像他自己要求的那样走到群众中去。再加上年事渐高，毛泽东也不能再像过去在赣南闽西那样深入下层走访，即使下去视察，也是被热泪盈眶的人们环绕着高呼“万岁！万万岁！”耳边是一片颂

扬之声，这又能了解到多少真实情况？至于间接听取各级干部反映情况，已有彭德怀直言获罪的前车之鉴，尽管毛泽东一再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可是由当时的政治气候所决定，报喜不报忧已成为无法克服的积弊。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人员一向宽厚，他们反映情况顾虑少些，然而由于这些人的文化程度及其一直所受的“正面教育”所限，也很难深刻地全面地说明下情，有时只了解某些片面的反映，还会导致毛泽东作出一些不准确的判断。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前，过去由毛泽东身边下到基层工作的一些原警卫人员回来，纷纷反映下面干部的一些不良作风，了解到这种局部的现象反而促使毛泽东判定已经形成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更增强了他发动那场政治运动的决心。

历史生动地证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在于他最能深入群众。同样，毛泽东在晚年出现一些失误，基本原因也在于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喜欢听神化或奉迎之言，如同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所说，“毛泽东同志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历史的回顾》第8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状况形成的风气，使毛泽东晚年人际关系极不正常，出现了近似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所说的那种“亲小人，远贤臣”的现象，结果好邪得道，言路闭塞。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决心就不可能正确，最后陷入自己过去所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原则，如：群众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任何人不能违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

第三章 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统帅

1949年5月25日晚间，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街头出现了一批批满身硝烟汗渍的军人，虽然伴随他们入城的宣传队员已经向市民说明了这是秋毫无犯的人民解放军，可是在近代久经兵灾战乱的老百姓普遍还是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第二天天亮后，市民心头的担忧却一下子被惊喜和敬佩所代替，因为他们都看到这支军队整夜都露宿在潮湿阴冷的街头，无论官或兵都不进入民房。目睹古今中外罕有的尊纪爱民的正义之师，“毛主席万岁”和“朱总司令万岁”的欢呼声，立即发自百万市民的肺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其自身的模范榜样，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了极其光辉和非常感人的形象。这支英雄的武装力量，不仅从中国革命的友人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作品中得到极高的赞美。也赢得自己对手的钦佩。

同八路军作战多年，被中国共产党定为头等侵华战犯追缉、却被国民党释放并聘为顾问的原日本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对八路军的评价，就以“作战勇敢，内部团结”来概括。

一直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原日本支那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日本投降后在华日本人的印象，也称凡接触过国共两军的人都称赞共产党军队的纪律，许多人并从此预测到日后共产党会在中国胜利。

那个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解放时亲眼看到了第一批进城的人民解放军。尽管他的住所受到惊扰，但是他在报告中仍承认，同“贪污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的国民党相比，“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纪律严明，思想灌输十分彻底。他们进入南京之后，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突出。”

发出这些评价的外国要员，始终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敌人，但是他们都曾亲自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旧军阀部队、国民党军进行过对比，在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劲旅。

在旧中国军界极其腐败、落后的基础上创建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确实难而又难。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生的光辉伟业之一，武是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白手起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具有全新内外关系的强大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人建军的成就固然是集体智慧的产物，然而毛泽东在人民军队成长和发展的每一阶段，不论在指导军队的理论纲领上，还是在政策纪律的细则条目上，都留下了他神工斧凿的独特功力。“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正是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的历史选择。

不愿摸枪，却毕生重视军队

有长期戎马生涯的老将军一般都喜欢摆弄枪，武器已成为他们毕生追求的事业的一部分。然而，身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一生部不愿意带枪，也不爱好玩枪。在延安、西柏坡时，当其他老总们经常以打枪打猎作为一种娱乐时，毛泽东却全然没有这种“骑射之风”，总爱与笔墨为伍。这位始终保持“书生气”的领袖虽然就个人气质而论并非与兵械有缘，可是当他一涉足军事

领域就视武装力量特别是军队为命根，被人加上“枪杆子主义”的头衔，而且此后一生如此。

毛泽东和他的青年同志们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共“一大”时，还只是手无寸铁地泛论如何夺取天下。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大革命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一个最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著名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页），是对这一教训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已经在党章上写明将来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尽管这出自于外国人的手笔，但毕竟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所以当时党内对武装的问题应该说早有认识。如果实事求是地研究大革命的进程，应该说当时的中共中央及某些地区的领导人对工农武装已经开始重视，但是对军队重要性的认识却差得多。

回溯中共的武装斗争史，组织工农武装比组织军队还早一些。1924年夏天，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市郊就建立起有三千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同年秋天镇压商团叛乱时又建立起第一支武装的工人队伍——工团军。这些武装力量的问世，比建立第一支共产党的军队“铁甲车队”还早几个月。北伐期间是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群众性的工农武装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真正由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的军队不过是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成的6个团，加上一部分军校学生1至2万人，可是工农武装特别是农民武装的数量却以十万计。仅湖南一省，有组织的农军就达10万之众。至于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的工人纠察队，实际上是装备了武器的有组织的工人武装力量，总数也有上万人。但这些工农武装毕竟不是军队，按后来的标准只能算是“民兵”性质。

注意工农武装却不太注意军队，这其实也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俄国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并未建立自己的军队，靠着起义的工人，以及同情革命的士兵支持，就一举以暴动夺取了政权，建军则是有了政权之后的事。前苏联的国家生日是1917年11月7日，苏联红军的建军日却是1918年2月23日，比建国还晚3个多月。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希望中国革命能照此办理，1926年夏季以后的党内文件、瞿秋白等人的文章，都论述了将来工农武装暴动的问题，对于如何建设军队却极少论及。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主要着眼于农民运动，并未着手研究军队建设问题。他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只是强调了“建立农民武装”，并大力讴歌了梭镖的作用，这正反映了那个时期的认识水平。

大革命失败的实践说明，在这一问题上俄国人的路是走不通的。拥有大量军队的国民党一旦反共，当时的工农武装大都迅速瓦解。如广州、上海、武汉的工人纠察队都被一举缴械，湖南反动派发动“马日事变”时兵力不过4个团，湖南的10万农军却在旬日内星离云散，党内所谓“十万农军围攻长沙”之说，只是纸上谈兵之论。即使是举行暴动的工农武装，在战斗能力方面的表现也极其有限。广州起义作战中，武装工人虽然勇敢，却基本不懂战斗常识，在街心无隐蔽地作战，后面的人射击还常常击中前面的人，一经敌正规军攻击就立遭失败。平江曾有号称“二十万农民扑城”的暴动，结果经不起敌一个团正规军的反扑。在这一紧急关头，能够作为武装暴动骨干力量并保存下来的，主要还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仅有的那一点军队。

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这些严酷的事实证明，进入近代热兵器

战争阶段之后，在中国如没有正规军作骨干，只靠临时组织的工农武装，根本无法战胜拥有强大正规军的反动统治者。究其原因，除了没有全国性革命高潮的政治形势，仅从军事角度，而论，还在于近代中国军事制度方面所独具的特色。

在西方国家，包括旧俄国在内，近代已经实行了普遍的兵役制，一般男性公民均有服役义务，也受过军事训练。聂荣臻二十年代在德国看到游行的工人队伍后，曾感慨不已，因为德国的工人多眼过兵役，游行时队伍严整，如配发武器则立即可成军队。近代中国的军人为雇佣制，是极少数人涉足的特殊职业，社会上其他人与近代军事技术和训练无缘。因此，中国一般的城市工人很缺乏军事知识，中国农民虽然能作为良好士兵的可训之材，然而因其生活和生产方式更为散漫，仓促成军难有战斗力。这些，已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上百次农民暴动的失败所证实。有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再有广大的工农武装配合，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正所谓“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面对大革命的失败，极善于总结经验毛泽东马上认识到这一点。在湖南省委研究发动秋收起义的长沙沈家大屋会议上，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农民发动起来起义即可成功的论调，强调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要失败。随后，组成秋收起义武装队伍核心的，正是那支被称为国府警卫团的正规军。在起义受挫、参战的工农武装大都失散的情况下，毛泽东率领这个团剩余的队伍作为基本骨干走上井冈山，从此开始了他的建军生涯。此后，除了古田会议前的短时间内他被迫离开红四军，以及在中央苏区他一度被解除红军领导权只管政府工作外，他的一生都和军队紧紧地连在一起。

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自涉足军事工作起，一直把掌握军权作为实现自己革命理想的最主要的手段。当“左”倾路线的执行者给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一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之职，却免去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时，毛泽东感到最为痛苦。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确立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实际上也就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他在建国以后，国家主席可以不兼，在党的八大前后也考虑过改任名誉主席，但任军委主席一职一直不变。

毛泽东看重军权，既是他在革命斗争中的亲身体验，也是他通览历史并以国民党领导人和近代军阀为借鉴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总结，在中国“有军则有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6页）。在革命史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领导权问题，其答案也可以从这里找到，即同样是有军则有领导权，有多大军队领导权就有多大。中国共产党得到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公开拥护是在1948年，恰恰是在人民解放军已显示出自己是全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之后。

毛泽东争军权，是为革命争军权，为人民争军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了某些策略上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许多问题上做过让步，有时甚至是极大的让步。例如：为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共能够放下为之浴血奋斗了十年的苏维埃旗帜，可以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还能让全体干部战士摘下红军帽，戴上过去长期作为射击目标的青天白日徽。可是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问题上绝不让步。当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来当八路军政训处副主任，并为各师、旅派来副职官和参谋长时，毛泽东的回答则是“不许入营门一步”。为统一战线的需要，最后达成的妥协也不过是

允许国民党政府向八路军各师派联络参谋。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指挥权丝毫不可动摇。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在枪杆子问题上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国际上是一片“交枪风”，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都交出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武装（当然这些国家有其具体情况），作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也希望中国共产党如此办理。与此同时，拥有最强大实力的美国出面调处国共内战，与蒋介石一起以“合法地位”讥政府中三分之一弱的席位为诱饵，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国内一些站在国共之间的“第三方”人士，这时也希望国民党多在政治上让步，共产党则多在军事上让步。例如《大公报》社论即声言：“为共产党计，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而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并说如此便会被全国同胞“奉为万世生佛”。（1945年11月30日《大公报》社论《质中共》）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长期战争后的厌战盼和情绪。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顶住这内外双重压力，需要何等英勇的反潮流精神！

在此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关头，毛泽东又表现出敢于独树一帜，不怕鬼、不听邪的态度。对斯大林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当时虽未公开反对，在实际上却拒绝接受。对于党内的同志，毛泽东则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1页）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虽然强调了“和为贵”，却坚持要保留自己的武装。当民社党领导蒋匀田询问毛泽东能否同意各党放弃一切枪杆子时，毛泽东当即回答：“没有我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为了形象地比喻无枪则不能生存，毛泽东还破例做了一番表演。蒋匀田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先说“军队国家化固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那我们又如何受得了呢？”“毛先生讲到特务跟踪时，他即站起，以行动表现，左右转头向后看，使在座的人为之惊笑不已。毛先生表演特务跟踪之毕现形态，今日忆之，真使我百感丛生，情难自己”。（引自《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编：《风云七十年》（上）第380页）在掌握了庞大的军队和特务机关的蒋介石面前，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而侈谈民主，岂非与虎谋皮？

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国内外的和平潮流，毛泽东本人虽然也一度设想通过“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却始终坚持要保存人民军队，以防万一。言和而保持军队，这一原则正是与国际上的“交枪”风的本质区别所在。正由于保存了人民军队，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中国共产党就能迅速进行自卫战争，随后又将其转变为全国解放战争。

正因为有了一支倾注了无数心血培养起来的强大人民军队，毛泽东能够在神州大地上实现他在青年时代就许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在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后，毛泽东特别指出：“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7页）在共和国建立前后，一些民主人士以过去改朝换代时“易帜”、“受编”的旧例建议保留起义部队，由他们自己来带。毛

泽东的态度则是新中国不能允许保存任何个人的武装。在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中，可以广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参加，搞统一战线，可是在军队里必须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不能有别的党派组织，更不能搞统一战线的军队。正因为如此，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几十年里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作为国家的坚强柱石岿然不动，从而在根本上保障了长治久安。

在旧式武装的遗产上进行建军探索

懂得军队的重要性不易，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更难而又难。初上井冈山时的毛泽东，是以孤独的情怀进入了湘赣边界的偏僻山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中，候补委员毛泽东在当时是唯一亲身在农村根据地从事军队建设工作的人。隐蔽在上海租界洋房内的中共中央开始不仅未支持毛泽东的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反而因秋收起义的失败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这一处分传达到井冈山时，一度被误为“开除党籍”，毛泽东一时成为“党外人士”。此刻，毛泽东身边只有不足千人的部队，而且这支部队内部的叛变和逃跑的阴谋仍不断发生，刚刚表示归顺的“山大王，’武装也未进行改造，四周又是强敌环绕和一片白色恐怖。此时毛泽东所处的境况之恶劣，可想而知。

如此艰难的环境，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毕生的烙印。熟悉毛泽东生活起居的人都知道，中晚年的毛泽东有两难，即睡觉难和大便难。其入睡之难，造成脑子长期紧张过度，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不无影响。而造成人睡难，恰始自上井冈山。黄克诚在回顾毛泽东脑子紧张过度的原因时，曾说过：“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五八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虽然只有六十多岁，但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黄克诚回忆录》第 385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当时毛泽东日夜苦心焦虑，所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旧式雇佣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人民军队。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工、农、兵和知识青年相结合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军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客观地评价历史，必须承认这一军事基础主要还是旧雇佣军队的遗产，很不适应农村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的需要。

自创建铁甲车队至大革命失败，这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部分军队。例如叶挺部队，行动听共产党的命令，军官大多数是党派去的干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部队不但在番号上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军队中的募兵、管理、教育等许多制度，仍没有冲破旧式军队的规范。在部队里，士兵都系雇佣而来的破产农民，虽然进行过“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教育，但是他们多数人感受不到战争与自身解放有什么密切关系，“当兵吃粮，领饷养家”这种旧式雇佣军队的基本传统制度，仍留存在这支受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之中。叶挺部队中的军官虽然大部分是受过进步思想教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却也有不少人继承了旧军阀部队的军官习气，以当官挣钱为主要目标。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顺境中，天天锣鼓欢呼，薪饷供应无虑，部队当然能始终保持“铁军”的高昂士气。一旦严酷的逆境出现，部队的状况立即就急转直下。

南昌起义后，部队在南下时立即出现了当时党内报告中所述的如下情况：

“八月三日至五日，军队先后离开南昌，向临川前进。时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民工）。沿途全无农民支援，加以反动派宣传的影响（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车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病者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士兵亦不明白。”

毛泽东领导下的秋收起义部队骨干——国府警卫团，也是由“铁军”中派生出的一支劲旅，起义之后存在与南昌起义部队同样的问题。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对此曾回顾说：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向井冈山的转移中，毛泽东所率的部队中不仅普通的战士和下级干部大批逃跑开小差，留下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师长余洒度也悲观离队，以后又投靠了国民党。到达井冈山下，全团部队所余不到先前的三分之一。刚刚上山不久，新任的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这三名主要团领导又企图率队投奔军阀部队。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紧急关头追回部队，并处决了这三个叛徒，剩下的这点军队也要被断送掉。

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起义部队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根据旧式雇佣军队的传统和制度，“官靠薪，兵靠饷”，而且兵为将有。形势恶化，薪饷不济，旧式军队马上就会哗变、溃散，或受他人收编。军队将领在政治上转向，与将领和各级军官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部队也跟随而去。这些，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规律。军队的雇佣性质不变，就跳不出这一规律。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初，党内有些领导人一时还不能找出摆脱雇佣军队制度的方式。1927年11月海陆丰起义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当地编练工农革命军的方式仍是以薪饷招募志愿兵，规定“入伍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在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的旗号，对士兵所宣布的政纲是“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这种纲领，实际上还是沿用了以雇佣军队吸引士兵的旧方式，而且想使红军的薪饷比旧军队更多（当时旧军队士兵的月饷一般是五至十元），从而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可是广州起义的剩余部队奔向海陆丰与当地的工农革命军会合后，在敌人的进剿下被迫退到穷困的山乡，既没有每月“二十元现洋”来募兵，愿意投奔“招军旗”的“吃粮人”也不肯在这样危险和困苦的环境中受雇，再加以其他政策错误，部队主要靠原有的老骨干，越打越少，以致很快不能维持。事实证明，这种靠招募雇佣兵的办法建立革命军队的尝试，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行

不通。

大革命失败及随后武装起义受挫的无情客观事实说明，共产党人要想进行革命战争，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军队，并在建军工作中“另起炉灶”。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到偏僻的山乡，依靠广大农民去创建人民军队。在这种环境下，既不可能采取中国封建军阀和草寇式的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集队方法，也没有条件像苏俄那样利用已有政权实施国家征兵式的建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所探索出的方式，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和发动土地革命、开辟根据地结合起来。

这种建军工作中缺一不可的“三结合”，靠的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可以立脚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以“打土豪”筹款养军；用“分田地”给农民最大的实际利益，并在斗争中激起对地主豪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动员农民当兵；在几乎无薪饷、部队生活又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以阶级斗争的教育和根据地政权的保障作用，激发参军者的斗志并解决其家庭困难（如农村政权要负责对军属分到的土地实行“代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64页）

毛泽东在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这一创举，终于解决了在中国土地上人民军队建军的基础——兵源问题，进而又创造了养兵、训兵、带兵、用兵的全新方式，建立起一支虽以农民为主体，却由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完全新型的革命军队。此后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既没有国家政权，军队又全无薪饷，物质条件极为困苦的情况下，取兵于农、养兵于农、寓兵于农，靠的就是建军问题上的这种“三结合”。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期间虽然不打土豪，改为减租减息，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土地革命），农民战争，再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三者相加，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内容。

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通过在斗争实际中摸索，既以土地革命为建军服务，同时又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对这三大任务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随着形势的变化，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个别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抗日战争中就将打上豪筹款改为生产，解放战争后期又将生产队的任务改成工作队，但是这三大任务的基本内容却一直延续下来。

过去旧军队的传统是单纯吃粮打仗，受其影响，红军初创之时很多人并不愿意从事群众工作。当时被扣上“枪杆子主义”帽子的毛泽东，却极力反对这种旧军队的传统观念。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指出：“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大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个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同时在各项工作中（如组织苏维埃、暴动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一年多以后，毛泽

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又特别提出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问题。此后，毛泽东又长期在军队中强调三大任务，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贯彻这三大任务的一系列方法，从而使人民军队能够形成一种以往军队所没有的全新风貌。

以农民为主体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这是前人从未遇到的新课题。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旧式农民毕竟是带有许多落后性的小生产者，在中国古代，靠号召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的财产、土地的“均贫富”式的动员，也能发动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建立起人数众多的农民起义军，甚至是扭转乾坤、夺取天下最强大的力量。然而这种旧式农民战争由于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思想的领导，只能“破”不能“立”，一时的绚丽多彩最终不过是无果之花。在建军方面，历代农民军的军制只要略具规模，就要仿照封建王朝军队的旧制，其斗争方向也要回复到改朝换代的老路上。共产党人不同于黄巢、朱洪武和李闯，毛泽东所领导创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区别于赤眉、绿林和太平军，恰恰在于建军中注入了先进阶级的领导和革命的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灿烂之花，首先在人民军队中得以大放异彩。

毛泽东在建军工作中的第一项创举，就是于上井冈山前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重要意义，一是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二是开始建立民主制度。前者，可以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正确的方向；后者，可以使军队建立完全新型的内部外部关系，确保官兵之间、军民之间能够团结一致。

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为时只有几天，就匆匆奔向井冈山，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起步。这次改编中体现的两项基本原则——党的绝对领导和民主主义，从此却成为两件强大的武器，为摧毁旧式军队传统和建设新型革命军队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以后人民军队建设中日益完善的各项政策措施，都是这两方面内容的延续和发展。那个位于江西宁冈县境内偏僻的三湾村，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从三湾改编起即扩大了党代表的派驻范围，尤其是将其建立到连一级，从而使党的代表制度深入到基层，并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使党的组织和党员直接掌握了士兵。在叶挺独立团成立初期，全团2000余人，只有20余名党员（基本上都是军官），全团只有一个党支部，各营只有党小组。北伐战争期间，部队中党员虽然增加了好多倍，可是部队也扩大了几倍，党组织相对薄弱的情况并未改变。尤其是军中的党组织没有建立和深入到基层，无法很好地掌握雇佣来的士兵。在胜利凯歌高奏的顺利形势下，部队还好带，一遇逆境就必然出现严重的混乱动摇。三湾改编后，做到了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这些党员又大都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部队的巩固性很快大有改观。毛泽东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66页）

在军中实行党代表（或曰政治委员）制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而是起自于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后苏俄红军全面实行了这一制度，并将其传到中国。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中普遍建立了党代表制（团一级称为政治指导员，团以下则无），可是当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

监督军事首长执行党的决定。这种军中的监察制如走上极端，可比诸古代之“监军”、现代之特务。国民党军后来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其实所起的就是这种监军兼政治特务的使命，结果在军中为官兵所深恶，政训人员本身也如过街之鼠。这种扭曲了的党代表制和政工制度，到头来只能走向它的反面。

毛泽东从事建军工作之初，就注意到处理好党代表（政委）与部队军事首长、下级士兵之间的关系。党代表作为部队的政治首长，既负部队的政治领导之责，又是军事领导的帮助者，以“两长制”共同实行领导。对于广大士兵，党代表、政工人员则是他们切身利益的代表者、疾苦痛痒的关怀者，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曾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政委”、“指导员”的称呼，一直是带有亲切之感的贴心人的象征。

与中国旧式军队相反，毛泽东历来不主张部队以将领个人为中心，而是以军中的各级党组织作为统一领导部队的核心。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团或营以上单位建立党的委员会，决定部队的一切重大事务。中国近代军阀部队兵随将走，一个将领倒戈通常即可拉走整个部队；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史上，凡是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制度的部队，就绝无此种现象。发生整体性叛变的部队，都是刚刚起义或未经改造的旧式武装。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张国焘。当他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义统辖部队时，可以指挥为数几万人的整个红四方面军。可是当他一旦丢下共产党的旗号公开投向国民党，不仅原来的下级干部不跟随，甚至连警卫员都与他划清界限，最后落得孤身一人狼狈逃走的结果。张国焘叛变时蒋介石曾欣喜若狂，并从旧军队兵随将走的观念出发，认为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要戴笠很好地加以运用，以对共产党军队特别是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进行拉拢策反。可是到头来走狗不走，费尽力气也拉不出一连、一排、一班，毫无所获。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威力，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现出来。

毛泽东同旧军队传统实行决裂的另一项大胆创举，就是在军队中实行民主主义。过去的封建军队历来实行森严的等级压迫，即使是农民起义军也是水泊山寨式地排座次，如太平天国成军后不久，名义上人人称“兄弟”，其诸王特权威福之盛已不亚于清王朝。在国民党军中，非但其杂牌的军阀部队黑暗无比，即使是中央系统的军队也只是口头上标榜民权，实际上其官兵关系仍基本承袭军阀部队的传统，士兵军饱动辄被克扣，官长则是“五皮主义”（皮靴、皮武装带、皮包、皮枪套、皮马鞭）。自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起，毛泽东则要求全军官兵在生活待遇、着装上保持一致，同甘共苦。士兵有说话的权利，士兵委员会能代表战士发表政治上、经济上的意见。陈毅于1929年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中，介绍红四军内部的情况：

“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看见顶顶大名的红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绰号。”

如此破天荒的举动，正如红军中的一副对联所云：

“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
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中国红军产生于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度，实行这种民主主义，所遇的阻力非常之大。仅以红军提倡不打人一事而言，尽管一再强调，但是开始总是有些干部不照此实行。红四军下井冈山到达闽西后，队伍迅速扩大，思想工作有所放松，旧有的军阀习气又有所抬头。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工作后，于1929年12月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的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废止肉刑问题”，列举了在“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并举例说明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这方面的问题：

“各部队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到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肖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的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发生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

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在他亲自起草的《决议》特别指出：

“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痛苦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怨恨空气，甚至发生自杀的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116—118页）

为克服这种影响军队建设方向、“危险不可胜言”的不良倾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艰苦工作。通过从制度上、思想教育上、作风培养上一系列努力，终于在全军中切实形成了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基本平等（根据工作需要略有差别）的全新面貌。同时，毛泽东还带头反对并废除了旧军队靠枪毙逃兵以巩固部队的作法，对开小差者，除携枪投敌外，一律不许枪毙，以教育为主，强调革命靠自觉自愿。这些作法，是对旧军队阶级压迫制度的大胆破除，成为过去人们难以想象，其后却成为现实的创举。

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由雏形逐步发展到基本成型，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直到1980年，黄克诚在针对社会上否认毛泽东的思潮有感而发的讲话中，仍深情地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在建军道路上进行开拓的伟大意义。他对此回忆道：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

主席当时是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是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能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这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可是后来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黄克诚回忆录》第3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率身垂范的伟大统帅的魅力

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需要有带动部属和影响全军的魅力。他个人的作风，往往也会成为整个军队的风尚。古代有识之士就强调统兵者的“正身”问题，如《论语》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原则，是向官兵注入革命的思想。要达到这一点，同样需要领导者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表率作用，如果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空洞宣传，要别人冲锋陷阵，必然被士兵讥讽为“卖狗皮膏药”，即使言词再动人，这样的政治工作也会无济于事。毛泽东从他投身于建军工作之初，就率身垂范，为他倡导的建军原则作出了榜样。他和他的战友们树立了良好风尚，带动了整个革命军队，随后也长久地影响了全中国。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就曾有以个人表率作用在危急时带动部队的事例。工农革命军上山后已是10月，干部战士都身着单衣，为解决棉衣毛泽东又率部下山游击。由于地形和敌情不明，部队到了遂川大汾镇后就突遭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在仓促撤退时部队出现混乱，许多人跑散。随毛泽东撤到黄坳的官兵只剩下30多人，伙食担子也跑丢了，大家又饿又累，散坐四处。一时人心涣散，部队面临解体之危。

值此存亡危急关头，这位被干部战士瞩目的“中央派来的毛委员”首先站起，一反平时文人的举止，以他十几年前当兵时学过的立正姿式双足并拢，身体笔挺地大喊：“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情绪低落的战士们一见带头人如此，也鼓起劲头站队，向毛泽东高大的身躯看齐。这一小队人集成严整的队伍后，不久又汇集起大队人马，并重新振作起战斗的精神。这种“站第一名”排头兵的行动，在军心动摇的紧要关头，避免了部队瓦解，并激励起官兵继续奋斗。

红军创建之初，在那“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稻草），盖身上”的环境中，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最高领导人与战士们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1928年人冬时山上已经降雪，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叙述部队的情况是：“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页）旧军队一遇薪饷不济就会哗变、溃散，红军却能忍受人世间各种艰辛而坚持奋战，靠的正是这种上下一致，“什么人都一样苦”的作风。

在人民军队中，为克服以上压下、打人体罚的封建余毒，毛泽东也以身作则，努力在党内军内的上下级乃至亲友之间建立平等的同志关系。毛泽东

本人虽然是封建体罚方式坚决的反对者，过去在家庭内也强烈反对自己的父亲打人，然而他自幼所受的封建家庭影响，以及其倔强和强烈的个性还是在行动中有所反映。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时，曾回顾起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件事，即他自己同在军中工作的弟弟毛泽覃争论一个问题，因毛泽覃不听哥哥的话，毛泽东也要动手打弟弟。毛泽覃随之质问，“你怎么打人？”毛泽东想到党内军内的规矩，也就不打了。事隔30余年后毛泽东还将此事提到发扬民主的高度来检查，这既表现出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在中国革命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需要由领导人带头，才能带动下级官兵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

毛泽东以身作则培养起来的官兵一致共甘苦，官长不打骂下级的民主作风，自红军时代起一直长久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当时打土豪偶然得到一件皮袍子，也不是先给领导，而是留给夜间站岗的战士轮流穿着。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为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发了军衔和呢制军眼、皮靴，可是除了在统战工作的场合外，军队高级干部根本无人穿着。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样穿打补丁的衣服。著名华侨资本家陈嘉庚于1940年到延安参观后，曾谈到他最为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朱德陪他参观时从抗大分校前经过，里面正在打球的学员喊着“总司令，来一个！”朱德随即上场，这种“无复阶级如是”的场面，使陈嘉庚久久感怀。“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当时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弱于国民党，延安的物质条件远远不如重庆，可是全国有志向的青年大批投奔陕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部廉洁平等。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这条著名的毛主席语录，曾是人民军队所有成员最熟悉的座右铭。毛泽东本人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也是这句话的最好实践者。在那阶级对垒、生死厮杀使许多军人变得感情迟钝冷漠的岁月里，毛泽东对于自己政治上的对手毫不容情，可是对于自己的马夫、警卫员和身边的战士却一往情深。在延安时期，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长张思德因烧炭出事故而亡，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地批评团领导：“打仗死人没办法，搞生产死人不应该”，并亲自出席追悼会。三大战役刚刚结束时，毛泽东得知跟随他多年的马夫老侯去世，马上暂放下手上指挥百万大军的戎机到墓上哀悼。在人生取向方面，毛泽东始终同情苦难的劳动人民。在军队中，毛泽东同样也最关心穿着军装的普通群众，统帅的感情和作为军队基础的广大战士的心始终是相通的。

恰恰是由于毛泽东的感情与千千万万普通的下级干部、战士相通，最知道他们的需求和理解能力，所以能够在群众斗争中很好地总结建军的经验，并且能够很快将这些经验通俗化，灌输到那些大字不识多少、刚刚投身于革命军队的贫苦农民的头脑里。

1928年5月，当湘南起义队伍刚刚到达井冈山山下，毛泽东就亲自向队伍讲话。由于这次讲话既通俗易懂，又道理深刻，当时率领宜章农军的肖克事后多年还对此回忆道：

“队伍集合在一片葱绿的山坡下，毛主席站在高高的青石板上，对我们讲话。开头便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的战士，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罢。”（肖克：《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引自《人民文学》1977年9月号）

这个简明的“二、三、四”的道理就是：

“二”，是指两种战争。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古今中外不断地打仗，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三”是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

“四”是说，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

如此言简意赅的概括和通俗讲解，胜过当时党内许多脱离群众的鼓动家们所书写的洋洋洒洒、动辄千言的“八股”式文章说教，对红军官兵的教育作用也远远胜过那些译自苏联的厚厚的政治教科书。且不要说那些刚刚暴动翻身的“泥腿杆子”，即使像柳亚子这样才高八斗的文人学士，也追忆与毛泽东的交往是“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毛泽东本人在宣传群众和激励指战员方面的才能，堪称将统帅和政治鼓动家相结合的最好榜样。一向对毛泽东深为不满的那位洋顾问李德，在其晚年那篇题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中曾竭力攻击毛泽东，同时却也承认毛泽东影响官兵和广大群众的过人之才，并描绘说：“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毛不仅在私人谈话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奥托·布朗《中国纪事》第74—7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正是这种令中国的农民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革命部队倾倒的魅力，决定了中国革命军队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所选择的统帅，是“农家子”出身，又有深厚中国文化功底的毛泽东，而下是长自高门又食洋不化的其他领导人。在毛泽东的身上，形成了一种几十年持续不衰的罕见的号召力。

在随时充满了牺牲可能性的残酷战争中，毛泽东还一再表现出了蔑视危险的非凡胆略，为激励全军以身示范。这一点，不仅在红军力量弱小时例子甚多，直至1947年转战陕北时仍是如此。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1亿人口的根据地，有100多万军队，党中央大有回旋余地。放弃延安后，毛泽东及党中央机关只要向东渡过黄河，就可进入并无敌踪、十分安全的晋绥解放区。然而，毛泽东却表示，陕北人民养育我们十几年，现在敌人进攻，不能丢下他们就走。此外，还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不顾许多领导同志相劝，只让中央后方委员会进入晋绥解放区，自己随身仅仅带了四个连的警卫兵力，就毅然留在陕北，并有意让蒋介石知道，以吸引国民党军当时唯一能机动的战略集团——胡宗南部。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曾几度遇险，有时身后敌军四个多旅追兵点起的篝火都可看清，毛泽东却谈笑自若，并坚持不过黄河。这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豪迈壮举，不仅吸引了国民党军西北集团的重兵不能他调，也极大地鼓舞了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广大军民。毛泽东骑马率中央机关通过陕北的集镇村庄时，认出他的老汉、娘姨、后生们无不激动万分，许多人热泪盈眶，纷纷簇拥上来欢呼口号。在当时物质条

件最为艰苦的西北战场上，“毛主席还是在陕北”这句话，已经是激励部队和群众最有力的动员口号。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夕，毛泽东虽然没有亲临前线，却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第一批入朝。尽管身边的同志还有江青都曾劝阻，毛泽东却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于是，毛岸英成为彭德怀所说的“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注：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牺牲在朝鲜，埋葬在朝鲜，这对全国亿万军民又是无声的、却最有力的精神榜样。对于出兵朝鲜，有些人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绪，然而在最高统帅的这一带头奉献的表率面前，谁也无话可说。

在世界战争史上，一个统帅的表率作用往往对下属产生着最大的影响力。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行军艰难时，只许伤病兵骑马，而自己带头步行。这为时短暂的一次行动，使千千万万法国老兵和国民感怀不忘，在拿破仑去世后甚至超过了对其武功的颂扬。中国革命战争时间之长和斗争之艰苦远非拿破仑战争可比，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本人一直在战场上、在生活上率身垂范。他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在饮食上的最高享受也不过是偶尔一顿红烧肉，在衣着上长期与普通干部保持一致，其榜样作用在世界近现代战史上确无可比拟。

进入七十年代后的毛泽东已值垂暮之年，此时他特别愿意怀旧，常在病榻上久久地翻看过去的照片，而其中最眷恋的一幅，就是他穿着有两个大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窑洞前讲话的照片。那幅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之手的佳作，也恰恰是那个年代上下一心、同甘共苦的写照。正是这种官兵一致的精神，以惊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把千百万军民从五湖四海集合到一起，“毛主席万岁”一词长年成为团结全军、鼓舞人民的神圣号召。虽然有些后人认为这带有个人崇拜的色彩，然而在当时却发挥出巨大的“精神变物质”的转化作用，成为人民军队胜利前进的强大动力。

吸收正反经验，完善各项制度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人民军队的探索，是党的集体在实践中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不少领导同志研究了大革命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教训，以及初期武装斗争的经验，在继承和保留北伐期间的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军事工作好传统的同时，开始与旧式封建雇佣军队的种种恶劣风气划清界限，探索新的建军道路。1928年6月，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庄园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刘伯承等人为大会制定了《军事工作决议案》，提出了变雇佣制为志愿兵制，加强政治工作等，对全党的建军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时期在建军问题上作出最大贡献的，还首推在农村根据地中深入实践第一线、又擅长理论总结的毛泽东。

历史往往呈现“之”字形发展，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也走过这种曲折的道路。例如：在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犯过忽视兵权，未能破坏旧的雇佣军队制度的右倾错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军中又屡屡出现“左”的错误。此后在克服一种偏向时，往往又会走上另一个极端。在同“左”右倾路线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及时克服了建军工作中两个极端的不良倾向，像一个身处惊涛骇浪中的舵手，把握住航船的正确方向。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专制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军队内强调民主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被称为“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小农经济固有的局限性、狭隘性和封建地方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新建的部队中表现出来。把这种“极端民主化”与旧式农民意识结合起来，军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志，并会姑息迁就落后现象。

红军初创时期部队内实行民主时，有许多下级干部战士走上另一个极端，对上级决议、指示如感到不合意即不愿执行，甚至有过打仗前大家举手表决，不愿去的可以不去的怪现象。在井冈山斗争中，红四军第29团是刚刚由湘南暴动农民组成的，其士兵委员会反映士兵意见时，以想回家乡及不愿在山上坚持的错误想法为主导形成决议，而部分领导人又不能很好制止这种群众性的落后观念，结果该团军心动摇，集体跑下山去，随之溃散。红四军下井冈山后，一度曾批评了毛泽东主张的前委集中领导，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凡事都需：“大家谈，大家议”，有时为打不打一县城竟要全体官兵“讨论了数日”。如此“民主”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组织松懈和斗志涣散，使事物走向了反面。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期间特别反对了这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特别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8—89页）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原则，并强调在军内开展教育，使参加革命军队的农民脱去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战争中建军的实践证明，这种集中指导的民主生活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军情。

在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之后，“左”倾路线的指导者又搬用了苏联体制那种高度集中、机械服从的一套办法。1931年11月，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各级党的委员会，由政治委员作为党的全权代表，享有“最后决定权”。此后，一些握有更大权力的“中央代表”又被派到各部队中。这时，党对军队的领导虽继续坚持，却由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中央代表、政委（两者还经常合一）成了居于部队之上的“钦差大臣”。虽然部队中还保留党的组织，却仅是处理党务事宜的党务委员会，只接受政委领导，不能成为领导部队的核心。

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左”的路线指导下的红军政治保卫制度，也照搬苏联的“格贝乌”体制，部队中的各级保卫部门形成垂直领导，甚至成为与政治部平行的机构。各军、师的保卫局只听命于方面军或中央的保卫局，抓人、杀人一般不通过本单位的首长，甚至对本单位领导还有监视之权。这种脱离群众的特殊化、神秘化的保卫制度，加上错误的肃反指导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打“AB团”、“改组派”和所谓“社会民主党”等悲剧的出现，以及红军中大批无辜者被捕被杀，一时人人自危的不正常局面，可以说都与这种体制有关。

为在军队加强党的领导，应实行派遣党的代表、设立政治委员制度；为巩固部队防止敌特内好的破坏，确实需要建立政治保卫制度。可是在“左”的路线指导下，这两点走到极端，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一个“钦差大臣满天飞”，一个肃反扩大化，给红军和各根据地带来巨大的危机。如著名的洪湖苏区，由“中央代表”夏曦主持的大“肃反”，因捕风捉影般病态式地疑神疑鬼，竟杀掉了军内的绝大部分干部，红二军团几乎从内部自我毁灭。其他各个区域的红军和各苏区，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类似情况。这种严重的

自我内耗，再加上外部敌人的“围剿”，造成了南方根据地全部失陷的局面，当时还很弱小的人民军队也差一点濒临绝境。

吸收这无数人命换来的血的教训，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确立了领导地位后，长征到达陕甘苏区，首先就纠正当地肃反的错误，命令停止乱捕人、乱杀人，并释放了无辜被关押的刘志丹等同志。此后，毛泽东制止了在党内军内以杀人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的作法，并强调保卫机关必须置于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结束了军内对苏联政治保卫制度的照抄照搬。由于保卫工作只限于锄好反特，这就保证了军队内部的安定。干部战士敢说话，不怕动辄被打成“反革命”，民主生活就在较长时期里得到保证。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又着手纠正过去“钦差大臣”式的领导方式。经中共中央决定，在部队的团级以上单位设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从而改变了过去事实上的政委“一长制”，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军政委员会类似党委会，不过这种体制还只限于首长的集体领导，没有自上而下的党的统一领导体系。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还是恢复军队中的党委制为最好。因此，在1945年春党的七大期间，重新确定应依照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的党委会。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全面恢复了各级党委，毛泽东还亲自书写了《健全党委制》等决定，确定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41页）的原则。这样，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成为党对军队实行领导的根本制度，并长期坚持下来。

解放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空前大发展的时期，军队数量在4年间从120多万人发展到500多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解放战士”、“解放军官”，即原国民党军官兵。特别是经常打大仗，俘敌多，战场就地补充多的部队，俘虏成分一般占了总人数的大半。这些人在战场上就地“换帽子”，马上补充到解放军中去，旧军队的思想作风却不可能随着青天白日徽一下子丢掉。如果只能大口吃掉敌军，却不能很好消化，这么庞大的新成分及其带来的不良思想反倒会造成我军严重的内部疾患。

通过在实践中探索，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又寻找到这种“消化剂”，就是毛泽东所归纳的“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91页）。这一运动，也使人民解放军中的民主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开展诉苦，在当时条件下是最联系实际并最为有效的阶级教育。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国统区的兵役制度由募兵改为“征兵”。实际上，在极其腐败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国家那种全民义务性的征兵，国民党政府征兵的实质就是抓壮丁。有钱人行贿则可逃役，穷苦人才被捆绑押送到军队，靠官长的阶级压迫及枪毙逃兵的威胁强令其在营打仗。这些国民党兵绝大多数也是苦大仇深，一经共产党进行阶级教育，让他们联系受苦的实际，控诉国民党的阶级压迫，很快就使他们明白了谁是自己的敌人，应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对当时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的士兵来说，不需要多少高深的道理，一场《白毛女》，一场《血泪仇》，就能使大多数人声泪俱下，举枪高呼“打老蒋”。在各解放区都有这样的事，演出《白毛女》时，部队要事先收起子弹，免得许多人因临场激动而开枪，使扮演黄世仁的演员有性命之虞。通过诉苦，同样一个人，昨天在国民党军队中怕死保命，今天在解放军中却一下子就能变成无畏的勇士。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可以很快改造这些

不久前战场上的对手，达到西方一些人当年惊叹为“洗脑”的效果。

新式整军的开展，又促进了军队内部民主的大发扬，著名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就是在这一时期总结出来的。

三大民主是人民军队内部民主主义制度化的最生动体现。为此，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从红军初创起就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就仿效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方式，建立起士兵委员会，作为代表士兵民主权利的组织，同时也是对官长的监督机构。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又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委员会内建立俱乐部，扩大了士兵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后来这一俱乐部又在红军中变为“列宁室”。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八路军、新四军中又建立了同一性质的“救亡室”，至解放战争期间再改名为军人俱乐部，以后又成为革命军人委员会。

从士兵委员会到革命军人委员会，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建立民主制度的又一创举。士兵们可以通过这些代表自己的组织，在政治上取得和干部一样的权利，可以批评官长，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在作战指挥问题上，士兵们可以通过士兵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组织不仅活跃了民主生活，还开展文体活动，密切官兵关系。此外，代表士兵权利的这一组织还监督各单位的财物开支，管理伙食。这些作法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渐完善并转为制度，解放战争期间总结为人民军队内部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成为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如同斯诺的名篇《西行漫记》的正式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所寓意的那样，在长期黑暗的专制统治下的千年古国里，民主主义首先在人民军队中放射出光芒，从而为全国革命群众辉映出民主革命的奋斗方向。

人民军队中的三大民主，在当时极其艰苦和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产生的威力是不可估量的。旧军队那种“上一呼而下百诺”的官兵关系，被干部战士平等相处，官教兵、兵教官的新型关系所取代。即使在过去一向作为军官专制的作战指挥中，士兵也有了被称为“军事民主”的自主权利。此事的可行性曾为许多人怀疑，可是解放战争的实践却证明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当陈毅从华东战场到中央汇报时，毛泽东针对部队作战中实行民主一事问陈毅：“你看这样会不会造成部队不服从指挥员的命令，应当撤出战斗时撤不下来，因而发生毛病呢？”陈毅回答说：“不会的，因为这样的民主是正确的，适合打胜仗的要求。战士的眼光是明亮的，他们一心一意也是为了打胜仗，他们辨别能力是很强的。应当坚持与不应当坚持的决定权是掌握在指挥员手里，加上倾听下面的意见，只有使领导与指挥顺利而不会发生反作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教程》第904—905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正是这种军事民主，使领导决心与群众智慧相结合，产生了极其巨大的战斗力及高度灵活机动的战术。解放战争期间的许多攻坚战斗，都是靠干部战士开“诸葛亮会”，研究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胜方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拥有空前强大人力的美军，也正是靠着发挥群众的智慧才想出了许许多多战胜敌人地面强大火力和“空中绞杀”的以“土”制“洋”的妙计。例如：在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部队领导曾决定将一支近3000人的突击队于白天潜伏在敌人阵地前，参战部队感到困难很多，只要有一个人因咳嗽、翻身等不慎的举动暴露目标，就会遭致重大伤亡和整个潜伏攻击的失败。但

经过准备，参加潜伏的部队全体指战员集体动脑筋想办法，提出了一整套保持隐蔽、静肃的办法，并选择与攻击目标近似的地形进行反复演练，确定可行后，再加以实施。结果，这样多的部队在敌军眼皮下潜伏了整整一天，待天黑攻击开始后一跃而起，迅速夺取了敌军阵地。

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占主体的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这些建军道路上的创造，改变了军队的精神面貌，不仅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完全新型的干部和战士。在履行战斗队的任务时，他们能够以低劣的装备，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在履行工作队任务时，他们可以改变社会制度和风尚；在执行生产队任务时，他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甚至创造了军队不吃官粮还上交公粮的奇迹。变军营为育人的学校，变纯消费为生产，变破坏组织为建设单位……毛泽东早年“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在人民军队建设中有了最丰硕的成果。

确定全新的建军宗旨和纪律

“为人民服务”一语，当今中国的每个成年人都极感熟悉。几十年来，它也是人民解放军官兵在受到问候时的标准答词。此语的由来，正是毛泽东在追悼中央警卫团一个班长张思德时所作的演说题目，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并由此产生出政治工作的原则和军队的纪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有其丰富的具体内容。一方面，这一口号要反映在建军的宗旨上，即战争年代常说的“为谁扛枪，为谁打仗”，部队所到之处，要解民倒悬，出诸水火；另一方面，它还要反映在日常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具体行动上，并由此产生了人民军队特有的纪律。

古今中外的军队要处理内部外部关系，都必须有军纪，中国旧式军队也讲究风纪。可是反人民的旧式军队的军纪，其核心是要求士兵盲目地绝对服从于军官，提倡和实行“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口号下任意驱使士卒。旧军队的风纪注重的是对内对外观瞻，在军内养成官长的至尊，在军外造成对百姓的威严。至于涉及军民关系的内容，则不属于旧式军队条令的范围。

当然，中国历史上许多军事家也知道纪律对争取民心的重要。所谓“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史书中亦有可见。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曹操“割发代首”，李自成“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口号，曾是古之美谈。然而这种争取人心的宗旨是要民为己服务，自己却并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何况旧式军队的性质决定其组织形式通常是“集天下不义之人，日授以杀人之事。”社会上的习惯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那些在“招军旗”下应募入伍的“吃粮人”，大都是生活无出路的破产农民以及社会上的“不逞之徒”。这些带有严重破坏性的成分，在旧式军队中也不可能严守纪律。旧式军队的一些纪律虽在表面上与人民军队相同，却有实质上的区别。

作为人民军队统帅的毛泽东，从他一开始从事建军工作起，在纪律问题上就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建军之初，弱小的革命军队能否生存，首要条件是能否取得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而迫切需要新生的部队能有一整套全新的良好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人创建军队时接受的是旧军队的遗产，在纪律方面也是如此。北伐战争时期的“铁军”以军纪严明著称，可也毕竟是旧式纪律。特别是一遇革命遭受挫折的逆境，部队内部不服从命令，对外乱拿老百姓的东西等违纪行为就层出不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恰恰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部队受挫退上罗霄山脉中段，一路上也出现了严重的纪律涣散现象。面对当时军内外的实际，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宣布了非常简明的三大纪律：

- (一) 行动听指挥；
- (二) 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 (三) 打土豪要归公。

这言简意深的三大纪律，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而且“红薯”、“打土豪”这类词汇，还体现了井冈山斗争特色，以后，第二条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改为“筹款要归公”，这样就确定了军队内部关系、对群众的关系和生存措施（打土豪）这三方面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确立人民军队纪律之时，恰恰是党内“左”倾盲动思潮一度泛滥成灾之际。这一思潮体现在对外关系上，是烧杀政策，不仅将一般工商业者全部扫荡，甚至连贫苦农民的房子也一起烧掉，口号是“变小资产者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所造成的结果，在经济上是严重的，如“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来阳起，即未能等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1928年7月4日中共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致湖南省委的报告）在政治上，则更得罪了社会上多数群众，许多起义部队和新建的革命政权恰恰因此而失败。

当时，深入实际、了解社会各阶层情况的毛泽东，坚决反对了设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央确定的烧杀政策。看到湖南省委实行烧杀政策以致失去群众的严重恶果后，毛泽东特别注意制定纪律时要维护群众的利益，并保护正当的工商业，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了人民军队的纪律。

1928年初，毛泽东在分兵发动群众时，根据部队在执行纪律时的一些具体问题及老百姓的各种反映，在三大纪律之外又规定了六项注意：

- (一) 上门板；
- (二) 捆铺草；
- (三) 说话和气；
- (四) 买卖公平；
- (五) 借东西要还；
- (六) 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时，毛泽东又根据他人的建议增加了两项注意：

- (七) 洗澡避女人；
- (八) 不搜俘虏腰包。

这第八项注意，涉及到一个新领域，即对敌斗争的政策问题。正确地对待俘虏，不打不杀，尊重其人格，不动其私人财物，这是对敌军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最有力的教育和争取。实行了这一纪律，就为后来确立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

至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形成。由于作战环境的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某些具体内容后来又有所变化。如部队在南方宿营，要“捆铺

草”，人民军队后来主要在北方活动，就大多不需要捆铺草。直到1947年，毛泽东根据全国范围内各部队在战争环境中的共同需要，重新统一规定并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看起来多是些说话和气和涉及到买卖东西、借还物品之类的小事，但它是无产阶级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用通俗易懂、生动具体的语言，把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群众纪律的内容溶为一体，更易于为广大官兵理解和执行。它的内涵，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规定，而是一个关系到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大事。

正是由于实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军队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环境中，所到之处，立即以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驻地的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哪家住红军，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的作风。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时，人民军队的这一光荣传统也使异国人民感动不已。曾亲身感受过日本军队、苏联军队、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所作所为的朝鲜群众，一致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世界上纪律最好的军队。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人民军队不仅内部的官兵友善，对人民群众关系亲密，而且宽待俘虏的政策是古今中外做得最好的。广大干部战士对敌作战勇猛顽强，战斗时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可是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及敌国的人民却讲人道主义。八路军在百团大战的火线上救出父母双亡的日本小姑娘，被日本人民传为佳话，战后旧日本军人战友会亦为此向中国老战士敬赠纪念品，表示钦佩八路军的武德。中国革命军队的俘虏政策虽为敌军高级长官惧怕，却始终不能制止其影响。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对深受“大和魂”及“武士道”毒害的日军俘虏加以宽待和教育，使他们觉悟过来，建立起““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组织，配合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贯彻了“以战养战”的精神，在火线实行“随俘随补”，对战场上俘虏的敌兵经过短期教育，即补入部队成为“解放战士”，使我军既能连续作战，又越打越多。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英国等国的军人，在中印边界之战中被俘的印军官兵，获释后大都盛赞中国军队。笔者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时，曾遇到一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军人，尽管其政治观点与我们不同，但他们都对中国的军队表示敬佩。他们还特别说明，这不仅仅是由于作战勇猛，还在于中国军队优待俘虏，有高尚的武德；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作战虽凶猛，却残杀战俘和平民。事隔几十年后，毛泽东确定的优待俘虏政策还能留下如此长远的影响，令人感慨不已。

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最艰苦的实践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延安时期则是毛泽东理论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对建军思想也做了最为深刻的理论总结。1944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导下，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其中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方针问题，也丰富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

报告中多次提到，为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任务，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报告正是针对这“七个关系”，确定了正确处理的准则。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及其纪律，正是处

理这七个关系的基本保证。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不倦的探索下，人民军队建设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果实。正如朱德在党的七大上所评价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即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朱德选集》第158页）。这三大特点，正体现了人民军队建军的三原则。直至今日，这三原则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的指针。

在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建军原则的指导下，人民军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优良作风。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同国内敌人几十年的战争中，一直使阶级敌人为之胆寒；在同世界上头等帝国主义军队的交锋中，也表现出令对手惊叹的勇气和力量。

“铁流二万五千里”，可称为人类历史上英雄主义史诗般的辉煌壮举，这种万里长征成为对红军素质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在强敌围追堵截、不断轰炸的严重情况下，红军又失去了根据地依托，终日在偏僻荒凉的崇山峻岭及江河大川跋涉。经过不毛之地，瘴疠之乡，与原始部落接触，语言不通，道路不明，不仅物质补给极为困难，甚至在雪山、草地这样自然条件恶劣的区域还遇到空气稀薄、沼泽遍地等艰险。但在毛泽东率领下，红军能够克服重重险阻，最终到达陕北。经历过万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成为坚强的革命斗士的楷模，长征精神也成为人民军队此后几十年里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宝贵财富。

在抗日战争敌后反“扫荡”的艰苦战斗中，面对凶悍无比的日本侵略军，由红军编成的八路军、新四军表现出惊人的战斗意志，并使自己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侵华日军的司令官到下级官兵，都承认中国军队中战斗意志最为坚强的部队是八路军。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是当时八路军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在1941年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战斗中，5名战士在狼牙山与500名以上的日军苦战了一天，杀伤了数十名敌寇，打完子弹后即砸毁枪支，面对着逼向山顶想抓俘虏的日军毅然跳下了悬崖。当时在对面山上的战友看到此情景，为之感动万分，同时也惊奇地发现，上到狼牙山顶的日军居然集体向崖下三鞠躬，对这些中国勇士表示钦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志愿军名义出国作战的部队发扬国内战争中的顽强精神，面对着世界战争史上密度空前的火力，却能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又能在三八线附近筑成美军无法攻破的钢铁防线，迫使美军司令官克拉克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并声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未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过去几万八国联军可以横行中国，二万日本关东军就可占领东北，可这时上百万的“十六国联军”在国门之外就被打得大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在对外战争中最为扬眉吐气的一次胜利，在世界上一扫过去积贫积弱的形象，大显了国威军威。而这些胜利，又都是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在旧中国那种黑暗、腐败的军事基础上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建国之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人民军队的建设进入了高级阶段，为此毛泽东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新的探索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蹈入误区的遗憾。但是不管怎样说，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强大的国防军的基础，已经在以毛泽东的名字为代表的时代里奠定，在今后的历史时期里，这仍将是维护我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最

重要的保证。

第四章 驰名世界的人民战争大师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受到了最高的礼遇。会议开始后，他在赫鲁晓夫陪同下最后步入会场，各国领导人和代表都起立热烈鼓掌欢呼，身边那位想自居于国际共运中心地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也显示出谦恭之态而让毛泽东先一步。毛泽东的事业和威望，此时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高峰。特别是他在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军事斗争中能成功地动员亿万群众，以规模举世无双的人民战争取得震惊寰宇的成就，不仅在中华大地上受到无与伦比的称颂，也使全世界革命者和进步人类为之由衷钦佩。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持续时间达22年之久，动员了成千万的人民群众和数以百万计的部队直接参战，举行战役达400多次，消灭敌军近千万。紧随其后，又先后派出200多万部队和60万民工入朝参战，进行了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不仅将本国反动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且与世界上最凶悍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有最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以及参加“联合国军”的英国、法国等国家军队都交过锋，均战而胜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长达20多年的战争规模之大，在世界战争史上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其内容之丰富，斗争之曲折艰辛，在国际上鲜有其匹，功绩何其辉煌！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后只有千数人的小队伍起家，相继战胜了一个个强大的对手，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并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也取得胜利，其军事理论与实践的正确，为举世所公认。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军队从小到大、以弱胜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始终紧紧地依靠了人民，坚持了人民战争这一法宝。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并且成为这位伟大军事家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

从“农村军事化”起步

毛泽东于1927年秋投身武装斗争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尤其是一个在国内早享有“农民运动之王”盛名的群众斗争的组织家。这一点与战争史上其他著名军事家从戎之初相比，使他具有特殊的优势，即一开始就能把军事斗争放到政治大革命之中进行，将群众运动与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作战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走入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发动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支援和投身革命战争，成为毛泽东开始人民战争探索的第一步。

自1927年南昌起义和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发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正确方向。但进一步具体而论，人民群众是生活在一定区域中的，要发动他们进行人民战争，就必须选择正确的地域建立战略基地，以适当的形式来动员、组织群众。当时，党内虽然喊“工农革命”的口号，许多人却不明确究竟是以“工”或者以“农”为主要动员力量，更不知道如何发动人民群众，以及怎样使革命军队与人民相结合。刚开始进行武装暴动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又是才从旧式军队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既没有现成的基地，也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反动统治阶级以城市为主要据点的情况下，只有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穷困山区才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共产党人到那里去建立根据地，才能有效地动员人民，

建立夺取政权的基地，经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最后夺取政权。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党内许多人经历了许多惨痛的教训和很长的时间，才懂得了这一点。在同时代的人中，毛泽东恰恰成为最早在这一道路上进行探索的先驱。

南昌起义的部队军事力量虽强，却没有很好解决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起义后不与湘鄂赣三省的农民暴动密切合作，只想打回广东再取大城市。在南下的路上，群众纷纷躲避军队、连抬担架的民夫和卖茶水的老乡都找不到，部队越走减员越多，随后又在孤军苦战中失败，自然在所难免。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一开始就提出要帮助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可是起义部队军事力量弱，仅仅几天就被敌军击败。军队站不住脚而被迫向南撤走，革命政权建立不起来，土地革命的措施无法实施，发动群众也就无从谈起。

吸取了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随后进行井冈山斗争时，就首先解决“安家”即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有了“家”，部队就有了整顿、训练的基地，伤员有地方收容治疗，其他人打仗也增强了勇气。同时，在安“家”之地又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政权，可以动员群众参军，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并给部队送粮送物，对付强敌进攻也有了一系列办法。朱毛红军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终于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开辟出一条积蓄革命力量，并有效地实行人民战争的道路。

在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斗争中，毛泽东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又是党、政、军、民如何一致对敌进行军事斗争。正如他当时说的：“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3页）为了解决这一前人没有现成答案的难题，毛泽东着力对如何贯彻党政军民“一齐军事化”进行了探索。通过开辟根据地和应付敌人一次次“进剿”的实践，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后来成为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原则，其要点有以下几项：

一是要以强有力的党组织对战争实施统一的领导。在群雄并起并以旧式农民为主要参加者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同时还要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才能统一地组织起方方面面的力量有效地进行对敌斗争。毛泽东开始指导战争时，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随后又要求以党的组织作为团结和组织根据地政权、军队和群众的核心，并以党的正确领导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他在湘赣边界党的代表会议和古田会议时就提出的这些思想，一直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首要原则。

二是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井冈山斗争及苏区反“围剿”的胜利都证明，有根据地依托，红军才会如鱼得水，有群众支援方能打胜仗。在强敌压迫的情况下，一旦离开根据地，自己就会耳目不灵，供应不济，伤员无处安置，士气也难振作，敌人却会气焰嚣张地敢于猛冲猛追。井冈山斗争时，红军两次远出湘南均遭失败，毛泽东率红四军下山到赣南也一路遭敌追袭而十分被动，后来利用蒋桂战争，在赣南、闽西建立了根据地后才重新开创了新局面。又如红军在长征途中处处站不住，走到陕甘苏区这块仅剩的根据地才有了落脚点。所以，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前期、中期，无论人民军队向哪里进军，毛泽东都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这样才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三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虽然要靠广大群众来进行，

然而军队却是其中的骨干力量。在井冈山斗争时，上级党组织曾有过要红四军外出作战，只留赤卫队和当地武装守卫根据地的指令。可是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证明，“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0页）地方武装如离开了主力部队，根据地就会招致失败。因而在此后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一直强调在根据地内要加强军队建设，并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

四是必须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大革命失败后一系列武装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实践都证明，单单有革命军队而没有群众配合，军队就会成为“独臂将军”，在数量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面前绝无取胜的可能。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就在后来名力《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需要具备的条件中第一条即是“有很好的群众”（《毛泽东选集》第57页）。为了使群众能够有效地参加和支援战争，又必须对他们进行动员、组织和武装。在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农民协会的基础上，井冈山斗争时期又在根据地广泛组织起暴动队、赤卫队。在后来的斗争中，根据地内的成年男子大都被组织在民兵性质的武装组织中，中青年妇女也由妇女会一类的组织动员起来，连少年儿童都在赤少队、儿童团的旗帜下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这种根据地内的“全民皆兵”，使一切进犯之敌都视为畏途。

五是必须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中，除主力红四军之外，湘赣边界地区以县为单位建立起装备枪支的赤卫队，作为地方部队。另外，各乡还组织了不脱产的暴动队，青壮年普遍参加，主要装备梭镖和鸟枪，其性质是群众性的自卫武装。通过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地方部队需要加强，于是在中央苏区时建立了地方红军的独立师、团、营，赤卫队则成为一般群众不脱产的武装。尽管后来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名称都有所变化，但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基础却从此时即已奠定。

后来，毛泽东对这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又进行了系统总结，集中表现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的“人民战争”一节中所总结的三个“结合”，即人民军队和群众武装组织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结合”，不仅解决了作战中的相互配合、前方后方的相互配合问题，而且解决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及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问题，能够充分发挥对敌斗争的整体威力。

六是必须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与单纯由正规军进行的战争有很大的区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又要求革命军民采取不同于以往正规战的独特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一系列高度机动灵活的战法，正是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确定的。

七是必须把各种形式的斗争手段配合起来。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对敌斗争，不仅体现在军事斗争的战场上，也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之中。毛泽东从开始军事斗争起，就不是单单从军事上考虑问题，而是注重将土地革命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以后又重视经济战线的对敌斗争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而逐步扩大人民战争的斗争范围，形成以多方面的整体力量克敌制胜。

除了上述的主要条件外，毛泽东还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作战特点，对开展人民战争确定了一系列不同的方针。如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除注重苏区群众支援的条件外，还很注意利用地形条件，自由选择战场。湘赣闽各省根据地内山岭崎岖，道路梗阻，恰恰是疲惫分割敌人的最好场所，因此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红军都是以妙手将强大的进攻之敌引到预先布置好的陷阱中，实行瓮中捉鳖。1929年春，毛泽东率军下井冈山后游击于赣江东岸的兴国、宁都、乐安、石城等地的广大山区时，曾预言这一地带对将来大规模战争有作用，应在此布置根据地。果然，1930年以后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正是以此为主战场大量歼敌。直至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强调依傍山地开辟敌后根据地，将地形条件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充分利用，成为毛泽东在组织人民战争时的又一创造。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很注重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部来打。这样，即可以使人民了解我们的战争是自卫的、有理的，又能够充分发挥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及广大非武装群众参战的威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运用多种斗争形式困扰、消耗敌军，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这一全新的战法一登上战争舞台，立即显示出惊人的威力。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前期，蒋介石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依仗以黄埔系为基础建立的中央军，在全国确立了最高统治地位。作为蒋介石对手的奉系、桂系、晋系及西北军系统的各派军阀，无不拥兵数十万，并拥有整个省区或数省的地盘，可是一旦与南京政府开战，至多坚持几个月就一败涂地，只得接受收编或臣服于蒋介石。然而数量、装备及占地远不能与那些国内军阀相比的红军，却成为蒋介石始终无法战胜的对手。以蒋介石视为头等心腹大患的中央苏区而论，红军人数最多时不足10万，地盘最大时不过20余县，人口最多时不足300万，又全无外援，武器要靠战场缴获。南京政府以倾国之力，先后动员百万大军，历时几年发动多次“围剿”，却屡屡被红军打败。国民党军进攻革命根据地时屡遭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苏区军民实行的是不同于以往作战形式的人民战争，使进剿军陷入它称之为“一入匪区，四面皆敌”的狼狈境地。虽然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时利用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勉强取得一些成功，然而十年内战的实践已经证明，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的威力要超过所有武器和任何坚固的“乌龟壳”工事。正如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所总结的：“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9页）

由于有了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磨炼出的人民战争这一强大武器，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而国难当头时，毛泽东就能以乐观的态度和科学的分析判定抗战必胜。当时，一些人只从武器和正规军的素质来看力量对比，感到中国和日本力量相差悬殊，中国抗战必败，再战必亡。日本军界头目也正是据此认为可以“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即征服中国；在中国国内，一些人也得了恐日病，出现抗战“亡国论”。可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立足于动员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一起进行抗日斗争，使日军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但三个月不能取胜，打了八年反而以失败告终。

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炼，依靠人民就可战胜一切强敌，已成为毛泽东坚定不移的信念。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进攻陕北时，毛泽东拒绝进入黄河以东的安全地带，只带领4个连的警卫部队，就敢于与国民党军的几旅追兵长期周旋，也正出于认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1页）。那些头扎白羊肚手中的陕北老乡、那些可爱的手持红樱枪的娃娃和热情的娘姨们，成为掩护中央机关和解放军行动的最可靠的屏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豪情也有了最有力的现实依托。毛泽东住处距敌只有几十里，国民党军却如聋似瞎。胡宗南的部队小股行动就会被陕北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吃掉，大队出击又成了找不到攻击目标的“武装大游行”，到头来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与国民党军最后的大决战中，又是各解放区数百万支前民工浩浩荡荡的肩负扁担、手推小车的队伍，像海浪一样托起了胜利的基石。

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成功实践，证明它不仅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时也是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历来强调，我们进行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从“农村军事化”起步，把战争最终发展成规模空前宏大的人民战争，这一成功的实践最有力地验证了这一真理，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革命战争作为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人民战争，它的胜利在国际国内留下了长久的影响，也使毛泽东的名字与人民战争一词在史册中连在一起。

掌握“唤起民众”的真谛

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从来是公诸于世的。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所写的《论持久战》中就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页）“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页）这些论述，也包含着对当时的“友党”——国民党脱离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批评劝诫。但无论怎样讲，人民战争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国民党始终与之无缘。

执政的国民党人其实并非不懂得依靠群众作战的重要性，在对孙中山的纪念周上他们也总是念着“唤起民众”一词，知道“武力与民众相结合”才有力量，在实际上却做不到这些。究其原因，还在于人民战争必须以战争的正义性、群众性为前提，战争的组织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够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国民党在十年内战中进行的“剿共”战争，是维护反动的豪绅地主利益、对抗土地革命的不义之战，自然不可能得到群众拥护。它所进行的抗日战争虽然是正义的，可是由于其自身腐败和脱离人民的本质，也不可能发动群众。他们的心理如同山西土军阀阎锡山所称：“民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蒋介石及其一伙最害怕的是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威胁其反人民的独裁统治，所以他们“安内”重于“攘外”，即使被迫对外作战也只能依靠军队片面抗战。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见八路军在敌后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十分嫉妒，也想让自己的军队在日本人的后方站住脚。为此，1939年蒋介石在湖南衡山主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汤恩伯任教育长，请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课程主要由叶剑英所率领的八路军教官们担负，授课目的是要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学会如何在敌后打游击战，以建立根据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八路军的教官们毫无隐瞒地向这些“友军”的军官们讲授了对外并不保密的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当教官们强调首要原则是军队所到之处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官兵之间，军民之间要同甘共苦时，国民党军官们瞠目以对。

以当时八路军的待遇为例，战士每月发饷2元，一般干部发饷3元，团长至总司令每月发饷也只有5元，真正实现了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同甘共苦。八路军如鱼，老百姓似水，能在水中“游”，才能获得巨大的力量。国民党的军官们听了八路军教员们的课，纷纷叹息，感到不要说其军长、师长，就是连长要与士兵和群众同甘共苦也办不到。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军先后将几十万部队派往敌后，想与共产党争夺敌后的地盘。可是这些部队所到之处，只取之于民却不为民服务，靠向群众敲榨勒索维持给养，对日寇又尽力避战求存。在这种失去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很快就陷入既不能“游”又不敢“击”的地步，在日军的“扫荡”和诱降下，近半数被消灭，半数投降变成伪军，只有少数逃回大后方。对于共产党军队以几万人就在敌后发展到上百万，国民党当局除了大骂“游而不击”和“坐大”外，只是徒呼奈何。

在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用以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同样公开于各种对外宣传品中。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8页）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为争取人心，驻西贡美国军事顾问团也要求美军人员效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是其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绝不是对当地居民说几句和气话，给一点小恩小惠所能改变的。这种徒劳的学习，丝毫改变不了这场不义之战失败的结局。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真正“唤起民众”，根本原因在于将战争的长远目的、现实成果与最广大的群众的利益紧紧相连。中国革命战争从实质上讲，就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为亿万受尽苦难和深重压迫的农民争取解放的正义性，使无数农民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下投身于革命战争。在二十多年里，共产党取兵于农，养兵于农，援兵靠农。要发动农民参军参战，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才能把农民动员起来，使之自觉地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所到之处，马上出现一幅毛泽东所描绘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为保卫自己分到的田地，就会有踊跃当红军的动人的“扩红”场面，会有赤卫队、赤少队一起上阵杀敌的情景。当然，动员群众时应掌握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左”倾路线的领导者虽然强调分田地，却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将不少人逼到绝路而组织白色游击队等反动武装拼命顽抗。此外，土地革命中又伤害了中农和工商业

者的利益，扩大了对立面。根据地内搞竭泽而鱼式的过量的人力物力动员，也损害了部分基本群众的利益，造成了不少“反水”现象。这些成为南方各苏区相继失败重要原因的教训，为毛泽东后来制定发动群众的正确政策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团结包括地主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一齐抗战，共产党不能再打土豪。为了战争最广大参加者的切身利益，又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土地改革。正是由于把民族大义与解决群众现实要求结合在一起，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才有了可靠的基础。在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重新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土改与打仗结合，才动员起1亿多人口的老解放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与此同时，毛泽东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讲政策，核心问题是区别对待；讲策略，核心问题是掌握步骤。由于实行了保护工商业、土改时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稳步前进的策略，尽量缩小打击面，实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解放战争发展成一场最广阔的人民战争。

新中国建立后，抗美援朝战争又成为一场新型的人民战争。毛泽东作出入朝参战的决策，固然包括有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因素，然而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要是对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的要求，对广大人民的动员方式还是要把战争与他们的个人、家庭利益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以“保家卫国”的旗帜发动全国人民。通过激发人民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仇恨，使他们认识到“唇亡齿寒”的道理及援助朝鲜人民的必要性。这样，这场主义战争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刚刚建国那种困难的条件下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有千百万群众投身和支援战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所制定的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有了实现的保证，战争的参加者才会有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特别注重发挥人民军队独有的、一切反人民的军队所不能具备的政治优势。这政治优势的源泉，恰恰是人民战争的正义性、群众性所激发起来的广大军民的觉悟和高昂的斗志，从而在精神上压倒敌人。不仅在双方火力都不强的国内战争中是如此，在抗美援朝战争这样的世界型的现代化战争中也同样如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之间的火力对比，较之国内战争中任何时候都要悬殊，光拼火力、拼技术，志愿军根本不可能战胜美军。但是志愿军有中朝人民的大力支援，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长期培养起来的优良战斗作风和高昂士气，美军则是“铁多气少”，所以志愿军反而能够战胜敌人。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多行不义之师，人心丧尽之旅，即使有先进的装备，在组织良好的人民战争面前也是无法取胜的。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时，面对广场上欢呼的人群，他喊出的口号是“人民万岁！”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建国后保卫祖国的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同样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是驾驭这一战争形式的无与伦比的大师。人民战争这一概念，反映的是人民群众为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而组织起来进行的战争，最早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毛泽东。在世界战争史上，西方资产阶级就有过人民战争，如西班牙人民反抗拿破仑的游击战争就是极为成功的例子。在近代西方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等人的眼中，这种“民众战争”并不能成为军事理论的主体思想，而只是一般战争的辅助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提出过动员和依

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的论述，为进行人民战争指出了方向，却没有能够解决具体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战争，不仅有着与以往自发的人民战争同样的正义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又具备前所未有的组织性和科学性。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所创立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理论，堪称战争史上最完整、最齐备的一种军事主体思想。正是由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点，成功的实践又极其辉煌，因而在国际国内有着崇高的地位，并受到人们长期的景仰。

军事政治仗，政治军事仗

毛泽东指导战争时，有一个区别于中外其它军事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总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总是站在中国革命的总体角度研究和指导战争。过去中外各种军事学派大都是从军事斗争本身着眼研究战争，旧军人的口头禅经常是“我是军人，不谈政治”。研究战争中如何取胜，只注重从兵力、装备等方面进行计算。虽然克劳塞维茨等人也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等正确命题，但都未能像毛泽东如此深刻地揭示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并将战争当作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去研究。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的灵活运用，其重要一点正在于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外交的、文化的多种手段紧密结合，用以克敌制胜。

毛泽东在战争中综合运用整体力量，突出表现为他不仅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善于使用政治力量，尤其擅长于将两者紧密地配合；不但善于运用军队作战，也善于动员人民群众参战，擅长以两者力量相结合去完成战略任务；不仅善于动员和运用我方军民的力量，还善于使自己的政治影响深入敌方营垒，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占区的人民。这种综合运用战争力量的方式，正是人民军队能以劣势装备战胜有优势装备之敌的最基本的保证，也是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之所在。

毛泽东从开始创建农村根据地时，就根据三大起义相继失利的经验教训，反对只从军事角度考虑战争问题，并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及发动群众等内容与建军作战结合起来。当时，红军的军事干部多半刚刚来自于旧军队，习惯于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如何取胜，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以及建立根据地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表现出不重视、不耐心。为此，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来纠正这种倾向。1929年12月毛泽东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在后来的斗争中，毛泽东也一直要求军队指挥员同那种只有战术头脑、没有战略头脑，只谈军事、不谈政治，只讲军事技术、不讲军事政策的旧军人作风划清界限，从而为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及多种斗争形式紧密结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关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与敌斗争的方法，也是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的前几次“围剿”失败后，也感到单纯用军事手段“剿共”难以奏效，于是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此后，国民党军在重兵进攻的同时，又加强政治策反，推行“自首自新条例”，煽动苏区内部“反水”，并严密实施经济封锁。另外，还在根据地周围和游击区强化保甲制度，以受过打击的地主富农大量组织民团等反动武装。面对敌人这些多方面配合进攻的毒辣手段，“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拿不出有效的对策，陷入在军事上单纯固守防

御的窘态。加上肃反、分配土地和工商业等问题上的过“左”政策，又脱离了部分群众，从内部便利了敌人的进攻，以致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的悲剧。当时退到深山坚持三年游击斗争的一些同志曾感慨道，我们不仅失去了苏区，最严重的是失去了群众。

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就坚决反对那种只强调打仗的论点，要求八路军“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53页）此后他又指出：“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同上书第87页），同时还具体提出了十大救国纲领及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人民参政等政策，要求前线部队迅速贯彻执行。正是由于实行这种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主，以打仗振奋人心为辅的方针，八路军在广阔的敌后迅速展开。当时，国民党刚刚从正面战场溃退，日军又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敌后广大农村成为空白，只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八路军一个连、一个营就可以开创一个地区，使自己的力量很快能有几倍、几十倍的发展。在短短两年内，解放区从西北高原一隅发展到整个东海之滨，直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拥有数千万人口。毛泽东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入手，抓住了这一中国革命史上难逢的有利时机，极大地发展了革命力量，使敌后解放区战场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并为后来夺取全国胜利铺垫了最重要的基础。

当敌后解放区蓬勃发展，对日寇产生日益严重的牵制和威胁后，侵华日军也袭用了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在军事上一再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实行“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新奇战术。另外，日寇还在政治上大力建立伪组织，联合及利用各种反动落后团体及顽固派一起反共，并在经济上对解放区实行封锁、掠夺和彻底摧毁的方式，在根据地内由乱烧乱杀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的“三光政策”。日寇实行的这种以“总力战”为标榜的“治安战”，的确给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一度造成过严重困难。八路军一度由40多万人减少到30万人，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人口由6000万人减少到2500万人。

面对1941年至1942年间出现的严峻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抗战政策，指出了军政新方针：以分散游击战争对付敌之空前“扫荡”，以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去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大量发展民兵作为保乡自卫的骨干，造成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者连环。这样，各解放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以一元化领导和统一指挥对付日伪顽的协力进攻；以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和敌后武装工作队等形式，粉碎了敌伪“扫荡”及“强化治安”的努力；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多种组织形式及合法的与非法的斗争方式相结合，破坏了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清乡”的企图；以全体军民的大生产和精兵减政，战胜了敌伪顽封锁和破坏带来的经济困难。通过在敌后战场上进行的这种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内容的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斗争，日寇妄图摧毁其后方抗日根据地的伎俩已穷，抗日军民应付的办法却愈出愈多，且愈来愈奇。解放区在经过一度缩小后又于1943年后逐步扩大，越战越强，不仅成为当时全民族解放的希望，也形成了后来新中国的雏型。

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驾驭战争，以多种形式的结合进行对敌斗争已发展到炉火纯青、驾轻就熟的程度。谈判斗争与战场斗争密切结合，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密切结合，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及保护工商业的正确经济政

策与支援前线相结合，都较以往有了重大的发展。而这一时期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创新，又在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通过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党的工作不注意合法斗争形式，口号脱离群众又过于暴露而损失殆尽的教训，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严格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大量的群众斗争尽量采取合法的形式以争取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组织这些斗争的党组织则处于绝对秘密的隐蔽状态。当时，城市斗争中直接出头露面上街示威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教授、公务员，口号也是易于被各界群众接受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国统区农村则以反对群众最痛恨的征兵、征粮、征税为号召。这样，就形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空前广泛的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的：“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于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4页）

在蒋介石政权已经人心丧尽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又充分运用正义战争得道多助的优势，对国民党军展开规模空前的瓦解攻势。当时，毛泽东把以往的瓦解敌军的工作提高到重要的战略地位，具体方法也由土地革命战争中那种强调“兵运工作”，发展到以争取敌军官为主，形成事实上的“官运工作”。当年，红军宣传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争取到几个兵，解放战争时期一个高树勋运动就能通过高级军官的带动使成千上万的敌军倒戈。在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争取了二百多万敌军起义投诚，大大加速了战争的进程，成为瓦解敌军最辉煌的成就。这种由解放区战场的“第一条战线”，到国统区的“第二条战线”，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到深入国民党军内部进行瓦解，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宣传上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民党政府曾惊呼，共产党对它的攻势渗透已经到了“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程度，而这个极其腐败又千疮百孔的政权的迅速土崩瓦解，就在所难免了。

在建国后的局部战争和局部军事冲突中，由于政治目标更为突出，政治目标对作战手段和范围的限制更为严格，毛泽东在指导这些斗争时更突出了战争中各项行动同政治斗争紧密配合。抗美援朝战争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后，因双方力量形成均势，都在寻求和平解决，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在朝鲜战场实行了边打边谈。此后，许多次军事行动的目的，都是为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这一政治目标服务的。例如：在停战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考虑到南朝鲜当局还想破坏停战，毛泽东又认为应再歼伪军万余人，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发起金城战役的建议。此役获胜，狠狠地教训了李承晚集团，对保证停战后朝鲜局势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朝鲜战争中，毛泽东还充分调动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大力开展外交上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有各国群众参加的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浪潮，不仅对促进朝鲜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我国传统的人民战争法宝在国际斗争舞台的更大范围内显示了威力。

毛泽东于1958年亲自部署的炮击金门，又是一次典型的军事仗、政治仗、外交仗、宣传仗的结合。人民解放军从当年8月23日炮击开始后，仅仅几天之内就把金门封锁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包围封锁，岛上弹药粮食都不多，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看，登陆拿下金门很容易，当时前线指挥员也一再向中央军委要求早日下达登陆命令，可是毛泽东却突然下令停止炮击，让国民党自由运输，以利其固守，他甚至在起草的致国民党军官兵的文告中表示，金门守军如果供应不足，只要开口，我们也可以供应。从1958年10月以后，又实行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随后要求打炮时尽量不要打死人。最后，还

发展到打炮不打实弹只打宣传弹。受到沉重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台湾当局虽然口头上拒不接受和谈，实际上却完全被牵着走，双方都向无人地带射击的炮战已经变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对话。

对于堪称世界战史上一绝的作战方式，当时各国领导人都为之惊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其称为“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赫鲁晓夫也说能拿下金门而不拿，这非常奇怪。国内许多同志也不理解，如同毛泽东起草的文告中所说的：“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实际上，炮击金门主要不是军事仗，炮击的目的并不是想用军事手段夺取金门，而是为在政治上、宣传上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在外交上粉碎美国制造“台湾独立”的阴谋，并对台湾军民进行实际宣传，以利于建立更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此刻的金门、马祖是蒋介石在大陆沿海最后两个据点，也是他自称“代表”大陆的象征。如果夺取金马，把蒋介石与大陆这最后一点联系斩断，而又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恰恰更便于美国制造“台独”。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留下金门，并实行世界战争史上最奇特的作战方式——单日打，双日停，准备积以时日，为“一锅端”的方式整个解决台、澎、金、马问题创造条件。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丧失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这一问题于毛泽东在世时未能解决。然而几十年后，随着海峡两岸“三通”逐步实现，我们更可以感到这一军事行动的长远政治眼光。

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也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对深入我国境内蚕食设点的印度入侵者进行还击作战，主要也是考虑到当时国际政治形势，以及长远地维护我国边境安宁的需要。为此，毛泽东考虑了许多个日夜，研究是打还是不打。这一仗以“后发制人”的方式发起，对印军打狠打痛后又速停速撤，退回原先的实际控制线我国一侧，并归还缴获的印军武器，结果大出印度政界和世界舆论意料之外。其实，当初毛泽东确定对印军进行自卫反击，并进行与之相配合的政治、外交斗争，都是服务于安定四邻的既定目的，并以此争取中印友好和实现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毛泽东当时曾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引自《新中国外交风云》第7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这次有理、有利、有节并始终是高姿态的斗争，中印边界上的形势在几十年间一直比较稳定，这正体现了军事行动为政治服务的作用。

毛泽东生前指挥军事斗争时，坚持处处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并一向采取多种斗争手段相结合，许多决策之出奇，在当时往往使人费解。这类单从眼前的军事角度看难以理解的决策，如从长远角度看则非常高超，斗争手法也更为巧妙。

毛泽东综合运用战争力量，以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战争的思想，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政治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在以政治的观点指导战争方面，在发动最广大的人民、依靠人民进行战争方面，毛泽东创造了最为完整的斗争形式，也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所进行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出于这一原因，毛泽东的著作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被译为几十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发行，而其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又是最受重视的思想武器。

永放光彩的传家法宝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取得的辉煌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已经铭入史册。可是由于一段时期内“左”的思想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使一部分人对人民战争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一谈起人民战争，就将其理解为当年作战方式落后的情况下老乡们推小车、担扁担支前，或男女民兵直接上前线的战法。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由此产生的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进步，有的人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已经过时。这种狭隘的认识，既是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的错误理解，也不符合这位伟大军事家当年的实践过程。

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并不是在武器不如敌人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他领导的战争性质所决定的。由于革命战争和卫国战争目的是为了人民，自然要依靠人民，战争的成果也要归于人民。正是这些原因而不是武器和技术条件决定了要打人民战争。毛泽东对待战争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特别是有广大军民支持这一优势，根据不同的作战和敌我力量对比选择不同的战法，每一个具体时期人民战争如何打法，从来就没有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回顾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史和建国后进行局部战争的画卷，人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民战争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是红军、赤卫队相互配合声势浩大的反“围剿”斗争图形；在抗日战争中，又是“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式的以麻雀战不断袭扰日寇的情景；在解放战争中，又是千军万马大踏步进退，并伴随以广大群众“车轮滚滚”支前的场面……取得全国胜利后，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使人民战争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主要战场在距离我国国境不过二三百里的清川江附近，国内群众的援朝运输队、担架队尚可前往战区支援。当战线推至距我国边境已有千里的三八线附近时，且不说当时有敌人空中立体封锁，即使按照古代“陆路千里不运粮”的训戒，也会明白原有的肩挑手推的支前形式不能适合前运需要。在此形势下，国内人民支前就改用援朝志愿汽车大队、志愿铁路工程队及医疗队等组织，并根据现代化战争的特点，以全民捐献飞机大炮作为支援战争的主要形式。形式虽变，动员人民、依靠人民进行战争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却坚持始终。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广大军民总是处于在装备上以弱敌强的形势之下，坚持依靠人民战争来取胜，又使某些人误认为人民战争只是以劣胜优的战法，其实也不然。从战争的正义性、人民性出发，人民解放军在装备得到改善之后，同武器落后于己的对手作战同样要打人民战争。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装备技术占优势也难于取胜。例如：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前期，人民解放军在我国西部藏区取得的平叛作战胜利，就是依靠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翻身农奴取得的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

当我国川、滇、甘、青四省藏区和西藏的反动农奴主发起武装叛乱时，曾以宗教和民族的旗号进行欺骗煽动，一时裹胁和蒙骗了许多藏族群众参叛。当时，毛泽东处理平叛问题所考虑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争取群众，并为此下达了一系列指示，采取了许多根据西藏具体情况而确定的特殊政策。当进行了大量争取群众的工作而西藏反动统治集团又于1959年春发起全面叛乱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决定在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将农奴主的

土地财物分配给广大贫苦农奴，以彻底摧毁叛乱的社会基础。通过一面平叛，一面改革，使广大翻身农奴得到了人身解放和生产资料，摆脱了过去作为“会说话的牲口”的悲惨地位，从而为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藏区赢得了一大批基本群众。有了广大藏族群众支援平叛，整个平叛斗争形势立即就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经过民主改革和建立了人民政权的地区，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很快就由被动变为主动，叛乱分子不仅得不到接济，其活动也到处有群众报告，藏族群众的自卫队也和人民解放军一起进行肃清叛乱分子的斗争，使反动武装无法存身。这样，六十年代初藏区民主改革完成之日，也就成为叛乱被彻底平息之时。

建国后我国进行的军事斗争不仅仅限制在国内，有时也扩展到境外，人民战争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又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异国条件下发挥人民战争的传统优势，一方面要突出国内人民的后方支援，一方面也要争取他国群众的支援、同情和理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毛泽东即强调“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想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页）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切实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入朝后发扬国内战争中遵纪爱民的光荣传统，处处热心为朝鲜人民服务，在当地群众眼里也被看作“最可爱的人”。正是由于有这种政治基础，朝鲜人民踊跃支前，使我国出国部队的作战得到了重要保障。如志愿军结束二次战役时因美军对交通线的狂轰滥炸，后勤供应陷入极困难的状态之中，运到的粮食只能满足部队所需的1/4，这时靠朝鲜群众家家动员，将战争劫乱中剩下的宝贵的口粮借给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才得以进行。在六十年代的一些军事斗争中，我出国部队也以自身良好的风范和为他国群众办好事的行动，使所在国群众为之深深感动。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也成为出国部队完成作战任务的重要条件。

在异国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与在本国有不同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尊重他国主权问题。志愿军入朝之初，毛泽东即强调尊重朝鲜民主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问题。后来，志愿军在朝鲜凡涉及到地方群众的动员、参战和支前等事宜，都通过当地政府进行，志愿军不能直接进行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出国部队的各级群众工作部也都改称“中朝友好工作部”。既争取和团结异国的人民，又尊重他国主权，这确是人民战争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大创新。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过程，虽然没有发生过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但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一直是中国人民维护自己独立安全的强大武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一切外国侵略者和西方国家中头脑清醒的军事家望而生畏。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于六十年代初访华时曾与毛泽东有过非常友好的会面和交谈，这位在世界享有很高名望的元帅在中国国内参观了军队和民兵。蒙哥马利回国后深有感触地告诫西方军界说，战争有两条禁律，一是不能向莫斯科进军，因为俄国广阔的土地已经使拿破仑和希特勒陷入灭亡；二是不能在中国大陆上同中国人作战，因为这将遇到亿万军民组成的战争史上纵深最大的防线，并会使进攻者大倒其霉。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国的地位和周边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战争的思想仍对一切敌视我国的外国势力起到了强有力的威慑作用。

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本身又是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理论体系，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作战地域和环境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尽管作战的技术手段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军事技术的发展不可能取代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当年所提出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许多基本原则，仍然是适用的。坚持战争的群众性，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坚定地实行以人民军队为主，建立最有效地发挥全体军民威力的武装力量体制，我们仍然可以以劣势装备战胜有优势装备的敌人。同时，在进行正义战争而得道多助的旗帜下，充分地依靠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由高度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发动各民族的群众，将会形成最强大的战争潜力，构成拥有高技术装备的敌人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实践，只要有正确的学风，不是生吞活剥地学习某些现成结论或记住当年的某些战例，而是努力掌握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可以真正认识到它将始终是我们保卫祖国的传家宝。

第五章 战略战术的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效益一词，近年来是国内经济界被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衡量一个经济人才水平高低最重要的尺度，则在于他的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比。在军事斗争领域中虽然很少使用军事效益一词，但从古至今，人们论及战时统帅、将官之功名成就，衡量的尺度恰恰也是能否以少的投入和小的代价，获得大的战果，最终赢得胜利。

汉代刘秀以三千兵马在昆阳破王莽军四十万，明末皇太极以伤亡百人代价在松山歼洪承畴部数万，均为兵家之典范。苏联卫国战争虽然堪称战史上规模无与伦比的宏大画卷，显示了苏联人民不畏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的惊人潜力，然而从双方的投入和战果比来看，苏方的战略战术很难称之力高超。战时苏军在总兵力上一直占优势，其装备技术的总体水平也不差于德军，在某些技术兵器上还优于德军，作战付出的代价却大大高于德军。苏联虽然和盟国一起赢得了胜利，其军人却死亡 860 万人以上，而在苏德战场被击毙的德军则为 400 余万人，苏军坦克、飞机的损失数也远远超过德方。自四十年代起，毛泽东对苏联的战略战术一直不佩服，批判王明及后来的反对教条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这种心态。

近代欧洲战史上，以少胜多的兵家泰斗非拿破仑而莫属，然而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研究拿破仑战争史的结论是：“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 206 页，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纵观西方战史上的战例，如装备、技术条件相等，即以最出色的军事天才拿破仑而论，也只能起一个“倍增器”的作用，即顶多能战胜数量多一倍的对。至于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等将领取得胜利的战例，其前提无不是自己军力远优于对手。近现代西方的军事学派与各种战术条令所研究的战法，基本上都是在对等条件下如何战胜对方。苏军战史中作战取胜的主要战例，也都是集中了超过对方的技术兵器和兵力。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是军事学上极为特殊的一项课题。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所需要解决的，远不是战胜军力大一倍的对。对手的问题，而是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在力量相差悬殊不知多少倍的条件。下战胜强大敌手的特殊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人民军队不能搬用世界上其他军事学派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的高超，恰恰体现在出色地解决了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难题，并创造了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一整套独特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以其独特的战略战术和以弱胜强的辉煌业绩，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才。

笑论宋襄公，阐明战争法则

毛泽东 17 岁才进入第一所新式学校——湘乡县东山高等小

学堂。对这位年纪偏大、身材魁梧远过于同窗们的外县籍新生，学校本不愿招收。可是毛泽东入校不久，就以一篇《宋襄公论》令校内老师惊叹不已。这篇当初只是小学生作文的原稿早已不存，然而国文教师的批语尚在一——“视似君身有仙骨，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二十多年后，这位东山高小校长早已预言将是“建国材”的毛泽东，果然成为一代统帅和军事家。在《论持久战》这一名篇中，毛泽东又一次论及宋襄公，并嘲笑其

“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普通人嘲笑宋襄公，只是有感于他的道德观；军事家嘲笑宋襄公，则有感于他在战争目的上的糊涂。既然要打仗，进行这种人类之间的流血拼杀，就要有一定的目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深刻地阐明：“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一词，当然不是单纯指肉体消灭，而意味着剥夺敌人的抵抗能力，至于像中国古代秦将白起和楚霸王项羽那样坑杀降卒，在历代史书中也被称为不义之举。但军人讲仁义、讲武德，只能服从于保存自己并不利于敌这个前提。在两军对垒，非你死即我亡的战场上，对敌怜悯即是陷己于绝地，纵敌、资敌之举同样是不明战争目的的表现。既然是战争，为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应该选择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一邓小平的名言，也可以用来概括战略战术的运用。

对于战争目的和基本法则，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就有过朴素的认识和概括，并初步地阐述过攻与守、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孙子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孙子兵法·形篇》）这一出自兵学经典的话虽为人熟知，然而到了复杂的战争实际中，许多统帅和战将却处理不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农耕结构造成的保守传统，消极防御型的坐以自守，自宋代以后几成对外战争的主导。结果在游牧民族和西方入侵者的攻击面前，只能陷入丧师失地、国势日危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进行革命战争时，许多领导者对于战争的目的虽有一定认识，但并不十分清楚“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明白只有消灭国民党的反动军队，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不大懂得如何做到既消灭敌人又保存自己。“左”倾路线指导下实行盲动主义政策时，那种只有七个党员就要暴动，仅三条枪也要起义的作法，就是以极为有限的力量与敌人拼命，结果自己的力量不能保存，消灭敌人的本钱也完全丧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盲目出击吃了败仗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实行“以堡垒对堡垒”式的节节消极防御，以求保存苏区和红军。这种不能主动地大量歼敌的坐守，只能使敌人日益猖獗和自己地蹙人困，最后落到根据地完全丧失和红军濒临覆没边缘的境地。

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战争中系统地研究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向全党全军揭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当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就毅然向罗霄山区转移，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将此地作为保存力量的落脚点，可称之为在党内开有计划地“保存自己”军事力量的先河。毛泽东走上了革命的“山大王”之路，与封建时代占山为王的绿林豪杰有着根本区别，即不是单纯为了躲藏或只满足于打家劫舍式地下山出战，而是以此发展力量，准备消灭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5页）。这样，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问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史上第一次从实践中开始得到解决。农村革命根据地中飘扬的红旗，很快就引起在城市设立政权的反动统治者的恐慌，于是连续出现了重兵“进剿”、“会剿”、“围剿”和“清剿”，弱小的红军立即面临着能否生存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进行一次次粉碎敌人“剿灭”企图的斗争中，经过作战实践的摸索，又解决了防御中的进攻、

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一系列相互矛盾又有着辩证依存关系的问题。

所谓防御中的进攻，就是中国革命军队由于力量弱小，面对强大的反动军队的进攻，在战略上只能处于防御地位。“左”倾机会主义者叫嚷“不停顿地进攻”和“总决战”，并要红军照搬苏联的进攻战略，恰恰是对此无知的体现。毛泽东强调红军在战略上实行防御，却又不是在具体作战中消极地设防，而是在战术上实行进攻。因为只有进攻，才能打歼灭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纵观毛泽东指挥的三次反“围剿”作战，总体上虽然都是在强敌进攻前的防御行动，各场具体战斗却几乎都是集中优势兵力对分散孤立的敌人实行进攻，而且不打则已，打就要打歼灭战。如毛泽东指挥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把进攻之敌主力张辉瓒师九千余人一举歼灭，全部人马、武器尽数俘获，成为红军历史上第一个成建制歼敌的战例。这样就既消灭了敌人，又补充壮大了自己。

所谓持久中的速决，就是中国革命军队为逐步战胜强敌，在整体上必须打持久战，具体战役、战斗却又要速战速决。“左”倾路线统治时，党员不过十几万，红军不足十万，设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央就设想以“总暴动”取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再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这是根本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幻想。毛泽东在下井冈山后，就批评了军内对长期斗争不耐烦，一味想速胜的观点。可是在反“围剿”中进行每次战斗时，毛泽东一般又要求尽量当天解决，决不能拖延数日以上。因当时敌军总数大大多于红军，又占有交通线和拥有较先进的运输工具，增援迅速，红军如不速战速决，战场形势就会发生变化。毛泽东指挥第二次反“围剿”时，就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半月连打五仗。这样，消灭敌军一个师，迅速移兵再打一个师，不仅能避开敌援兵，也能达到每一仗集中优势兵力，确保打成歼灭战。

所谓内线中的外线，就是为战胜强敌，诱敌深入根据地内部（所以称之为“内线”），作战时却集中兵力对深入敌形成包围，从外部向其进攻（所以称之为“外线”）。在敌我强弱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面对敌军进攻，红军最好的作战方式是诱其深入，在根据地内部逐步对其加以消耗疲惫，再选择地形和群众条件都有利的战场，集中兵力一举歼灭。毛泽东指挥的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均是贯彻了这种诱敌深入再各个击破的方针，虽然暂时丧失了部分地区，却保存了军力，最后歼灭了敌人，达到“人存地失，人地皆存”的结果。相反，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实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固守防御，不敢诱敌深入，结果无法放手消灭敌人，反而丧失了整个中央苏区。有失才有得，有退才有进，这一辩证关系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表现得如此明显。

在军事学上，凡是采取战略防御的一方，多是处于内线位置，即退到自己区域内作战。内线作战的原则，一般都是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击进攻之敌。同时，近代许多军事家也主张慎重初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则改造了旧的军事学，将其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主张没有准备好不打，没有把握不打，应该打歼灭战而不打击溃战。因为只有打歼灭战，己方才能有所俘获，方能发展壮大自己。对于实力雄厚之敌，只有歼灭战才能使其受到巨大打击和震撼，被歼一师少一师，被歼一团少一团，即使重建也是士气沮丧，如此方能达到最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目的。积十年内战的宝贵经验，毛

泽东到达陕北后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抗战初期写成的《论持久战》，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论述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关系，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基本战争法则，就此具备了一整套适合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详细内容。

如今人们翻阅这些充满哲理的文字，很难想象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出这些原则是何等不易！毛泽东所阐述的这些原则，不仅使全党全军从理论上深入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并且掌握了一套由此发端的完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自己始终居于主动地位。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指导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开辟敌后根据地，坚持全面抗战的斗争中，更是非常有效地贯彻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法则。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地革命战争中对这一法则的认识还是在摸索中逐步深化，那么在抗日战争开始时的认识就已很自觉。国民党反动派曾大肆攻击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寇“游而不击”，在敌后“坐大”。其实，了解敌后抗战情况的人都会知道，在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必然会招致日寇及其组织的伪军的“扫荡”，如果真是“游而不击”的话，敌后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根本不能生存，只“坐”岂能变“大”？当然，由于敌后战场双方力量相差过于悬殊，这种“击”又不能打大仗，只能打游击战，小股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如当时敌后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所概括的，只要求一个县一天消灭一个鬼子，有几百个县的敌后根据地就相当于一天歼灭日寇一个大队（营）。这样，敌后解放区不仅起到了牵制数十万日军的重大战略作用，而且还制止了国内妥协阴谋，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与敌后解放区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相持阶段中后期一直拥兵自重，除了为获得外援而打通印缅交通线外，在正面战场真正是不游不击。这种坐守避战，造成了自己民心士气涣散，战斗力削弱。由于不肯主动击敌，将赢得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他人出力而自己坐享，日寇未受到沉重打击，反在正面战场上愈加猖狂。日军直至1944年临近崩溃之前，还能横扫国民党战场，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这样，通过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从总体力量上看是越抗越弱，八路军、新四军却不但粉碎了蒋介石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图谋，解决了保存自己的问题，而且使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抗战期间有了几十倍的发展。在战争目的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其后果截然不同。

研究战争特殊规律，走有自己特色之路

在战争舞台上，战术总是由作战的技术条件决定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战术上的日新月异，曾把有悠久古代文明的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在军事上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和战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奋起追赶他人以改变自己落后面貌之必需。然而，追赶的方式不同，收效也大异。毛泽东在战略战术问题上与那些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他人者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既学习他人之长，又走有自己特色之路。

翻开中国近代战争史册，“师夷长技”而不能制夷者比比皆是。从洋务运动起，陆军学德国，海军学英国，已成中国军界的定式。从本世纪初直至三十年代，经过日本改装的德式战术传入禹城，一本日本的《步兵操典》从

本世纪初起统治了中国旧军界三十年。带有浓厚买办色彩的国民党政权的许多军政要员，也曾师从于日本士官学校。此类学习，确向中国传授了代表世界一般性的战争规律的军事学术，不为无益。然而总是迷信洋人，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学战术技术，自己无创见，就难免被动挨打。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他的革命活动生涯主要是军事斗争的生涯——利用会党暴动，组织新军起义，运动军阀反袁护法，直至自组军队北伐。但是，他统军作战的方式仍是在德国陆军、日本士官、保定军校教范的内容之中，与对手北洋军阀是同师同宗。直至孙中山逝世之前，其军队仍不能统一广东一省。

蒋介石走的仍是德日战术抄袭者的老路（抗战以后又改学美国）。蒋介石能战胜国内各派军阀，其政治谋略可称略胜这些对手一筹，而战术倒未必高明。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屡屡失败，除了政治腐败的原因外，战略战术呆板和无创造性，长期墨守陈规或照抄外国战法，无疑也是重要原因。国民党军抗战名将傅作义同日军交锋后，一个最深的感受即是，自己部队迎敌的几乎每一反应都在日军的估算之内，因为过去所学的军事操典全来自日本。试想，在这种装备不如日本，官兵军事素质不如日军，战术再完全照抄日敌的情况下，徒弟岂有不输给师傅之理？

中国共产党刚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时，也有过这种照抄过去的战略战术，照搬洋教条而连遭惨败的例子。看看从1927年到1928年烽火遍地的一百多次武装暴动，虽说是英勇悲壮，可歌可泣，却几乎都是失败的纪录。就客观原因而论，固然是敌强我弱；其主观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还不懂得如何采取新战法，仍然沿用北伐战争的那种打正规战以攻城略地的方法进行武装斗争；再加上盲动主义方针的指导，在掌握了政权、拥有强大军队并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国民党新军阀面前，其结果只能是很快拼光自己极为有限的力量。

南昌起义的部队之所以败于潮汕地区，就是因为军事指挥员虽英勇奋战，却只知按照保定军校、苏俄军校教范的那一套打法，在汤坑那一场硬打硬拼仗中拼命冲击，耗尽了力量，连退却都无力很好地组织。若不是朱德、陈毅及时带走一部分剩余力量，并毅然改换旗号，暂时托庇于云南军阀范石生掩护下，其全军覆没是勿庸龟卜的。

广州起义的部队暴动后即死守观音山、沙面堤岸，在强敌围攻下硬拼两日，直至阵地被突破。红花岗的血花，谱写的是一曲战败的英雄颂歌。余部突围撤到海陆丰，仍不改变战法，结果只能是人员越打越少，几个月后即不能坚持。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也是打硬仗吃了大亏。正式的起义军三个团（不算仅在名义上收编而实存异心的第四团），都是按照北伐时的打法，先打红旗、贴标语，再摆出堂堂之阵去攻击敌人坚守的城镇。虽然起义军乘敌措手不及，一时攻下醴陵、浏阳等城，兵力占优势的敌军一旦反击，起义军马上就连遭败绩。幸亏毛泽东在文家市收拢了队伍，率部南出罗霄山中段，才把剩下不足千人的队伍带到了井冈山。

作为后人，不能责怪和苛求于这些武装斗争的先驱者。在那些刚刚涉足于军事领域的探索者中，谁也不可能预先就有一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不过，英明与愚钝、天才与庸碌的最大区别，恰恰是对已有教训的反应。当时的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还在那脱离农村根据地实际、听不到枪炮声的上海亭

子间里继续拟制已根本行不通的城市暴动计划。贵在“不二过”、擅长吸取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却再也没有采取以弱小的力量同强敌打正规战的办法，而是埋头于竹树繁茂、云烟缭绕的苍茫井冈，专心致志地去探索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开创井冈山根据地之初，形势十分险恶。四面是一片白色恐怖的包围，只有井冈山上树立的红旗不倒。朱毛会师，革命影响扩大，马上就遭致敌人的“进剿”、“会剿”，其兵力又较红军占绝对优势。一着不慎，即有全军覆没之虑，此时在战略战术问题上没有创新，十分弱小的红军势必无法生存。

在那“敌军围困万千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严峻斗争中，毛泽东开始起步探索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全新战略战术。制定这些战略战术的依据，又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在井冈山斗争中书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名为《井冈山的斗争》，就具体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能够存在的国际国内原因，就此提出了红军应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以后丰富的战争实践，又使毛泽东全面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在战争舞台上的独特之处，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的特点”：

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使中国革命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

二、敌人的强大，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的军队与红军比较真有天壤之别；

三、红军的弱小，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外间援助，红军的数量少武器差；

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所阐述的四个特点，言简意赅，集中地表述中国革命战争两方面的内容，即“既有有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

第一点、第四点的存在并相互联系，造成红军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出现了革命可能胜利的前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失望实属看不到这些条件的右倾。此处失败，彼处可再起，“东方不亮西方亮”，原因盖出于此。

第二点、第三点的存在并相互联系，又造成红军不能很快发展，也不可能迅速战胜敌人，搞不好还有失败的可能。那种“全国总暴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要弱小的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幻想，恰恰出于对这两点的无知。

这四个特点反映出“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并且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高度概括地指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四个特点、两个方面，慧眼独具！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均不认识这些，来自“日耳曼高等种族”的洋顾问李德更对此茫然无知。党内连犯三次“左”倾错误，战略战术上瞎指挥，都是由于不了解这些特点。红军将领们通过实践，最后在遵义会议上把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党内领导人及其洋顾问“轰下去”，拥戴毛泽东指挥作战，理由也在于此！

根据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毛泽东在战争中又逐步提出了一整套

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在战略上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防御与进攻的关系；在战术上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以弱军战胜强军。

毛泽东创新作战方式的最早实践，是学习井冈山上绿林武装的战法。与“山大王”交朋友，这是他上山前已经确定的目标，但是“山大王”靠什么本事生存，毛泽东未经过亲身实践还不可能深刻了解。上井冈山之后，他特别研究了当地山大王朱孔阳（外号朱聋子）的经验，那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官军来了就利用其熟悉地形民情的有利条件，与其打圈周旋，使官军总不能消灭他。

毛泽东学习朱聋子的战法，却又远远高于朱聋子。朱聋子毕竟是一个胸无大志的草寇，以保住占山为王的交椅为基本目标。他通过“打圈”虽能避开敌人的进攻，却总是消极的躲避，这就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不可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至多能苟安一时。毛泽东从革命战争的根本目标出发，赋予“打圈”新的内容，认为：我们要把朱聋子这句话改一下，改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迷惑敌人，摆脱敌人的追击，并迫使敌人暴露出弱点；打仗，是为了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毛泽东还以中国民间通俗的语言风趣地比喻说：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根据这一思想，当国民党重兵“进剿”井冈山时，红军不与其硬打，先是以退却诱其深入，再巧妙与之周旋，用不断的袭扰使其疲惫。这种“打圈”的方式与朱聋子很相似。可是红军的打圈不是为躲避而走，“走”的目的是为了“打”，即待敌人困马乏时将其各个歼灭。这一点，又与朱聋子有根本区别，显示出代表先进阶级的军事家的战术要远远高于绿林草寇。

学习绿林好汉的战法又对其进行改造提高，毛泽东对战略战术的探索就此迈出了第一步。这极其宝贵的第一步，以“打圈”与“打仗”相结合，恰恰是战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巧妙结合，是躲避强敌锋芒的退却与寻敌弱点的攻击的结合，也是战略上的防御与战术上的进攻的结合。二者结合产生的战法，就是毛泽东、朱德等以集体智慧创造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这个使数量、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强敌无可奈何的战法，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特点所创造的全新战术。如同当时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3—104页）

从1930年到1931年毛泽东亲自指挥了连续三次的反“围剿”斗争中，又进一步丰富了“十六字诀”的内容。当时，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幅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待到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中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又对这段历史回顾道：

“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

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红军在中央苏区先后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验证了这些战略战术的正确。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视这些“山沟沟里”的东西为落后过时之物，全盘袭用苏联正规战的战法，以弱小的红军与军力强大得多的敌军硬打硬拼，结果很快受到历史的惩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最生动地向全党全军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的正确。

毛泽东形成的这一整套战略战术，是将中国历史的精华及外国先进思想的继承学习及自己的独创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吸收了中国古代兵法中的谋略思想和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继承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有益经验，同时又剔除其封建糟粕和落后成分，注入先进军事科学的内容；他吸收了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军事学的合理成分，同时又同那种抄袭德日战术的“洋泾浜”式的旧军事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他注意以苏联革命的军事理论丰富自己，又对照搬苏联经验的“本本主义”即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反对盲目迷信外国战法的奴隶思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这一系列正确的思想，这时在战略战术的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已经成形。

从1927年至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舞台上是一幅群雄并起的图景，各根据地的领导人都在探索武装斗争的方式方法。除毛泽东之外，在湘鄂西、鄂豫皖、川陕、赣东北等地领导斗争的同志，也提出过自己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原则。如洪湖根据地提出的“你来我跑，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与“十六字诀”就有相似之处；川陕苏区反敌围攻时采用的“收紧阵地”的方式，也是诱敌深入之法。不能否认这些根据地领导人的创造，以及这些集体智慧对毛泽东深化认识的促进作用。然而历史证明，在对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探索中，毛泽东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成就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有着他人不可比拟的深刻认识。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中进行的。它的种种特殊情况和特殊规律，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任何马列经典著作和古今中外一切军事书籍中都无法找到全面描述和现成答案的。中国共产党内那些照搬外国战争模式的教条主义者可以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一些教条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请来了洋顾问李德来指挥红军打仗，结果却在指导战争中屡战屡败。他们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懂世界上一般的战争规律，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为了批判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专门研究并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为从理论上更好他说明这一深刻的命题，既是军事家又是哲学家的毛泽东在写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又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两文。《实践论》是讲深入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重要性，《矛盾论》主要阐明认识矛盾的特殊性的重要性，这就从哲学上阐明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指导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高超之处，恰恰在于他对

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研究，并根据中国特殊情况确立不同于世界上一般战争规律的指导方法，从而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战争引向胜利的有效途径。

所谓战略战术者，说过来说过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了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是总参写作班子的集体创作，后又被钓鱼台的写作班子加上了一段“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奇谈怪论。林彪本人对此文事先并未参与意见，甚至没有看过。不过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最后一节里，却有一大段令读者感到语气似曾相熟的论述，即强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及随后对这四句话的一番解释。

这段精彩的论述，实际上基本引自毛泽东本人当时的讲话，即讲所谓战略战术者，说过来说过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打得，不打就是机会主义。打不得，只打不走，是冒险主义。我能吃了你的时候就把你吃掉，一口一口地吃。吃不下你时，也不让你吃了，时机不成熟我主力不和你硬拼，同你脱离接触。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其基本精神就是，在对敌斗争中，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广大军民；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处理好“走”和“打”的辩证关系，就能以我之长攻敌之短，最后战而胜之。

中国革命战争和建国后局部战争的几十年历史证明，要战胜装备技术占优势的敌人，必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打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的精髓。主动权是军队的生命，而能坚持做到毛泽东所概括的四句话，就能始终站到主动的地位，就可以有效制敌而不为敌所制。

概括战略战术的四句话看起来虽然简单，却是积多少年战争实践中无数经验的结晶。第一代从事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刚刚开始组织战争时就吃过这方面的许多苦头。首先是没有“我的”一套打法，照对手“你的”战法对仗，力量又不及你，自然要吃大亏，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打正规战的失败。再则是不会处理“打”与“走”的关系，明明打不赢，还要硬打而不肯撤退，如广州起义后的坚守城市。吸取了这类教训，毛泽东在组织武装斗争中就特别注意在战略战术上的创新，尤其是强调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指战员有革命觉悟，作战勇敢，能吃苦耐劳，经得起长途转战。因此，毛泽东就确定了弱小的红军要实行游击战，随着红军力量的壮大，1930年以后又转为以带有游击性质的运动战为主。

形成这种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战法的过程中，也有过正反两方面的许多经验教训。1929年初井冈山遭敌围攻时，毛泽东为保存这一艰辛创建的宝贵根据地，曾留彭德怀率红五军守山、可是因敌人以重兵四面围攻，井冈山上的土木工事又根本挡不住敌人的炮火，阵地很快失守，彭德怀率部拼死突围才勉强冲了出来。这一事实证明，在有优势兵力和装备了现代火炮的敌军面前，

武器极为落后的红军死守任何固定的阵地都是办不到的。面对这一教训，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表示：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彭德怀自述》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此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时，面对强敌从不进行阵地战式的对垒，并强调：“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基本上是无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8页）“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了“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正好便利了国民党军发挥其飞机大炮的威力，就敌之范而招致大败，更从反面证明了“我打我的”重要性。后来，毛泽东在批判“左”倾错误时又特别强调同强敌不打“堂堂之阵”，乞丐不能和龙王比宝，使全党全军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战法。

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红军与敌作战时，都尽量避开其优势的火力，发挥自己因官兵勇敢而善于和敢于近战夜战的特长，主动发起的战斗通常都是袭击，还经常选择在夜间，以攻敌不备，使其来不及调集优势的兵力和有效地组织火力。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每战又力求打成歼灭战。当然，由于敌人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要寻找其薄弱部加以歼击并不容易，这需要以红军的长时间的连续运动调动其就范，才能创造战机。在红军的战史上，走的时间大大多于打的时间。无怪乎当年在红军中能够长期呆下去的人，有一副“铁脚板”是最基本的条件。长征期间，虽然沿途动员不少穷苦人入伍，却大都中途掉队，造成部队大量减员，重要原因也是这些新成员未经锻炼就进行如此长途的行军，跟不上老战士的步子。也正是由于红军有了这种“走”的锻炼，指战员都有过人的脚板功，国民党军（除了马步芳的骑兵在河西走廊的特殊条件之外）在运动速度上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红军纵然作战不利，也都可以摆脱敌人；红军作战取胜，又完全有把握追上并消灭逃敌。这样，无论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都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拿手好戏。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华民族面对的敌人是当时被称为世界“六强之一”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其装备之强，训练之精，远非内战时的敌人国民党军可比。加上日军官兵受军国主义的思想毒害，崇奉极其野蛮凶悍的“武士道”精神，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在这种形势下，由红军改编的为数不过几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如果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硬打硬拼，不仅很快就会全部消耗殆尽，于抗战大局也不会有大的裨益。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希望共产党军队开到正面战场作战，以借助外战消灭他们多年未能解决的最主要的对手。在这一新形势下，毛泽东以高度的冷静，仍然坚持只担任适合自己作战特长的战略任务。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就蒋介石决心抗战一事致电表示拥护，同时又说明：“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所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8月1日，毛泽东、洛甫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更明确地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在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解释“游击战争”的内容，就是指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打山地战，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和便利战争。

正是坚持从发挥自己的作战特长出发，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又进行了建军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即由以运动战为主转变为以游击战为主。这种转变看起来似乎是倒退，却是在战略战术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实是达到历史进步不可缺少的一步。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用自己独特的一套游击战术的拿手好戏，使日军动用优越的技术手段和强大的兵力进行的“治安战”如“蛮牛捕鼠”。“扫荡”时，往往是攻无目标、战无对象，可是自己的薄弱部分又经常遭到打了就跑的“麻雀战”的袭扰。这样的游击战不仅长期牵制和困扰了日军，并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游击战通常只是战术性的行动，毛泽东首次将其提高到战略高度，并在抗日战争中真正显示出其神奇的威力。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人民解放军独特的战略战术发展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强调要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1页）。在国民党军想利用自己兵力和装备优势寻求主力决战时，人民解放军偏偏实行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解放区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加以歼灭。待国民党军以重兵于山东，陕北两地实行重点进攻，以图在解放区内部长期纠缠时，毛泽东又毅然决定大踏步前进，向外线即国统区出击，将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多数主力部队拖回后方。这样，人民解放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拨动着蒋介石的算盘，使他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经过长期牵来调去的运动战，疲惫沮丧不堪的国民党军最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绝大部分军队都被一口口吃掉，剩下的不足五十万军队逃到台湾，靠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兵保护，才得以存活下来。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战争中所培育起的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仅在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内战场上取得了辉煌胜利，在世界型的现代化战争中也充分显示出了威力。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一场现代化战争，新中国军队面对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最优越的技术装备的美国军队。这场战争开始后，中朝军队虽然在兵员数量上始终略占优势，但敌我双方在技术装备上的差距却超过以往历次革命战争。当时中美两军的武器装备对比，可用下面的数据来说明：

	志愿军一个军：	美军一个军：
人数	4.5—5万人	6万人
火炮	198门（多为75毫米）	1428门（多为105毫米）
汽车	120辆	7000辆
坦克	0	430辆

此外，在朝鲜战区美军还有1000多架作战飞机、300多艘作战舰只，作战行动始终有密切的海空支援。

中国方面直至战争爆发近一年后才少量空军正式参战，而且只是有限地掩护后方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前线。海军则因力量过于弱小，完全没有参战。

在交战双方技术装备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果按照西方那种对等交锋的方式摆开阵势拼火力，打技术，那么中国军队根本不能与美军抗衡。可是，中国出国部队发扬了毛泽东长期倡导的优良战斗作风，专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在运动战期间，志愿军充分利用自己的步兵在复杂地形下运动灵活，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和政治优势，看准美军害怕近战夜战、战术呆板和依赖

公路害怕交通线受威胁等弱点，白天利用朝鲜山多林密的自然条件尽量隐蔽，使美军强大的炮火和航空兵找不到攻击目标，大量炮弹、炸弹只倾泻到无人的前沿。到了夜间，志愿军却突然出现在美军面前，而且一交手就穿插迂回，专门向美军侧后打。这种战法美军从来没见过，一时完全被打得不知所措，无法适应，只好从清川江狼狈逃到三八线以南，连汉城都一度被迫放弃。只可惜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跟不上，否则真有可能像原来的《志愿军之歌》中所唱的那样——“把敌人赶下太平洋”。

志愿军出国后的一、二、三次战役连战连捷，特别是第二次战役取得辉煌胜利后，美国舆论也承认，在朝鲜与中国人作战的这次溃退，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一直是受外国侵略者欺侮和挨打的历史，可是当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国民经济还极端落后之时，所派出的一支装备异常落后的军队出手一战，竟能把以号称“世界霸主”的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打得大败而逃。原先异常狂妄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遭惨败后立即承认自己遇上了“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其后，由于我国的国力所限，进一步发展胜利遇到困难，以致在三八线上转入战略防御。朝鲜战争最后是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停战形式结束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是近现代对外战争史上表现最为出色的一次胜利，在全世界面前大振了国威军威。正是经过了朝鲜战争，不仅世界上许多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纷纷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美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下力量研究这一课题。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从此奠定了其公认的国际地位。

在建国后其他军事斗争中，毛泽东仍始终体现了这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

强胜弱败是战争的一般规律。但毛泽东在领导力量相对弱小的革命军队迎战国内外强大敌人时，一向以科学的态度辩证地看待敌我优劣，认清敌我双方各自的强点和弱点。同代表反动没落势力的国内敌人相比，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政治上具有根本的优势。革命军队的官兵团结一致，英勇顽强，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锻炼出一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些也是一切反动军队所不具备的。因此，从整体上看，我们弱中有强，敌人强中有弱，只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充分发挥革命军队的主观能动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找出扬长避短、最终战胜强敌的途径。在毛泽东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能一再在兵力或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克敌致胜，除了战争正义性等政治因素外，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不拘成法、高敌一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毛泽东为人民军队教育训练所规定的指导方针之一，也是指导作战的基本原则。这里所讲的“灵活机动”，最主要的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之长，以攻敌之短，在战略战术上发挥出自身的优势。

为了发挥自身优势，并寻找和利用敌人的短处，毛泽东在作战指导上还有一个高超之处，就是善于掌握对手的心理，根据战场条件调动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出现判断错误和行动过失，乘敌之隙，为自己创造有利的战机。所谓“运动战”者，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免打“堂堂之阵”，调动敌人至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战场上加以歼击的主要方式。这种运动战，在革命战争中经常采用的是围城打援、声东击西等形式，往往能有效地牵着敌人的

鼻子走。这是因为城市一直是统治阶级盘踞的中心，为反动头子身家利害所在，有攻必救，常能迫敌就范。

在进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还很注意摸清对手的特点和癖好。据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的一些老参谋回忆，当时毛泽东在墙上贴了不少对手的简历，一有空就对着墙看。了解对手再下决心，这是毛主席的一贯作风。对于蒋介石和国内其他反动军事头目的心理及指挥特点都了如指掌，就如同毛泽东说的，“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3—1124页）摸清对手的特点后，就可以掌握其脉搏，诱其上钩，迫敌听我指挥。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世界战争史上，毛泽东是一位公认的战略战术大师。从对战略战术的运用看，他从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坚持以我为主，始终居于主动，因而也从不畏惧任何强敌，总能从强敌之短、我方之长上找出对付敌人的办法。大路朝天，一家半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这是何等磅礴的气势，又体现了多么清醒的科学态度。直至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高度评价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时，最为欣赏的也就是“发挥特长，克服特短”的精神。历史证明，不论战争条件如何变化，毛泽东这种运用战略战术的态度将始终适用，这也是伟大军事家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

热衷于书法艺术的人大都承认，毛泽东是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书法家。他的字，既沉雄遒劲，又潇洒飘逸，不拘格式，如师宗怀素之狂草。据说，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写字就不愿受纸上格子的束缚，而是随心所欲地挥洒泼墨，尽管看似无法度，却又独成一体，自有章法。其实，书法是一种人格追求，是书家心理情绪律动的直接外化。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与作为书法家的毛泽东，所体现的胸襟和风格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兵法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过，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却不可避免地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兵家墨守成规的保守传统。毛泽东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却一反传统的保守观念，充分体现了不拘一格的态度。自投身于军事斗争之后，根据战争实际，他不断变换战法，青年时代养成的勇于探索又注重求实的精神，在他从事武装斗争之初就体现出来。不倦的探索精神使他总不满足，总要探索更好的克敌制胜的方法；求实的态度又使他根据战争情况的不断变化，注重战争中的机动灵活，针对不同的战场条件、不同的对手采用不同的打法。

毛泽东曾强调，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纵观他指导几十年战争的历史，在国内战场上根据战争形势变化，有过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由运动战又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其后又改为以运动战为主，临近全国胜利时还组织过许多阵地攻坚战。在朝鲜战场，毛泽东先是设想打阵地防御战，随即确定打运动战，后又改打阵地战。总之，战法是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随机应变，但实事求是的精神却是始终一贯的。

从井冈山地区的“打圈”，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进军闽西，高度机动的游击行动是毛泽东率领红军作战的特色。可是当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于1930年相继成立，已有进行运动战并成旅建制歼敌的能力时，毛

泽东就毅然率领红军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当然，这种运动战限在一定规模，却毕竟可以成师成师地歼灭敌军，被实践证明是适合于当时红军战斗力的作战形式。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根据作战对手的变化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长远任务，又确定再实行一次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八路军出师前的 1937 年 8 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并指出，战略原则是依据现时情况定的。如果技术条件改变，它自然是可以改变的。当时，八路军指战员普遍还习惯于像内战时期那样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出师后即集中一个主力师在平型关歼灭了运动中的日寇千余人，自己也付出了千余名老骨干的伤亡。打这一仗并非出自毛泽东的决定，而是在前方负责的任弼时与部队指挥员商讨后临机决定的。从政治影响上看，正如《八路军军歌》所唱的那样“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但是从军事上看，当时打这样的仗会损伤八路军的力量，从长远角度来看不利于开展游击战。此时，毛泽东虽然没有像以往那样亲自上前线，却在延安发出一系列指示，以很大的努力反复向前线指挥员说明实行作战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这样，国民党企图让八路军、新四军打大仗、硬拼仗而借刀杀人之毒计就此落空，日寇想寻求决战以消灭敌后抗日武装的企图也无法得逞。

在对装备和战斗力很强的日军坚持游击战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对于装备和战斗力低下的伪军、反共顽军却采取了以运动战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形式，既能给其沉重打击，又能以小的代价缴获较多的物资和装备。如 1940 年在晋冀鲁豫地区进行的反顽作战和黄桥决战，都是成师成旅地大量歼灭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这种针对不同作战对象采取灵活多变的作战形式，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能在抗日战争中越抗越大。

抗日战争刚告结束，毛泽东根据主要作战对象的变化，立即要求全军改变作战方式，编组野战兵团，以运动战作为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手段。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壮大和敌我力量的变化，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毛泽东又强调“力求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坚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48 页）当时，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正是战胜国民党军队的最有效的战法。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面对一个有当时最现代化装备的全新对手，毛泽东又根据情况变化多次变换战法。志愿军出国前，毛泽东曾决定打阵地防御战以阻敌前进，部队入朝后因敌军孤军冒进，毛泽东立即与彭德怀同时确定打运动战，体现了战略战术的高度灵活。志愿军充分运用了近战夜战、穿插迂回等过去国内战争中的拿手好戏，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以这种西方国家军队所罕见的打法使美军一时不知所措。可是到了第四次战役后，美军摸清了志愿军的两个主要弱点，一个是“礼拜攻势”，就是攻击时靠身上带的粮食和弹药打仗，维持不了一个礼拜；二是“月夜攻势”，只能靠有月亮的黑夜进攻。就此美军找到了对策，即采取“磁性战术”，遭到猛攻就节节后退，并在退却途中以强大的火力杀伤和消耗志愿军，待一星期后志愿军粮弹匮乏，再进行反扑。因美军和南朝鲜军装备高度机械化，运动速度快，志愿军在作战中要追上敌人或摆脱敌人都相当困难。在此情况下，按原来的老战法打，使我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吃了亏。第五次战役结束和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总结了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毅然取消了志愿军总部提出的以运动战方式进行第六次战役的计划，决定实行过去长期尽量避免的阵地战。

当时，志愿军实行的防御办法，就是工事对工事，在阵地前实施短促突击，一次反击不超过几百米，这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中央苏区提出的办法非常相似。可是时间、地点和条件不同，彼时是错误的打法，这时就变成正确。过去中央苏区只有二三百万人口，国民党统治区有几亿人口，红军武器没有后方来源，国民党却有兵工厂和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打阵地战拼消耗的确是愚蠢的战法，可是在朝鲜战争中情况却大不一样，我国人口和兵源远远比美国占优势，武器装备可以通过向苏联订货和自己制造得到补充，长期在阵地上拼消耗，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承受；非常顾惜人员伤亡、战略重点又在欧洲的美国却难以忍受。阵地战的实践又证明，依托作战实践中发展完善起来的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我军不但可以实行阵地战，而且能够以更小的代价消灭更多的敌人。据前方作战统计，运动战期间敌我双方的伤亡对比是1：1，可是在阵地战期间则是2.7：1，打阵地战比打运动战更合算，结果，通过为时两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从来未见的大规模阵地战，最后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以妥协方式结束了战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临近结束时，毛泽东还确定应打“零敲牛皮糖”的小歼灭战，这也是根据战场条件变化改换战法的突出例子。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拿手好戏是打大歼灭战，几万几十万地成建制地歼敌，可是进入朝鲜战场后却无法这样大口吃掉敌人。当时，敌军不仅在陆上具有极大的火力优势，还掌握了制海权，使志愿军无法达成战略上的歼灭战。敌军又掌握了战区的制空权，使志愿军难以达成战役上的歼灭战。在运动战期间，志愿军虽然利用夜间穿插迂回，多次对美军成师成团地达成了包围，可是除了第二次战役中利用长津湖边的特殊条件一次基本上歼灭美军一个团之外，其余的战斗对被围美军无一能歼灭。因为一夜之间志愿军对美军师一级单位啃不动，对团一级单位消化不了，天一亮敌军优势的空炮火力就能充分发挥威力，而志愿军排以上的单位白天都很难运动，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围之敌在大量坦克掩护下突围。面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提出了打战术性的小歼灭战的方式，一次只要求歼敌一团一营。转入阵地战后，毛泽东又要求“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70页）在1952年，志愿军确定对美军一次只打一个排的阵地，对南朝鲜军只打一个连的阵地，这样才能有效达成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

毛泽东毅然决定在朝鲜战场实行阵地战，并能取得成功，使他的对手也不能不表示佩服。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戴维逊曾评论说：“灵活性对于毛来说，就是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做得很出色。改变了某些既往观念和行动方法，打了他一生中竭力避免的阵地战。……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引自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学术》增刊第22期第7—8页）

毛泽东根据战争条件的发展变化，不拘泥于传统的作战形式和过去的拿手好戏，不断变换作战指导方针，在战史上常有惊人之笔。他又从不进行孤注一掷式的冒险，因此经常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这使我军总能制敌而不为敌所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理论，这在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争指导艺术上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毛泽东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其不拘一格地经常变换作战方式，即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体现，也可以说是将革命的浪漫主义运用于军事斗争中的出奇之举，因此使拘泥于军事条令教范的行家所震惊。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诗人气质的浪漫往往过于追求遐想，某些时候也会有脱离实际之虑。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中，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其萌端。然而，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很注意听取他人意见，尊重现实和勇于修正既定方针，一些不切实际的构想通常在萌端中即被克服。1930年夏天，中共中央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指导下提出首先夺取江西、湖南和湖北全省，再“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当时，毛泽东也受到革命激情的冲动，有“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这一浪漫词句。可是当他率军到达南昌和长沙城下，面对强敌立即就有了清醒的判断，没有执行中央下达的不切实际的任务。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听取粟裕的意见改变以一个兵团下江南的方针，也是一个好例子。1948年初，毛泽东基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成功，又设想向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一次更大的跃进，即由粟裕率领三个纵队由黄河边南下，从鄂西渡长江，再进行横贯数省的大迂回，插到闽浙赣地区。毛泽东提出此议后，未下死命令，而是要粟裕“熟筹见复”。当时，以十万人孤军进行上万里远征，又要在严重敌情下横跨江南几大水系，其前景确难以预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强渡一条湘江，就曾付出过2万人的损失。而粟裕所在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行三个月行军，因生病、掉队和战斗减员就已过半。粟裕正是出于对过去历史经验的考虑和敌我军力现状的分析，向毛泽东建议，与其举行远征付出巨大代价，还不一定能调动敌人，不如把部队留在江北打大仗。毛泽东得此报告后，即召粟裕到河北城南庄他的住地面商。据毛泽东身边警卫人员回忆，多年来毛泽东第一次破除不出门迎送党内客人之例，将粟裕亲送至村边。经过这一当面会商，毛泽东决定暂不下江南，集中主力在江北打大歼灭战。这种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求实态度，与大胆出奇的构想相结合，恰恰做到了“奇”“正”结合，“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以工合而以奇胜。

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从三十年代中期直至七十年代中朗作为毛泽东在制定战略计划时的助手，就个人气质而言是一个最好的搭配。周恩来处事的严谨细致，恰恰与毛泽东擅长的奇谋远略相辅相成。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的许多大胆设想，经过周恩来的具体落实，变得更加完善可行。毛泽东晚年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方案，经周恩来设法弥补，也减少了损害。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曾比较过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战略水平，其中评论蒋介石说：“由于他一丝不苟地照搬书本，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人。这也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该书还就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说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尼克松：《领袖们》中译本第335页，338页，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这位美国政治家观察问题的角度自然与我们不同，然而有一点却是对的，那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结合，确实是中国革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的主动性、灵活性，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实践的观点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观点在战争过程中极其生动的体现。其基本精神，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创造有自己特色的独特战法，以战胜各式各样的对手。这些观点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极其巨大

的威力，对于今后研究如何在高技术化战争中以劣胜优的问题，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往的战史，主要就是以劣胜优的历史。这段光荣的历史昭示人们，如果正确认识对手，正确认识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能够树立起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以劣胜优的信心。努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逐步弥补自己的短处，固然需要。可是只讲技术，只注意改进装备，而丢掉了传统优势，那么在战争中就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我们的短处一时还不能弥补，传统的长处又被丢掉。如果造成那样的局面，就将是很危险的。军事家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给人们的一项宝贵遗产就在于，应该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条件，注意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势，寻找以劣胜优的新办法，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第六章 保卫我国安全和国防现代化的新探索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上隆重的开国大典开始，随后又举行了盛况空前的阅兵式。从摄影师留下的宝贵历史镜头中可以看到，当几十万军民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阵阵传来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许多历经战火磨练的领导人全都激动不已，还可看到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李立三眼泪已夺眶而出。郭沫若的一首诗正反映出大多数人此刻的心情——“多少人民血，换得此尊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据在场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在此时也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可是作为新生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他久久地挥手向广大军民致敬时，又比广场上和身边欢呼的人们想得更多、更远，既愉快又不愉快。用他后来的话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141页）。

当亲眼看见历经千辛万苦进行的国内战争和人民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为之付出了无数心血，并有许多战友和亲人牺牲的毛泽东心情极其高兴，这是不难想象的。可是他同时又感到不愉快的，就是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如此地贫穷落后。在开国大典上，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劲旅——标有“功臣号”标记的陈旧的“老头坦克”。涂有迷彩的日制重炮、美制十轮卡车、挂着英国斯通式冲锋枪的战士以及刚刚缴获的十几架飞机通过天安门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所有装备几乎都是缴获自敌人的“万国牌”武器。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泱泱大国，竟不能生产保卫自己所需求的最基本的武器，这些无疑在毛泽东的心底投下了一层忧郁的阴影。正因为如此，当新中国诞生不久，毛泽东就发出号召：“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页）在建国后的岁月里，如何建立强大国防军这件“大事”，一直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并为此始终努力不懈。

从革命战争到卫国战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武装斗争打江山，这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在建国前二十多年的主要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政权已经到手，革命战争就此基本结束。此后毛泽东领导国内军民进行的战争，已转变为卫国战争。尽管人民解放军没有改军名为国防军，但是其主要职责也由解放人民和解放全中国，改变为保卫人民和维护国家安全。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二十多年战争环境中，处理军事问题占用了毛泽东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建国以后，国家经济建设成为重点，加上以后出现的频繁的内外政治斗争，毛泽东的工作日程表上以军务为主的情况有了改变。然而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即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恢复后，他又一直是党的军委主席。从五十年代起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全军部队的调动、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大政方针及战略计划等，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直至毛泽东去世，他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建国后在军委总部机关工作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事关保卫国家安全的多数重要决策，最后都是在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内确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夜间灯光不熄的中南海菊香书屋，还是后来搬到中南海游泳池边，或是到国内各地视察，以及毛泽东一生仅有的两次出国赴苏访问期间，他始终警觉地注视着我国周边的形势。如何维护国家的安全，以及如何抗击外敌大规模入侵，是毛泽东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五十年代，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东部，特别关心朝鲜、东南沿海和越南三个方向；进入六十年代，西部边疆出现事端，但是他的主要着眼点仍在东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注意中国北部境外的威胁；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他又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三北”地区。在不同时期，他都着重从战略全局上考虑保卫国家安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指导国内军民进行了一次次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毛泽东从1927年投身军旅直至去世，始终没有离开过军事斗争的舞台。

全国解放后，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使过去长期分散的各战略区自行处理许多军政问题的局面有了很大改变。由于对外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的重大利益和安全，长期习惯于农村游击战生活的党内军内干部对此普遍经验不多，因此凡是涉及到对外事宜的问题，一直都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在和平时期，更是“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凡属涉外斗争，中央历来规定具体执行人员遇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汇报，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处理。为处理保卫祖国安全的各种斗争事宜，毛泽东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同样呕心沥血，度过了许多个不眠的日日夜夜。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军事上着重考虑的两项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台湾战役，以及尽快解放西藏。这两项任务既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扫尾，又都是与防止帝国主义入侵、保卫我国海防边防安全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紧密联系在一起。1949年12月毛泽东启程赴苏联访问时，在火车上仍研究如何进军西藏和解放沿海岛屿。如今查阅毛泽东访苏期间的电报，其中有许多是关于进军西藏和准备渡海作战的指示。他虽身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却时时心系我国的边疆和海防。在“一唱雄鸡天下白”之际，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受外人欺凌而痛心疾首的伟大爱国者，毛泽东在此刻急切要解决的正是消除那“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后果，完成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西南和西北军区的部队刚刚完成对国民党军的千里长途追击，又奉命进军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这一向艰难程度堪称世界战争史上之最大的雪域高原的大进军，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完美结合，终于在1951年胜利完成，从而及时粉碎了某些外国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制造所谓“西藏独立”以分裂祖国的罪恶图谋。五星红旗胜利插到了最西部边陲的喜马拉雅山上，使我国神圣领土西藏回到了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怀抱。时至今日，面对着国际上某些敌视中国的势力和反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徒劳狂吠，一切维护我国统一安定的人们追思起建国之际毛泽东就毅然下令进军西藏的果断决策，都不能不为之感怀。

解放台湾的渡海作战计划，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直接出动海空军入台保卫垂危的国民党当局，新中国又没有强大的海空力量，因而最终未能实现。对于美国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行为，毛泽东一直怀有极大的义愤，此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军事上的措施，争取驱逐美国武装力量出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最后任务。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毛泽东有生之年未能达到这一目标。毛泽东在去世之前回顾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认为第一件事没有完，

就是“那几个海岛”仍没有收回。这是军事家毛泽东一生中的憾事，也是他留给全国军民继续奋斗的目标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过去长期敌视中国革命的美国对我国安全首先构成了威胁。美国不仅继续支持台湾当局袭扰大陆，又在中国东部组织“遏制共产主义”的包围圈。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马上投入军队干涉，并出兵控制中国领土台湾，援助侵越法军，对新中国形成三个战略方向“三管齐下”的严重威胁。随后，侵朝美军又超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面对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一场较量，毛泽东从国际战略全局及新中国的安全着眼，毅然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陆续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参战，进行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几十年的胡乔木回忆，他见到毛泽东有两次战略决心最为难下，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下决心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自卫战争，二是出兵抗美援朝。尤其是正式出兵朝鲜的前二十天里，毛泽东日夜思考，多少天不能入睡，其间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后又通知暂不出动，以再思再议。经综合分析国际战略全局，反复权衡利弊，最后认定“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17页）10月19日傍晚入朝部队开始过江时，多日不眠的毛泽东躺在床上仍在反复思考，不能入睡。当听到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报告部队已经过江后，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睡觉”，随即很快地入睡。此时终于箭已离弦，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这一战略决策开始付诸实行。

毛泽东敢于作出这一震惊世界的决策，完全出乎美国方面的预料，也使斯大林惊喜过望，显示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过人胆略和气魄。可以说，在这场涉及到美苏中朝几方的国际冲突中，中国方面虽因缺乏现代化战争经验，一些战役指导确有可议之处，然而总的看来，毛泽东在战略上还是最为高明的，而其他几方面都犯了战略判断上的大错误。

斯大林在战略问题上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套用美国未敢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胜利的前例，战前未估计到美国会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朝鲜人民军在南朝鲜战场告急时他又不肯直接援助，使美军能大胆越过三八线北进。杜鲁门最大的战略失误则在于轻视新中国的力量，将中国的警告当成虚声恫吓，骄狂北进，以致出现了美国自己承认的“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的局面。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即预见到战争将是持久战，调动全军的战略预备队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当美国不顾警告超过三八线北进后，毛泽东经反复考虑，从国际上美苏对峙、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其战线太长、兵力分散等方面着眼，科学地判定即使中国参战，朝鲜战争仍有可能地方化。于是，毛泽东一方面确定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出国参战，既敢于同美国交战又避免扩大战争；一方面又设想应付最坏可能，即准备美国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和对华宣战，下决心打烂了重新建设。以后的事实证明，采取这种形式参战，既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援助了兄弟邻邦并保卫了我国安全，又防止了战争扩大到我国境内。

朝鲜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典型的局部战争，开辟了以核武器为后盾的现代国际冲突的新式样。在此之前，美苏等大国都是以应付世界大战那样的全面战争来进行战备，可是朝鲜战争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战略。这种目标有限、手段有限、作战区域有限的局部战争，也为弱国战胜强

国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在这场战争中，新中国综合国力虽远比美国弱，但是集中力量攻击号称“世界霸主”的美国的战略侧翼，而且实行“一边倒”即与苏联结盟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牵制美国，这样就能确保在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实现了“保家卫国”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目标，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国际上落后挨打的地位，使中国在军事上终于骄傲地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经过这场战争，当时经济实力和军事技术居世界首位的美国也第一次将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在抗日战争结束时，高居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上以“调停”人自居的美国将军，在朝鲜不得不到中朝军队控制的开城进行谈判，最后又以妥协达成了停战协定。这场战争的结果，也使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威望得到空前提高，不仅争取民族解放的各国人民纷纷学习他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新中国对手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从此投入很大力量研究毛泽东的军事学说。不论国际上这众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抱着什么动机，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却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毛泽东又科学地分析了周边的形势，既针锋相对地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边的侵略威胁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又认定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因而在斗争中仍沿用有理、有利、有节的传统，并力求以斗争来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

由于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坚持对中国的南部邻邦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实行殖民统治，并对三国的抗法武装发起殖民战争，中国出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周边安全的目的，自1950年起开始以提供物资、派出顾问等方式支援越南的抗法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为实现其所谓“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又企图在邻近中国南部边境的地区扩大战端，以干扰和破坏我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国内安定。美国大力支援久战疲惫的侵越法军，一再给已经丧失获胜希望、打算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的法国政府打气，并于1954年初公开表现出派军队直接介入越南的意向。

面对中国南部复杂的战略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科学地分析了敌、我、友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研究了美国和法国的矛盾，决定利用法国的厌战心理破坏美国企图扩大战争的阴谋，并力争在美国介入前以和平谈判方式结束战争。为此，经毛泽东亲自筹划和同意，中共中央在国际战略上确定了“联法抗美”的策略，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实行“以打促和”的方针（见拙著：《熄灭印度支那战火的卓越历史》，《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大力援助越南人民军攻克法军重要据点奠边府，以实力迫使法国政府接受和谈。当越南人民军在战场上以打促和有了进展后，毛泽东又确定尽早争取和平解决。这样，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以及中苏越三方配合，达成了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协议，同时又尊重老挝、柬埔寨人民的选择，要求越南人民军也同法军一样从这两个国家撤出，不去实行不切实际的“解放”老、柬，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计划。

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毛泽东又亲自筹划了1954年末至1955年初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当时，美国和台湾当局勾结，一再发出以海空军参战甚至使用原子弹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直接掌握作战的军事政策和战斗范围，既打击了这些岛屿的国民党军，解放了浙东各岛，又采取了慎重的方式，避免了中美直接交战。随后，毛泽东又确定停攻金门、马祖，与美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及时缓和了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1955年以后，毛泽

东还确定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随后又建议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从此主要着眼于通过政治方式达到祖国统一。

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拒绝和平谈判，美国又积极策划以台湾海峡为界分裂中国，甚至秘密支持“台独”，毛泽东又确定在台湾海峡应保持对美蒋的军事斗争。1958年夏秋，毛泽东亲自筹划对金门进行炮击，其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对国民党军，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并增进海峡两岸接触的可能性。同时，毛泽东又要通过这次炮击进行火力侦察，对美国实行战略上的摸底，以搞清它在远东的战略是攻势还是守势。

毛泽东确定炮轰有美军顾问的金门，炮击美蒋混合编队的舰船队，以这种持虎须的方式进行战略侦察，的确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体现了非凡的胆略。虽然毛泽东严格要求前线部队“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但是这种炮击很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当研究炮击金门的部署时，前线指挥员报告无法保证不打到美国人，为此毛泽东在北戴河整整考虑了一天一夜，最后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打。但毛泽东又严格要求，如美舰向我开火，没有命令不许还击。

1958年9月8日和9月11日，美国军舰两次掩护国民党军船队驶入金门海域，人民解放军炮兵猛烈炮击了美蒋混合船队中的蒋舰。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美国虽然表面上为国民党军“护航”，事实上遇炮击即退，表现出尽力避战的守势姿态。当时的前线指挥员叶飞事后回忆说：“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这次较量的意义和胜利，不在于击沉、击伤蒋军多少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凶恶强大的帝国主义的底牌摸清楚了。”（《叶飞回忆录》第662—6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正由于摸清了美蒋的矛盾和美国战略上的底，毛泽东对台湾当局发出了“化敌为友，此其时矣”（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的号召，此后只实行象征性的炮击，并进一步开展了和平统一的工作。同时国内得以大量减少军队员额和军费开支，以加强经济建设。

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前期，在保卫我国安全的斗争中毛泽东一直以抓住主要矛盾、确保重点的精神确定战略重点，反对采取“四面出击”。在我国西部，尽量保持安定，以避免分散主要注意力。由于我国同西部邻国存在着边界领土问题，当时毛泽东确定了对这些周边国家采取睦邻政策，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可拖下去，以避免干扰战略重点。

建国后，我国西部在对印关系上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印度自独立后，就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藏的遗产，包括驻军和通商的特权。对于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侵略遗迹，中国政府当然要坚决予以取消。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人民解放军入藏后对于印度在西藏的驻军没有立即驱逐，而是通过外交方式劝其撤出。对于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和印军原已侵占了的部分两国间有争议地区的问题，中

国政府也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1959年印度政府公开进行反华并制造边界事端后，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驻印大使开诚布公地将我方战略意图告诉印方，说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方，而不在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当代中国外交》第1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为此，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的措施。1962年虽然被迫进行了边界地区有限的自卫反击战，也是速战速决，取得胜利后即后撤。这样既给入侵者以惩罚，又避免了长期纠缠，以保证将战略重心放在东部。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作战总结时曾对这种式样的局部战争作出这样一个归纳：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也不能和，打过头了还影响和。这一总结，恰恰反映出建国后局部战争的真谛，说明了这种战争与以往革命战争的根本区别在于，斗争的目标已不再是追求那种全歼敌军和消灭其国家机器的全面胜利，而是在力争维护国内和国际和平的前提下采取有限的行动，以保卫我国的安全和权益。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斗争中的战斗口号，也由过去的“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变为“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后，毛泽东虽然一直准备应付全面战争，但是他在指导局部战争的实践中已经得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并给现在和今后的军事斗争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启示。

确定积极防御，坚持有备无患

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还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国家的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决定了我国的战略方针只应是防御的。中国共产党支持世界各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情各国的革命事业。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早已说明，革命是各个国家社会发展和人民解放的自身要求，不能从外部输入。我们的立国政策，也决定了我国要采取和平外交政策。从这些出发，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准备主动对外国进行战争。然而，帝国主义一直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威胁政策，我国周边某些地区的扩张主义者也觊觎中国的领土，这使我国不能不制定应付外敌入侵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建国后一直从战略全局上思考国家的防御问题，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经毛泽东同意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以往指导革命战争的“积极防御”，并确定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战略指导原则。毛泽东坚持对外防御的原则，并从一贯的力求主动、避免被动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出发，要求防御必须是积极的，反对那种消极的分兵把口式的被动式设防。

刚刚建国时，一些同志以“坐天下”后的“守业”心理，在设防问题上处处分心，曾计划在边防大修工事。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了严肃批评，指示构筑防御工事，只择最需要者做，不要到处做，大陆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做。敌来应让其登陆然后歼击之，毛泽东还针对广西的设防问题指出，我军应当位于纵深机动地区，待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之。这就是我军历来战胜敌人的办法。你们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成被动挨打的姿态，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错误的。

在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计划时，毛泽东历来将“诱敌深入”作为一项重

要内容。这一方法其实是我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毛泽东在思考新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方针时，又一直把这一拿手好戏放在优先地位考虑。由于当时我国面对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装备技术都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军队及其仆从，毛泽东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来不是好办法，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因为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便于发挥我们的长处，大打人民战争。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使其分散兵力，便于我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敌人放进来，无非是让敌人占了我们什么地方，名誉不好。但这不要紧，问题的关键不是名誉，而是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 446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对于诱敌深入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将其绝对化，并不是主张一味地放敌入境。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内没有多少坛坛罐罐，可是当新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后，对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地区，毛泽东则要求拒敌于其外，坚决保卫。朝鲜战争期间，当美军威逼鸭绿江边，威胁我国的主要工业基地东北，并有占领鸭绿江上的电站控制东北电力的危险时，毛泽东就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在发扬国际主义义务的同时力求在境外“保家卫国”。此后，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诱敌深入不是不要防御，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我们不能学蒋介石，让日本人很快打到了南京、长沙；不能学斯大林，让希特勒一下就逼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该顶的地方还是要顶，而且要顶相当一段时间，但顶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使我们后边有时间作些准备（注：同上书第 446—447 页）。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毛泽东同意军委确定的“北顶南放”的方针。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都以东北和中部内地为工业建设的重点。东南沿海各省因属于准备“放”的地区，在国家重点建设“156 项”中，一个项目也未安排。这种根据保卫国家安全和建设的全局需要，在部署上有顶有放的思想，正体现了战略方针的求实态度和灵活性。

新中国成立后，保卫我国安全面临的另一重大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旧中国长期“有边无防”，甚至与多数邻国的国界线都未划清的状况，我国与周边邻国存在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有一些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后果。从新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发，必须冷静地对待这些历史问题，不能凭藉武力再去改变边界现状。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确定了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安定四邻，便于建设的方针。即使是对于国力和军事力量远远弱于我国的一些邻国，也绝对不能持大国强权的态度，而是要通过平等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在未能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共识前，可以暂时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这种作法，不仅在国际上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有利于争取我国周边的环境稳定，避免使我国与邻国的关系紧张，以影响国内的建设。

根据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原则，至六十年代前期为止，我国与除印度、苏联以外的陆上邻国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在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毛泽东又一向重视加强边防和海防的守卫，不容许外国再侵占我国的疆土，再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印度政府不顾我国以“互谅互让”的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的一再呼吁，出动武装部队进入双方争议地区，企图强占这些争议地区，以制造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进行了

有限的还击。为缓和中印边界紧张局势，1959年末毛泽东提出建立武装隔离带的设想，以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就此避免冲突。根据这一设想，中国政府曾向印度政府建议，双方军队各自从边界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在印度政府拒绝接受时，毛泽东却毅然决定采取单方面的后撤行动，并规定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本侧3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这样，曾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防止了边境武装冲突的发生。1961年末以后，尼赫鲁政府又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内外处境困难，有机可乘，于是在边境推行“前进政策”，派兵入侵蚕食中国领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又亲自确定了中印边界斗争的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尼赫鲁执迷不悟，仍坚持以武力推行其“前进政策”。当印军发起武装进攻后，毛泽东才最后确定反击的决心，并于1962年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进行了一场作战时间、地域和目标都很有有限的反击战。这一仗既对印军达成了有效的歼灭，使其一败涂地；同时又乘胜即收，及时后撤，并释放了俘虏，归还了缴获的武器装备。可谓打得痛快淋漓，又潇洒至极。这一打狠打痛印军，使其多年心有余悸的胜利，基本上制止了印度扩张主义者对中国边界的进犯。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和部署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终于达到了既打退入侵者，又能争取中印两国长期和平相处的目的。

为了确保我国边防海防的安宁，建国后毛泽东还一直亲自掌握边防海防斗争的政策。根据规定，我国边海防部队要严守疆界，处理外国入侵事件，要从全局着眼，从政治上、外交上着眼，宁可在军事上失掉某些战机，也不要使我方在政治上、外交上陷于被动。在五十年代，美国飞机经常入侵我国领空，毛泽东曾确定我机不得出领空，但美机如入侵我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之。六十年代初，鉴于我国面临的困难局面及美机一般只是“擦边”袭扰侦察的情况，经毛泽东决定，中央军委曾规定对入侵美军飞机一般不予攻击（《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460页）。直至1965年美国全面扩大侵越战争并不断以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并向中国飞机发射导弹，毛泽东根据美军的这种挑衅行动，才确定给予坚决打击。在决定打击入侵美机的同时，又规定了要将其歼灭在国境线内。这样，既打击了敌人，又尽量避免扩大冲突。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在探索国家建设的道路上有过种种失误，但他在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直至晚年，他还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同时要求中国永远“不称霸”。对于战备问题，毛泽东也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过“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1966年，毛泽东曾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作了解释，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引自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第232页）尽管对这一指示的执行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种做好国家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战略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七十年代初，毛泽东虽然已无法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中摆脱出来，但他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出发，毅然打破了意识形态上某些概念

的束缚，决定实现中美和解，在国际斗争中形成，“大三角”的态势，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使中国摆脱了一度多面受敌的不利地位。这一英明决策，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对维护国家安全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体现了毛泽东在晚年仍保持着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以我为主”，实行中国式的现代化

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游击战大师，但是他始终着眼于中国革命军队实现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身居陕北窑洞的毛泽东虽然要求人们老老实实在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但同时瞩目于未来说：“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30页）。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又提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页）的奋斗目标。1948年秋天，面对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毛泽东又要求全军进行整编，实行统一的番号 and 编制，并强调：“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正规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74页）。这种对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向往，也正是对祖国富强的向往。

军队现代化，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日新月异，使军队现代化的内容和标准也在不断提高。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的要“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是建立装备汽车和少量装甲车的机动部队。全国解放之初，毛泽东又认为过去的“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和带游击性等等”，是军队建设“处于比较低级阶段”的表现，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进到了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14页）。过去的向往，从此开始变成了现实。

青年毛泽东就曾对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痛心疾首，立下了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志向。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解放军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使毛泽东改变国家落后挨打的面貌的雄图得以施展，在过去战争年代设想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具备了基本的条件。由于统一的国家政权的建立，有了稳定可靠的物资供应来源，随着国家现代工业的建立，发展先进武器，改善部队装备也有了现实的可能性。1950年6月，毛泽东曾深有感慨地说过，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很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空军，对付头上的飞机，就是凭不怕死，凭勇敢，凭敢于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就要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尤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引自《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476页）。

如今，人们翻阅毛泽东的墨迹，可以看到建国之初那些激动人心的题词——“创造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当时的历史环境，也催人只争朝夕般地加紧现代化新军兵种的建设。蒋介石逃出了大陆，却以飞机不断地轰炸上海等大城市，造成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面临停水、停电之危，中国政府不得不请苏联空军一部入沪担任空防。随后，美国欺负新中国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出兵控制台湾海峡，并长期赖着不走。它依仗其拥有的世界最强大的空中力量，不仅在朝鲜狂轰滥炸，并时而把炸弹投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中国军队及其领导人是最为宝贵的一次现代化战争的实际演示。这场战争尽管是以非政府宣战的志愿军名义进行的，在实际上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过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场战争。在战争中，中国参战部队主要依靠兵力优势、政治优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的胜利，并通过顽强的阵地防御迫使敌人以休战（停战）结束战争。这种结果，在当时对于新中国来说，已经是以自己的国力所能够取得的最为辉煌的胜利。这场战争还显示出，由于中国的装备和技术十分落后，大大影响了志愿军部队作战效能的发挥。在国内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能够成师、成军、成兵团地歼灭国民党军，可是在朝鲜战场上想成团建制地歼灭美军都难以做到。最为无情的战争实践证明，发扬传统的政治优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固然可以弥补武器装备方面的不足，却不能取代技术兵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总结经验，当朝鲜战场的战火还未熄灭时，毛泽东就向全军深刻地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37页）朝鲜战争刚刚结束，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训词中强调：“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同上书第361页）通过朝鲜战争，毛泽东和军队的其他领导同志都深刻认识到现代战争中后勤工作极为重要的作用，决心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线”的后勤体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要求“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同上书第360页）

在建国之初全面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之时，鉴于当时面临的作战任务，毛泽东将创建空军列为首要的紧急任务，从1949年末至1953年间，毛泽东亲自批阅空军请示报告达数十份，并向苏联领导人发出许多封信件、电报，不仅确定了空军建设的方针、原则，还直接出面解决购买装备等问题。这样，空军从无到有，建军四年就发展到拥有3000余架飞机，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当时就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对于海军建设，毛泽东开始也将其列入紧急任务，后来为集中财力于空军建设，又决定暂时压缩其建设规模，先从造小艇入手，积累经验。对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等技术兵种的建设，毛泽东也都予以了高度重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央军委还确定了“边打边建”的原则，在购买苏联先进装备的同时，使部队通过实战迅速学会使用这些装备，从而以和平时期的不可能达到的高速度，建设起规模和技术水平都位居世界前列的新的军兵种。创建新的技术兵种及其参战的实践经验，更使毛泽东加深了对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4页）这一时期开始后不久，就不幸被不正常的政治运动的风潮所打断，但是其伟大的开端是永远值得人们纪念的。

在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根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原则，既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又反对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86 页）

旧中国留下来的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刚刚解放时，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仅占 17%，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产值则占 80%。当时全国的钢产量只有 15 万吨，供国内做钉子都不够，连“洋钉”、“洋镐”、“洋铁桶”、“洋火”、“洋蜡”……等日用品都要靠来自于外“洋”，国内工业更谈不上生产汽车、火车、飞机、机床等。解放时的全国人口中，有近 80% 的人是文盲，而有初中以上学历者只有 1%。在人民解放军中，文盲也占全军总人数的 70% 左右。一个由千疮百孔的小农经济支撑着的、科学文化极其落后而又有近 6 亿人口的国家，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旧中国的遗产，也是开始进行建设的起步基础，毛泽东曾概括了中国国情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二是一穷二白，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我们思考一切建设事业，包括国防建设在内，都离不开这个基本点。

从这个基本点起步的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又不能照搬当时被称为“老大哥”的苏联的作法。根据中国人民具有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同时国家经济又比较落后，不可能使军队迅速更换新式装备的实际，毛泽东提出了现代化的阶段性。1958 年 6 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分析了我军建设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米加步枪，从 1927 年到 1949 年。现在是步枪加飞机大炮，几年后还有新发展，是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毛泽东还指出，只讲导弹、原子弹、氢弹不行，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既要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洋的土的要结合，不要否认常规武器的作用，否认是不对的。我们打败了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看不起自己的经验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 483 页）。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其核心就是“以我为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

“以我为主”这一思想固然是正确的，不过在 1958 年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这一口号，使得理解和执行时出现了偏差，特别是把“以我为主”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截然对立起来。“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下令“外国的东西也一概没收，来个收书”，后来只许学一本“红宝书”，更是把固步自封的僵化意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走到只有“我”而无“别”的荒谬极端。

近现代世界战争史证明，没有国防工业的国家是一个软骨动物。旧中国不仅兵工企业极为落后，而且军队装备从多国引进，以致武器混杂，严重缺乏标准化。人民解放军在战争时期靠缴获装备部队的武器，也是这些型号混乱的杂式兵器。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入朝作战时，各单位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就是以师或团为单位，将同一口径、型号的枪支统一调配使用，如某一团都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枪，某一团都使用美制三式步枪；并要求搜集旧的军火库存并加以分类，这样才能勉强保障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弹药供应。面对这种世界上少有的装备杂乱的状况和军工水平严重落后的局面，尽管这一时期国家财政极为困难，毛泽东仍下决心主要以向苏联贷款购买的方式，在

全军统一更换苏式武器，并仿照苏式标准建立自己的军工企业，从而使建国初期的军事斗争能得到物质上的基本保障。

在学习苏联的同时，1954年毛泽东又为国防工业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当时，苏联希望我国主要以向他们订货的方式解决装备问题。可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而且从世界上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就越强，他国提供的东西充其量只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例如：五十年代苏军装备了米格19型飞机，才向中国提供米格17型歼击机；苏联已研制成T55型坦克，方能帮助中国建立仿T54A型坦克的生产线。要真正达到国防现代化，并不受制于人，唯一的出路是充分吸收他人的成果，走自己研制、生产之路。因此，毛泽东坚持要求随着发展本国工业，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国防工业体系。在中国向苏联提出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就包括一大批国防企业。同时，毛泽东又决定建立我国自己的各种武器装备的研究机构，独立地进行装备研制工作。

由于实行了这种正确的方针，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我国的国防科研和生产单位在消化吸收苏式装备技术的基础上，再进行自己的研制，不仅大大节省了时间，在取他人之长的同时也走出了自己的路。雄辩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建立我国独立的国防工业和科研事业的方针是极为英明的。如果把立足点放在外国技术援助或购买外国武器上，必然造成我国国防事业的依附性。正由于坚持了以自力更生为主，1960年苏联突然断绝援助的事情发生后，中国的国防事业并没有陷入困境，仍然以较快的速度继续发展。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武装力量数量大，其使用的武器中既有部分先进装备，又有大量旧式装备。针对这种不平衡状态，毛泽东根据“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提出了各种武器装备有效搭配的原则。他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曾指出：我们发展核武器，不能因此否定常规武器。这是因为，从历史经验看，我们用低级的落后的武器打败过用高级的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强大敌人；从现实可能看，我们将来的反侵略战争，将有大量民兵参加，只讲导弹、原子弹、氢弹，民兵是否也能每人发一个原子弹呢？所以，洋的土的要结合，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514页）。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为我国武装力量的装备合理配备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我国武装力量建设的体制问题上，毛泽东也根据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和中国具体情况，在重视正规军建设的同时一直重视民兵工作，强调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五十年代中期，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根据中国的特点和世界各国后备力量动员的经验，开始结合民兵工作进行预备役制度的建设。这一工作虽然因后来反教条主义和“全民皆兵”式的大办民兵而遭冲击，却作为宝贵的尝试留下了重要经验。

1958年夏天，毛泽东又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虽然这一口号经机械理解，再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不正常状态，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不过，作为一种全民防御思想，它仍然可以作为战时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原则。1962年，毛泽东提出了被称为“三落实”的民兵工作方针，即要求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以建设现代化的常备军为重点，同时根据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武装力量传统体制，注意发展民兵组织，建立国家

动员的基础。这样，就能使人民战争的传统法宝在保卫祖国安全的斗争中也能得以发挥其威力。

建国后的军队建设，更是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使军队永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始终是毛泽东强调的首要原则。他一直要求“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引自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第221页）为使军队永保本色和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毛泽东还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9页）。在1956年11月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他还以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战士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事例教育全党全军，说明“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963年，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不久又高度评价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这些要求，不仅使军队有效地加强了革命化建设，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五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走过来的人，通常都怀念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赞颂当时良好的军民关系。在那个时代的人民解放军官兵主要不是靠穿草鞋、穿补丁衣服，而是靠像雷锋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种种行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光辉甚至接近圣洁的形象。虽然一些“左”的思想已经开始严重干扰军队建设的方向，但是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的道路，毕竟是在这一时期开创的。

真要加强国防建设，就要降低国防费用

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又是一位公认的哲学家。他在五十年代访问莫斯科与苏联哲学界同行们交谈时，曾表示过自己的愿望是到大学教哲学，而不想再当主席。在探索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也以哲人的思维详细地阐述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有效地加强国防建设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经济建设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国防建设却直接消耗物质财富，这二者从形式上看是相互对立的。但若以辩证的观点将它们统一起来，深入考察二者的内在联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也可使它们相辅相成。因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建设起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形成强大的国防力量。同时，国防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没有巩固的国防，经济建设难以正常进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分落后，亟须以主要精力加速经济建设的国家来说，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对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至关重要。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曾较好地处理了这二者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局部政权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从减轻根据地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就有过赞成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建议的佳话。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立后，极其困难的国家财政状况，又马上将军政费用支出和经济建设这二者的矛盾摆在国家领导人面前。在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应复员一部分，以节省军费开支，腾出财力人力支援国家建设。毛泽东提出的这

些主张，表明他在筹划新中国建设的大业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国防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和服务，同时也要兼顾国防需要的思想。根据这一设想，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军委曾确定了一年左右将全军员额由 540 万人压缩至 400 万人的计划。此后，因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军队被迫停止刚刚开始复员并继续扩兵，最高员额达到 626 万人。1951 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开支也高达 48%（其中包括在朝鲜的战费）。朝鲜战局刚刚趋于稳定，毛泽东就立即决定恢复军队复员工作。195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签发的《军委关于集体转业的动力令》中，明确阐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强调指出，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根据这一决定，在朝鲜停战之前全军总员额就已经压缩到 450 万人，1952 年度国防开支降到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 33%，同年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已超过了国防费用。

朝鲜停战后，毛泽东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导思想，又进一步要求压缩军队员额和降低军费支出的比例，挤出钱搞建设，并说明这才是真正加强国防建设的正确途径。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曾十分精彩的论述道：“你对原子弹的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72 页）

对于长期习惯于按战争环境的方式进行国防建设的一些军队干部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面对美国占据台湾，支持蒋介石政权对大陆沿海进行袭扰，以及国民党政权逃台后一直叫嚷“反攻大陆”的形势，许多同志认为要加强国防，就要多拨钱来买装备，多编部队，多搞兵工厂。经过毛泽东的科学解释，全军统一了思想，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又一再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员裁减。在 1956 年全军总数 370 万人及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 19% 的基础上，毛泽东又确定军队继续实行大幅度的减少员额，至 1958 年全军总数降至 237 万人。国家就此腾出大量经费用于经济建设，我国的核工业和各种尖端武器的研制，因此就有了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并开始上马。

在五十年代苏美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实行“冷战”对抗的形势下，国际性的军备竞赛持续进行。当时，作为中国主要对手的美国不断加速更新技术装备，这对我国新建的国防工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毛泽东当时将长远考虑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就我国国防科研、生产及部队装备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至 1954 年，我国已陆续从苏联购买了装备 100 个师的武器，加上国内陆续建成了生产仿苏式装备的工厂，基本完成了按苏式装备的换装。这些多数属于二次大战时期水平的装备虽已显得落后，却还可以应付一般性局部战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决定除加强尖端武器的研制以求尽快突破外，在常规装备上不参加国际间的军备竞赛，以有限的经费主要投入武器的研究，而不进行大量生产和装备。同时，部分国防工厂也开始了平战结合、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相结合的尝试。

1959 年 10 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就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与装备的关系问题作出规定，确定常规武器的生产，除了适当满足目前部队装备

的需要和极少量储备外，今后主要应着重于研究和改进。翌年，军委扩大会议又提出，新型号的常规武器制成后，除供应科学试验和指定的学校、部队作训练之用外，也不要大量生产。这种多研制，少生产，少装备的原则，为我国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加快部队的装备现代化进程找到了一条便捷的途径。

可惜的是，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进行的规模超常的东南沿海战备行动，以及这次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对战争危险的估计日益升级。当时，国内经济困难，国内外敌人确实也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以乘机施加压力。然而从总的形势看，美国的战略重点并未改变，还没有发动对华战争的意图，而台湾当局离开美国的直接帮助，靠自身力量不可能对大陆进行大规模进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借夸大敌情和制造备战气氛，显示自己的警惕性，以求在政治上迎合毛泽东。由于强调战争迫近，国内军工生产的摊子就此越铺越大，而且日益偏离了平战结合的轨道，不仅国防费用大幅度增加，许多早已落后的装备又大量投产。1964年美国袭击越南北方之后，国家经济建设又转向以战备为中心的轨道，直至毛泽东去世，国防工业在和平时期长期未能跳出单纯军事性的圈子。

虽然自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有关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辩证关系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未能落实，其宝贵思想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时重新发扬光大。如今的人们对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的国防建设中种种措施给予高度评价时，不要忘记其最早的奠基人正是毛泽东。

从开始“建军史上伟大转变”到“两弹”告捷

1951年1月15日，在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军校院内，隆重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立典礼。大批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中久经锻炼的人民解放军指挥员，走进了宁静的课堂，开始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技术。院内担任教员的多数人，正是不久前这些学员的手下败将——有较高文化和军事科技水平的国民党将军和教官们。当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军事学院成立的意义，认为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13页）。

夺取了天下的胜利者向战败者学习长处，不仅显示了宏大的气魄和胸怀，而且说明了胜利者又要攀登一个新的高峰，即实现向建军高级阶段迈进的伟大转变。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毛泽东以其卓越的见识，及时地指明了这一通向国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青年时代毕业于师范学校，并任过教员，晚年也说过自己只想保留一个“Teacher”即教师的称号。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的确非常重视教育，可以说办学兴教的历史也已成为建军史上重要组成部分。当他刚上井冈山不久，就建立了红四军教导队，成为军校的雏型。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又决定建立红军学校，并解释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他针对蒋介石搞了一个黄埔系而强调指出，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刘伯承传》第8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马上又以很大精力办红军大学，并亲自讲课。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

就是红大的讲课稿。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办校活动达到了高峰，不仅在延安开办了各种训练党政干部的学校，由红大发展成的抗日军政大学更是他关注的重点。毛泽东亲自确定了抗大的办学方针，并经常亲自去讲课。“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不仅总校不断扩大，在许多根据地还建立了分校，八年抗战中培训了近20万干部。那些多数出身于贫苦农家，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军队指挥员们，正是在这里受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并进行了一些以步兵战为主的作战理论的系统学习。当然，由于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所限，这类军校即使名为“大学”，其实都是为期几个月或一年左右的短训班，还没有可能全面和深入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

全国政权的建立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建军高级阶段，终于为有着长期光荣战斗历史而技术水平却十分落后的人民军队创造了进行现代化教育、训练的前提。建国后准备渡海作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又催促着全军迅速掌握新的作战手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将兴办军校和开展正规化训练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经他批准，建国后空军迅速开办了十余所航校，突击训练空地勤人员，海军也建立了海校。与此同时，全军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仅仅三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扫盲，而且使大多数战士达到了高小及其以上文化程度。在1951年，经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全军陆军部队也开始了正规训练。1953年，毛泽东又发出“展开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这种正规化、现代化的教育训练，使人民解放军战术技术水平很快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除了国内的教育训练外，为了很好地利用朝鲜战争这一当时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战争锻炼部队，毛泽东又决定以轮番参战的方式，安排人民解放军全军备野战部队都以“志愿军”名义入朝轮战。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常委会上谈到这一计划时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6—67页）虽然因朝鲜停战这一计划未完全实现，但是经过二年另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国内以志愿军名义共投入朝鲜战场200多万部队，以2年人民解放军全军定编的部队计算，分别占野战军的73%，炮兵部队的67%，坦克部队的55%，铁道兵的100%和空军师的52%。与拥有最先进装备和技术的美国军队进行交战，既是对中国军队新建的各技术军兵种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通过这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大演习”，我国空军、炮兵和其他一些兵种的战术技术水平在当时都迅速跃居世界前列。

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又雄辩地证明了培养通晓现代战争的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性。经毛泽东批准，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后勤学院及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高等科技学府——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相继建立起来，毛泽东还分别为这些学校发布了训词，强调了正规化教育和掌握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1953年8月，毛泽东在给刚刚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又明确提出了现代化国防的概念，强调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为了提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经毛泽东批准，1955年11月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进行了首次陆海空军联合抗登陆演习，全军各部队也依此方式开展各种演习，并将其当成平时训练的重要内容。总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教育训练思想，体现了一位有着光荣的过去又勇于探索未来的军事家的开拓精

神，是他军事生涯中光辉的又一页。

令人遗憾的是，自 1958 年反教条主义后，全军教育训练开始受到不正常的冲击，六十年代林彪搞的军事取消主义和空头政治，则危害更烈。七十年代初，当毛泽东对林彪两面派的实质有所认识后，批评了当时部队大搞空头政治而不认真进行训练的作法。毛泽东特别指出，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的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 487 页）。他还专门指示全军进行野营拉练，并说，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林彪自我爆炸后，经毛泽东同意，全军又恢复大规模的演习，并加强了教育训练。毛泽东晚年的这些主张，仍不失为人们应该遵循的正确指导思想。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面对着对付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掌握现代尖端武器也成为摆在我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我国还在医治战争创伤，国内军内还以极大的力量扫除数量占绝大多数的文盲时，世界发达国家的军队已经开始进入了“喷气时代”、“原子时代”。在只尊重实力地位的国际强权者面前，没有核武器就没有大国的地位。正是由于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特别是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美国才敢于出兵台湾并赖着不走。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又一再公开扬言考虑使用核武器，对此中国人民虽然表示不惧怕，但是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一现实威胁。当时，居里夫人的女婿、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法国共产党员约里奥就曾向访法的中国学者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就要首先拥有核武器。

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向，表明了经济实力和技术的较量日益重要。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志愿军却也吃过技术装备落后的亏，最后基本上是以双方的平手结束了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速发展军事科技，我国要想摆脱被动局面，不再挨打受欺负，唯一的出路是发展科学技术，包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这样，如果遭受帝国主义的核袭击，我国才能有起码的还击手段。我国虽然不参加核竞赛，但是有一点核武器，能够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大大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

然而，在五十年代初国家经济那样困难，技术条件那样落后的情况下，要想搞核武器谈何容易！可是毛泽东仍然下了这个决心。1954 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前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并进行访问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听后大感意外，当即表示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赫鲁晓夫还认为，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最后，他只同意帮助中国造一个研究用的小型原子堆，并接受一些中国派出的人去苏联学习有关技术（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572—573 页）。如果按这种援助规模，中国的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不知到何年才能起步。苏联领导人的这一态度说明，我国发展“两弹”，不仅要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也面临着苏联的限制。

中国如果只托庇于“老大哥”的“保护伞”，到头来只会受制于人。苏联领导人的所谓“核保护伞”，另一方面的作用又是对“兄弟国家”施加压

力的工具。就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以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精神，于1955年1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毅然决定着手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从此开始了中国核力量建设的第一步。

后来的历史说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是对中国国防建设有着长远影响的英明决策。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虽然十分落后，但是国内还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国外也可以争取回来一些科学家、留学生，这其中有些人还在国外参加过火箭方面的研究设计。只要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就可以很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毛泽东对争取和使用这些科技人员十分重视，曾表示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当被周恩来称为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个最重要的成果——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被允许从美国回国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她，并虚心听取她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意见，还授予钱学森以当时许多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也未得到的少将军衔。怀有报国之心的中国科学家们迅速在为振兴祖国而研制尖端武器的共同目标下汇集起来，开始了我国独立研制“两弹”的工作。

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是近现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其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的所有生产部门。为振兴我国科学，1956年初，毛泽东发出了“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同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在其军工方面就有包括原子能、导弹等内容的我国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当时，我国培养的大量科技人才充实到尖端武器研制部门，整体科技水平在短时间内有了飞跃的进展，这些都为“两弹”及其它尖端武器的研制创造了前提。在我国科技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短期尚不能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决定以战争时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适当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再加上全国大协作，以达到重点突破的效果。

在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同时，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积极争取了外援。1956年秋天，赫鲁晓夫因波兰、匈牙利事件而在其国内外处境不利，亟须中国在政治上予以帮助，因而在对华技术援助问题上有所松动。面对这个有利时机，毛泽东决定再向苏联提出帮助我国发展尖端武器的要求，终于在翌年得到苏联方面同意。其后的两年间，苏联虽然未派出设计专家，却提供了一些已过时的导弹样品，并派来一些技术人员帮助中国建立核工厂。在这种有利形势下，1958年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又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对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努力，赫鲁晓夫越来越感到是对苏美主宰世界的一种挑战，当他提出建立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遭到毛泽东严厉拒绝后，即于1959年6月背信弃义地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制造技术及其样品。翌年，苏联又撤回了包括在中国核工厂工作的全部专家，留下了一堆“半拉子”工程。尽管如此，中国方面争取到前一阶段的有偿援助，毕竟使自己的研制工作节约了许多时间，缩短了差距。

苏联撤退专家后，我国国民经济又出现了主要因“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许多建设项目纷纷“下马”。在1961年国防工业会议上，就“两弹”研制工作是继续进行还是“下马”发生了争论。在此重要关头，毛泽东决定国防尖端技术仍要坚决上马，从而保证了“两弹”的研制能够在全国人民的大力保障下继续进行下去。

中国国防科研人员和试验部队研制原子弹、导弹的过程，是世界科研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曲动人的英雄主义凯歌。面对全国性的饥荒及由此带来的供

应困难，许多人在风沙弥漫的戈壁深处扎下了简陋的营帐。不论条件如何艰苦，“搞尖端武器”这一当时国内最引为自豪的工作，激励着这些有献身精神的中华儿女们忘我奋斗，其事迹令后人可歌可泣。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的试验场上蘑菇云一举升起，使亿万中国人欣喜若狂。两年后，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又告成功；1967年又顺利进行了氢弹试验。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抓“两弹”建设的进程实行了“超越式”起步，使我们这个没有现代国防工业基础，在建国时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都不能生产的国度，竟在十几年内跨入了有核国家的行列，堪称世界科技史和军事史上的奇迹。

几十年后的中国人回顾毛泽东当年发展尖端武器的决策，仍不能不为他那超乎寻常的气魄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所感动。正如邓小平于八十年代后期所说的，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158页）。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自己的尖端武器，有了核自卫手段，从而对保障国家安全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虽然从毛泽东时代起至今中国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希望世界上永不爆发核战争，但是中国拥有的核武器，却是维护我们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宁的无价之宝。

1975年8月，已是身染沉疴的毛泽东被送进了手术室。临做眼科手术前，毛泽东提出要放岳飞的《满江红》的曲子，在那高亢雄浑的旋律中迎接着很快将走向生命终结的挑战。诗以言志，乐乃心声。纵观军事家毛泽东的晚年，他在冷眼观察世界战略格局及筹划保卫我国安全的部署时，不论在客观效果上有什么失误，其内心深处始终抱着这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豪情。当新一代中国军人在现代化的国防事业上奋进之时，不仅永远不能忘记我国国防建设事业的这位伟大开拓者，也应始终以他的伟大思想和情怀指导和激励自己在征途上一往无前。

第七章 留给后人的遗产和反思

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曾在军事舞台上创造过叱咤风云的业绩，被无数人以无限敬仰的心情崇拜；同样，作为凡人的毛泽东身上也难免有着病弱，在去世后也经常被人评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无疑应为我们今后长期遵循。可是对于作为这一思想光辉代表的毛泽东本人，则需要有取舍地看待其留下的全部遗产，包括其正反两方面实践的经验。特别是在建国后的岁月里，由于出现了与革命战争年代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一向不甘守成并有强烈创新欲的毛泽东又在军事问题上进行了新开拓。辉煌与悲壮，自豪与遗憾，成功与失误，都交织在这条新的开拓途中。毛泽东晚年在政治方面出现的偏差，也不可免地反映到紧密服从于政治的军事领域，这些也在十年浩劫后的痛定思痛中被人们反思过，其影响至今犹在。

毛泽东曾认为自己是一个“虎气”和“猴气”并存的人物。在那举国陷入政治迷茫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林彪一伙为制造个人崇拜而炮制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颂扬一时风行中华大地。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自己的老朋友、著名美国作家斯诺时，对这种大颂扬却称之为“讨嫌”，认为除保留一个英语为“Teacher”的教师称号外，其余的应统统去掉。在举国狂热的氛围中，毛泽东保持的这种清醒是难能可贵的。其实，早在“大跃进”的问题严重暴露之后，他就深有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表示自己的一大志愿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他还说过，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满足了。无情的历史证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前无古人的探索性开拓时，任何伟大的人物都难免会有偏差，而无论成功的经验或是失误的教训都是可贵的。毛泽东曾非常深刻地说过，不要把错误行为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探索中的失误，能够使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岁月里大彻大悟，对今天进行国防现代化的事业也起到了极其宝贵的借鉴作用。

以军事方式推进国家建设的探索及其教训

笔者与多数见过毛泽东的同龄人一样，是在那个令人慨叹万千的1966年看到了身着军装的毛主席。这一着装当时虽使许多人感到新颖、振奋和盲目的狂热追逐，以为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武装斗争的青少年也要踏上新的征战之途。可历史后来证明，以风行全国的“军装热”所伴随的以军事色彩进行的斗争，倒真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同错误的对象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斗争。

领袖的穿着本身即有深刻的代表意义，在近现代史上，许多国外的领导人尽管本人并非军人，战时也往往以穿上军装的形象来影响军民。毛泽东虽然不太注重个人仪表修饰，但是其穿着也与他的奋斗和追求紧密相连。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不穿戴国民党军发给八路军的军装和青天白日帽徽，出席党的会议还常戴原来红军的八角帽，这正是提醒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共产党人不要忘记过去的光荣传统和今后的国内革命任务。1953年朝鲜停战的消息

传来后，毛泽东曾同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此后十几年，全国人民再不曾看见身着军装的毛主席。脱去军装，标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历史需要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重要关头，毛泽东以其着装向全国人民做出了正确的表率。

面对夺取全国政权后的新形势，毛泽东也曾要求有长期光荣传统的军队重新开始学习过去不懂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是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富有远见地指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随后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0页）在五十年代国家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中，毛泽东本人也以相当大的精力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价值规律，并看过不少科技方面的书籍，对过去战争时期的总结和思考则并不多见。一位建立过举世敬仰的业绩的领袖和统帅，勇于与自己熟悉的光荣的过去告别，并积极着眼于当前任务，这种求新精神，是何等的可贵！

不过，人们改变生活习惯的惯性作用，却不会像脱掉一件军装那么容易。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给毛泽东及其身边的一代领导人留下的烙印，长久地体现在观察视野、思想方式、工作作风及斗争策略等方面形成的定势。公正地讲，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在建国初期对待阶级斗争遗留问题，扫除反动统治残迹及旧社会的种种污泥浊水时，发挥过非常有益的作用。例如：以战争年代那种出动兵力和动员群众的方式，能迅速捕尽社会上的娼妓和贩毒吸毒者，现代发达国家长期一直难以消除的这类社会丑恶现象，在新中国建国后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得到解决。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时，采取战争年代那种大兵团作战以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也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果。

然而，当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国家建设转入正常轨道后，不改变以往的许多工作和思维方式，就日益显得难于适合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自建国时起，毛泽东已经在这方面有过宝贵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在1957年至1958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毛泽东在新的探索途中开始走上了误区。他看到了苏联体制的弊病，试图探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道路，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极为可贵的尝试，可是进行这一探索的思想武器，却在很大程度是向过去战争年代成功的具体经验和思维方式回归。

在以“破除迷信”为号召的大跃进开始后，毛泽东曾一再对工资制、军衔制等表示不满，认为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让步，而对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军事化的供给制生活则大力颂扬，并一度试图将其推广到全民生活之中。在“大跃进”兴起的1958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徐水时，就非常赞赏那里的军事化。同时，毛泽东认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结果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以“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为口号的大办“人民公社”、大办民兵的热潮，一时风靡全国，某些地区还进行过让全体人民都过兵营式集体生活的试验。这种无视和平时期社会运行的规律，以战时军队的要求标准对待全民的作法，很快以招致群众严重反感和彻底失败而告终。至于以军事化组织代替生产组织，以战斗行动的方式组织“大兵团作战”搞生产，也造成了强迫命令、瞎指挥的后果。凡此种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唯意志论的作为，成为随后出现三年严重困

难、非正常人口死亡成千万的重要原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许多试验暴露出严重问题后，毛泽东本人曾认真地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准备认真探索经济规律。可是，六十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论战的开始，使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又转到思考如何进行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反修防修”的问题上。此时的毛泽东仍然怀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图伟志，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失误虽然有所认识，却不能从思想方法的深层次正确地吸取教训，于是难免地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执意于行不通的主观愿望之中，革命战争中那种“不二过”的出色表现就未能再现。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有其多方面的深刻用意，其中重要一点，也包含着用以往战争年代的方式重新改造中国社会的意图。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于1966年5月7日曾就林彪所送的一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有感而发写成一信，这封致林彪的信后来即被人称为《五七指示》。这一指示的寓意远远不限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本身，是毛泽东对军队建设乃至国家建设所构想的一个蓝图，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甚至将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发展”。在信中，毛泽东以“抗日根据地”时代的情景为理想境界，要求军队应成为一个大学校，“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时还要求工人、农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和党政机关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将军队作为培养人的学校，有条件地开展些农副业生产，这些并不错。问题在于，将这些扩大为军队及各行各业的工作准则，并以此提出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大体实行自给自足、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的憧憬，则是用以往战争中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推广于全体军民。其实，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供给制和自给自足的办法，对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各个根据地来说虽是必需的，却也只能实施于占人口极少数的军队和党政干部，同时只能在对敌斗争压倒一切的战争年代采用。这种在无数革命回忆录和文化作品中讴歌的生活方式，虽然是战争年代开出的绚丽之花，却不是绝大多数人所能享受及应该得到的果实。迷恋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凋谢的花朵，势必陷入落后于时代，又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空想之中。

毛泽东在晚年的讲话中，曾一再以延安时期那种不要工资，大家都努力工作的情况为例，指责工资制的弊病并反对“物质刺激”。其实，当年在陕甘宁边区，对于黄河之滨集合起的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即投身革命的干部和军队指战员，确实可以不要工资，大家过一天三钱油、三钱盐，上下大体平均的生活。对陕北老乡们，党和边区政府却并未实行、也不可能实行供给制，将他们的生活“包”下来，还是要奖励其“耕三余一”，多劳多得。在全国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再把只能在战争年代实施于少数先进分子的生活准则推广于全社会，如同“大跃进”中所试验过，以及“五七指示”中所设想过的方式，在现实之中必然会碰壁。

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军队也同样如此。重复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环境中农村根据地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建国后的广大群众和部队都是不适用的。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基础上要求消灭专业分工，实行“小而全”的模式，也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五、七道路”虽经一再提倡却从一开始就无法走通，这正

是实践检验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决定部队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从某些意义上讲，这一行动确是在全国除军队外都已大乱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过，从毛泽东自五十年代后期的思维发展轨迹探寻，也可以说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1964年以后，毛泽东曾一再称文教战线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对党政机关日益不信任，只有对军队较为放心。因此，他强调全国学习解放军，推广实际上由林彪所倡导的那种“突出政治”的方式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直至将军队作为主要依靠力量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时，毛泽东本人还穿上多年未穿的军装。这些举动，都反映了毛泽东以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军事化的方式改造社会的愿望。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全军在几年时间里以主要精力投入了“三支两军”。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乃至农村许多生产队，都改用军队的班、排、连、营的番号，由军代表、军宣队员们率领进行训练和政治学习。在派性严重、全面内战的混乱之中，不能否认参加三支两军人员为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所作出的努力，包括所付出的许多血的代价。可是，由于整体上“左”的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上的问题，三支两军过程中也伤害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同时，将军队凌驾于地方党组织和群众之上，使少数军队干部获得不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的权力，这必然对一些人产生严重的腐蚀作用。“走后门”及以权谋私的种种腐败现象，正是在三支两军过程中急剧发展起来的，并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全国。林彪一伙也正是利用这一不正常的状态纠合成自己的集团，并对毛泽东本人构成了威胁。

长期极为艰苦的革命战争，还会给许多参加者留下一一种终生难以消除的烙印，即习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社会上的人际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曾大力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其“扩大”的内涵所指，正是把在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方式用于党内、军内和人民内部。作为军事家、策略家的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潜心于谋略的研究，对敌斗争中种种策略手法的应用到了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全国解放以后，时过境迁，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决定了对敌斗争的方式应加以改变，更不能将其扩大到人民内部。建国之初，毛泽东确实注意改变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激烈的斗争方式。毛泽东还强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那些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毛泽东也没有沿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大规模杀人的办法，而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俄国的末代皇帝尼古拉全家倒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刑队枪下，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和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座上宾。这些不称“仁政”之名却有其实的措施，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反倒起到了单纯的“镇压之权”所起不到的作用。

五十年代后期，随着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出现变化，刚刚宣布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未能实行，而以往一些对敌斗争的方式却被重新启用，并错误地加以扩大化。进入六十年代后，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日益升级，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也都错误地应用于党内斗争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196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第五条“工作方法”一节中就明确写着：“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种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工作方法上使用对敌斗争策略，一些野心家、阴谋

家又乘此机会打击无辜，自然为祸甚烈。

仔细回顾“文化大革命”史，人们确实不难看到这样一幅类似《红楼梦》中所说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文革”初期，大中学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和“战斗队”，即一批狂热的小知识分子整了教授等大知识分子。可是为时不久，工宣队、军宣队又无情地将这些小知识分子全部打入了“臭老九”的“另册”之中。在党政机关中，在造反派内部，在某些军队干部中，甚至在领导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中，也一再出现今天自己整别人，明天很快又被别人整的可悲现象。“文革”的积极分子，大多数人在运动未结束时就沦为“政治贱民”；最早设立“牛棚”者，自己后来也多数成为“牛鬼蛇神”而尝到入“棚”滋味。这些被“各个击破”的一批批人，不论开始如何狂热，最后都从不同角度上成为“文革”的反对者。毛泽东临终前也清楚地认识到，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究其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毛泽东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赞颂。相比之下，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受到全国多数人的怀疑、反感，这场运动刚刚结束就被“彻底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令人长期遗憾和叹息的悲剧。

凡事过犹不及。公正地讲，我国社会上一直存在一些应该打击的丑恶现象，被毛泽东所深恶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虽不存在，却也有一批应该清除的腐败分子。毛泽东在发动错误的党内斗争时，也历来强调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矛头只对准“一小撮”。当“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到顶点，“走资派”帽子满天飞时，毛泽东也认为“走资派”并不都是坏人。不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四人帮”之类魔鬼一经放出，事态就不会依照毛泽东的初衷那样发展。尤其是错误地打击了一批人后，必然引起另外一批人的怀疑和反对；扩大化的惯性制导，又会使这批政治运动的反对者成为新的打击对象……如此辗转发展，必然使扩大化愈演愈烈。这样的“天下大乱”，始终也不可能达到“天下大治”，只会发展到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的程度。而且如此扩大化的结果，不仅不能消除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反而会助长其发展。因为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暴烈的行动和“天下大乱”来医治社会弊病，只能给多数人造成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种治疗方式比疾病本身还要可怕。“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只造成人们长期对社会弊病讳疾忌医，正常的批评和反对不良倾向的适当斗争反而不能进行，社会风气比“文革”前要坏得多。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走向反面，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以辩证的态度极为深刻地阐述过以往的成绩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包袱”，指出：“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47页）毛泽东将战争时期的某些方式用于解决建国后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建设，恰恰是由于这种历史包袱过重。当年在战争中，对于抛家舍业、投身革命队伍并参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人们，可以靠一次次政治运动来促进其思想革命化。可是到了和平建设环境之中，再试图单纯地靠政治运动来重塑人的灵魂，结果就越来越不如意。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凭着他的威望来动员群众，再依靠人民解放军，就可以达到改变社会面貌的理想。事实上，他个人的愿望一旦违反了客观现实，同样不能为多数人民在长时间里接受。林彪事件发生后，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动摇，以及随后的抵制反对“批邓”，就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伟大军事家的毛泽东晚年在征途上的探索失误，是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憾事。不过，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毕生不息的探索精神，仍令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深为敬佩。青年毛泽东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起，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当他领导全国人民打碎了腐朽的旧中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后，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出现了直至今日仍为顽症的腐败现象。为此，毛泽东不满足现状，力求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并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态度，希望在他有生之年重新改造中国，为此不惜以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那种方式，再发动一次次的运动，将自己所费无数心血建立起的机构推倒重建，并最终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此诚此情，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感动了全国亿万军民。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令后人叹息的运动当时有那样多的人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我们无疑应该否定，但是对于发动者和参加者的初衷，应该正确地加以理解。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在斗争中形成的许多光荣传统，始终是我们军队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然而对于传统的继承，则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学习以往的传统，主要应领会和仿效其中体现的奋斗精神，而不能照搬和盲目袭用过去战争年代的作法。回顾建国后以军事斗争方式改造社会的经验教训，无疑会留给人们这样的启示。

“现代化、正规化”问题上的蹉跎

1959年国庆十周年阅兵时，在天安门广场前隆隆驶过的是成百辆坦克和由机械车辆牵引的火炮，以及其它技术装备，同时成百架作战飞机掠过广场上空。尤其值得当时中国人自豪的是，这些在那时已经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常规装备，都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尽管这些装备还是仿苏式产品，却也标志着中国军队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飞跃进步。可是在十年之后的196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出现了部队的受阅行列时，出现的武器装备就只是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并由受阅者在广场前表演了刺杀动作。虽然不能否认这十年间我国在“两弹”等尖端武器上有巨大进步，可是这种阅兵的形式却反映了这样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即：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认识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此时已经陷入了一个蹉跎徘徊的误区。

在红军非常弱小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过早地让红军正规化，是根据国情军情而持的正确态度。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迅即提出了建军进入高级阶段的任务，为军队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学习样板是被视为“老大哥”的苏联军队。1952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提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秀的现代化军队”。1953年1月7日，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37页）。在发扬人民解放军自身光荣传统的同时，全军在五十年代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对于促进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在建国时还使用“万国牌”杂式武器，国内连一门重型火炮都不能制造，部队也极其缺乏现代化战争的经验 and 能力，这种状况只用了不到十年就从根本上

改观。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人民解放军的常规武器装备已经基本达到或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国家也建成了整体上配套的现代国防工业，军队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进行的教育训练也有飞跃进步。

令人惋惜的是，军队建设的轨迹到这时却开始出现了马鞍型。1956年苏联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苏联模式的弊病开始被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也开始重新思索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道路，并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上及实践中的探索。这些探索，对开拓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道路有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留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较少参加军委会议的毛泽东，于1958年却多次出席以反对照抄苏联教条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并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号召。反对前一阶段学习苏军时存在的一些瑕瑜不分、机械照办的错误，无疑是对的。勇于冲脱苏联模式，也体现了中国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气概。然而事物在这时又走到了极端。在强调破除迷信之时，实际却放弃了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学习；强调发扬自身光荣传统之时，出现了盲目自大、固步自封的思想僵化倾向；强调破除苏联的教条，却把毛泽东的论著教条化。经过这样一场斗争，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长期在军内不敢再提，只是孤立地片面地突出革命化。这个“革命化”，后来又经林彪之流在“突出政治”中大加曲解，与现代化、正规化对立起来，使军队建设的整个方向出现了偏差。徐向前曾回顾1958年“反教条主义”至“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说：“这时干扰却从‘天’而降，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致使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长期徘徊不前，蒙受的损失简直难以估量。”（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8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五十年代末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不可免地反映到军队内部，不正常的政治斗争日益严重地干扰着军队的建设。1958年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时，又提出了开展“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后来，抓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都被当成“单纯军事观点”，并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将林彪的“四个第一”当作指导思想。这一决议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发行后长期在军内实施，使那种空洞的极“左”政治进一步冲击了军事工作。

进入六十年代后，虽然“左”的错误滋长，毛泽东对军队的教育训练工作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如1964年6月，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的比武表演后，曾极感兴趣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可是当林彪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并以此否定大比武后，习惯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毛泽东又一时听信了林彪的谗言。出于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防范，以及战争年代那种偏重实战训练的习惯，毛泽东改变了自己在五十年代有关军队建设的许多正确论断和决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同意取消了大多数军队院校，许多国防科研单位也停止了工作。研制原子弹的人要扛起锄头去走“五七道路”，体现愚昧的“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等一度代替了日常的正常训练。在世界各国为培训现代化军人都在加强军事院校、抓紧现代化训练时，我国却出现了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怪现象，实在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应该加以区别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是在探索时出现思想偏差，林彪一伙则是故意借“突出政治”之名以售其奸。在任何国度，军事都要服从于

政治，在一向强调政治挂帅的新中国当然更会如此，问题在于此时的政治方向出现了问题。毛泽东当时在政治上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担心党和军队改变颜色，同时又错误地将某些现代科技与西方资产阶级和“苏修”挂上了钩，在军队工作中自然会出现“突出政治”冲击国防现代化，甚至取消某些科学化的工作程序，只迷信“革命化”的状况。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的阴影，笼罩军内许多年，所造成的后遗症还影响至其后的许多年。本来，经过建国后在国防建设中的努力，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及随后进行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前期新中国在军事科技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大缩小。可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差距却又日益拉大。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关心军队的革命化建设重于对装备、训练等问题的重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时至今日，我们军队仍有一个如何确保自己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的政治合格问题，这在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时仍不可忽视。不过问题在于，革命化与正规化、现代化本来不应相互矛盾和对立，尤其是正规化、现代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专利。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这“三化”，孤立地片面地突出所谓“革命化”，不仅会严重影响另外两“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不会出现真正的革命化。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其目标是推动社会加速进步，其中也包括国家科技上的迅速发展。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林彪一伙搞的所谓“革命”，反而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和一段时间的倒退，标榜空头政治也搞坏了军队的风气。“九一三事件”暴露了那伙口头上“最最革命”的人的真实面貌，这也是对那种抽象的“革命化”的一个莫大讽刺。

如果全面地回顾历史，也应指出，即使在国内出现严重动乱的岁月里，作为时刻关心国家安全的毛泽东也反对军队出现“乱”，并且始终重视尖端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和导弹、核潜艇的研制。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关怀，这些项目在六十年代有创世界纪录的突破。如美国、苏联由试验原子弹成功到试验氢弹成功都用了四至五年以上，中国只用了两年另八个月。我国在尖端武器研制上的进步，大大加强了国防力量，对遏制侵略者对我国发动核战争起到了重大作用。对毛泽东晚年在国防事业上的这一贡献，在议论其失误时也是不能抹煞的。

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整体系统，国家的军事实力的增强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仅偏重于某一单项，急功近利，不能在整体上协调一致地综合平衡地向前发展，国家的军事实力增长必然大受影响。即使因领导人的重视“狠抓”某一单项，以“大会战”方式一时使某些武器的研制获得较快的突破，从长久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也必然后劲不足，最终还会慢下来。在我国六七十年代，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再加上对知识分子的某些错误政策，“突出政治”乃至“文化大革命”对科研单位和院校又形成巨大冲击，军队的文化素质一度下降，国防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从整体上大受影响，并出现人才“断档”。这种缺乏综合平衡和未注重整体效应的结果，造成了我国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常规武器的研制严重落后，研制出的一些新产品也因作战系统不配套而难以形成战斗力。这样，常规装备的研制尽管投入不少，其整体水平却长期得不到很大提高。至于尖端项目在六十年代很高的发展速度，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也迟缓下来。

毛泽东在他去世前几年，也痛感到这些问题。“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

沉沙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军队只搞文不搞武，并就加强军事训练和国防科研工作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在事实上开始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1975年，毛泽东虽已长卧病榻，还就改变我国海军和电子战方面的落后状况作出批示，表现出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还关注着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不过，一些正确的措施随后又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断。晚年的毛泽东由于思想方法上的偏差，在军事问题上也陷入一个不能自解的矛盾和困惑之中。他一方面希望通过现代化建设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一方面又担心军队因注重正规化、现代化而背离过去的革命传统。经过“九一三事件”的冲击，毛泽东的身心又已十分疲惫。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总是在与病魔和死神的威胁作斗争，同时也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如意处。心境的凄凉和身体的衰弱相伴，使他难以再去进行新的探索，也无法全面地反省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军队建设上的正误得失。期盼和遗憾，最终全部留给了后人。

毛泽东在国防现代化问题上出现的困惑，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现象，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民族向现代化社会迈进时所难免出现的困窘。作为“四个现代化”之一的国防现代化，必须与其他三个现代化的进程同步前进。现代军事科学要建筑在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及全民文化素质之上，因此它有赖于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准的提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建国时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页）的国度来说，达成这一目标何其艰难！中国革命战争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决定了军队基本成分来自于旧式农民。虽然经过先进的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锻炼，但是旧中国的社会条件，毕竟使他们对如何进入现代化社会准备不足。当然，作为经历了激烈战争的军人，切身体会使他们都一致地感到先进武器的重要，可是在重视这一“硬件”的同时，与之相配套的“软件”即现代化的人才培训及一系列正规化的制度，却在长时间里没有被充分认识。毛泽东一些不正确的主张在军内长期能受到多数人发自内心的拥护，恰恰也源于这一基本弱点。

毛泽东说过，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基本问题即农民问题的着眼点却不尽一样。鲁迅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着重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缺陷，想以此来剖析中国国民性中的病弱一面。毛泽东的著作中谈及农民，则主要着眼于其在革命中的积极性，并根据这一积极性来“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主要是唤起贫苦农民）。正是出于这一着眼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是一个最伟大的成功者。毛泽东确定的政策和纲领，使得被许多人视为现代社会“落后的一群”的无文化、封闭、保守的旧式农民，即鲁迅笔下那些“阿Q”、“王胡”及“小D”等，都在以革命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员之下，投身于人民战争的洪流之中。甚至连“吴妈”之类，也加入了做军鞋、磨公粮的行列。革命战争的洪流会洗涤其身上许多落后性，可是与古代没有多少区别的落后生产方式毕竟限制着他们的视野，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加上把战争年代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在建国后的新形势下绝对化，长期出现了以“大老粗”为荣的反常风气。这种毛泽东也感慨过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实际上也不可免地包围和影响着以“农民运动之王”著称的毛泽东本人。建国后军队建设问题上的曲折发展，不难从这里找到其社会原因。

国防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小农经济滋生的那种单向的、狭隘的思维方式中彻底摆脱出来，这不是修建几座军工厂，引进几件新式武器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保持中国特色和人民军

队光荣传统的同时，必须大力学习和借鉴军事科技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毛泽东没有去过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没有亲身实地研究过发达国家的军队，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及以此为基础制造的武器技术装备缺乏感性认识。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出国是访问苏联，也许是由于身份所限，其间也没有深入参观过苏联的军队。他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弊病，也想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摸索新路，可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种探索就难免会走上曲折的弯路。

杰出的历史人物既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自然的人，研究其生平既应立足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也应研究其个人自然性的生理原因。人到老年通常怀旧，对早年的事件记忆清晰，对近期的情况往往冷漠，在感情上也会特别怀念自己的初恋。一代伟人毛泽东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终究也没有能跳出这一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通览建国后毛泽东有关军事问题的讲话就可以发现，进入六十年代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毛泽东反而越来越多地回顾红军时期的事件，还经常引据一些古书上的典故。尽管解放后进行的历次局部战争对于指导现代军事斗争具有更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可是毛泽东提及它们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越到垂暮之年，毛主席就越怀念夺取政权时那些激烈战斗的岁月，往往动情不能自持。1976年初，毛泽东在他一生中看了最后一场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城的镜头时，泪如雨下，服务员被迫未待终场就将他用轮椅推走。

毛泽东晚年执着的“政治初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早年接受的瑕瑜并蓄的种种政治思潮，以至在治国时采用了许多带有空想色彩的措施；毛泽东晚年念念不忘的“军事初恋”，则主要是他刚刚从事武装斗争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并在许多问题上以此来对待时过境迁的现代军事问题。领袖终身制所带来的弊病，作为政治体制中的胆固醇，愈到老年往往愈造成严重的危害。这一点，在毛泽东晚年对军事问题的决策上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这也是历史和中国的社会条件给一代伟人身上造成的难以避免的局限。

从扛犬旗、打头阵中悟出的深刻教益

“要准备打仗”这一口号，六七十年代走入中国社会的人都不会陌生；“世界革命”的豪言壮语，也是那一代人都耳熟能详的。作为伟大军事家的毛泽东在晚年的一项重要失误，还在于对国际上战争和革命的形势估计出现偏差，以至于在国际上扛大旗、打头阵和在国内多年进行过分的战备行动。如今，经历过长期浓重的战备气氛和“慷慨无私”援外的人冷静地反思，既会对这一时期我们国家走过的曲折道路感叹不已，同时也能从中悟出一些非常有益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火中诞生的，后来又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长期敌视和包围封锁。在这种形势下，坚持进行反帝斗争，对世界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适当的支持，并在国内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都是维护我国安全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所需要的。可是，新中国又是一个长期未摆脱经济落后面貌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发生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经济建设，对外斗争和国内战备应服从这一前提。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偏离了这一正确前提，援外工作和战备行动超过了可能与需要，反而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正常的社会生活。

自从资本主义出世以来，世界上的事物就已不可分割地联成一体。确定中国对内对外的正确政策，首先需要对国际形势有科学的判断。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虽身在穷山僻壤，却时时关注世界风云变幻，以致斯诺、斯特朗等外国来访者与他交谈时，对毛泽东如此熟悉天下动向都感到惊讶。指明中国革命方向的名篇《新民主主义论》，正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特点出发，精辟地分析和确定了革命斗争的目标和任务。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也是根据国际上美苏对立，“中间地带”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新形势，敢于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利用美苏对峙的间隙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又有过非常英明的判断。五十年代初期，东西方进行“冷战”，国际上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军事集团剑拔弩张地紧张对峙，“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说甚嚣尘上。此时的毛泽东却表现出高度的冷静，认定和平因素超过战争可能，并由此确定了有关我国周边安全及国内备战方面的一系列正确措施。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科学的判断，毛泽东敢于下决心出兵抗美援朝，随后又及时主张以和平谈判的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能够以主要精力投入经济建设。

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并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国内外许多人估计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毛泽东仍认为：“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坚固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8页）1951年秋，当朝鲜停战谈判刚刚开始，战局虽稳定而战斗仍在进行之际，毛泽东就毅然决定改变国家的临战状态，并进行大规模复员。1952年间，尽管朝鲜战争未停，国家经济建设的开支却超过了军费开支，全军总数也由626万人减少到450万人。这种独具慧眼的判断和当机立断的决心，使我们国家抓住了宝贵的时机进行经济恢复，并在朝鲜战争期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有了明显的缓和趋势。1956年，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同上书第270页）此后，毛泽东又下决心进一步减少常备军数量，并降低国家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的比重。人民解放军全军在1958年已经裁减到只有237万人，达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也只占10%左右。虽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因指导思想的问题出现严重挫折，但是减少军费开支以增加经济建设投资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军队员额虽然减少，但是由于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国防工业及科研力量大大增强，我国的整体军事力量仍在以较快速度发展。

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总的国际形势是对抗与和平发展并存，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开始了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巨大转换，亚非拉一些国家虽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世界性的革命条件并不具备。这时，刚刚经受了“大跃进”的挫折，经济还比较落后的中国本可以利用美苏仍尖锐对立，社会主义阵营破裂后国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及第三世界力量兴起的有利环境，多方纵横捭阖，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地位，并韬光养晦地发展自身实力，可是恰恰在这一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出现了判断失误和理论上的迷

茫，对世界性的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都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也一时不幸地蹈入了误区。国内人民节衣缩食积蓄起来的许多财富白白浪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在国际上新技术革命兴起的大潮中失之交臂，在世界战略格局上我国还一度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人们不会忘记当时中苏两党进行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至今，我们不必再细论双方的观点，仅就论战的主题而言，就说明双方还都在坚持共产国际时代树立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观念，并把自己认定为正确的路线视为他国党应该遵行的准则。其实，三四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就已经说明了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形式在其解散前即已不适用，各国党早就应该根据本国的情况确定自己的路线，根本不应该再去确立一个国际共运的“总路线”。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抵制苏共以“老子党”自居的大国沙文主义，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像当年第三国际对第二国际那种态度，对“修正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在国际上扛大旗，把自己视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陷入了误区。由此不仅背上沉重的援外负担，对国际形势的思想认识也陷入了极“左”的迷茫之中。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一些同志就国际问题提出过正确的见解。如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建议，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应调整对外方针。王稼祥还具体提出，应确认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争取有利条件加快建设速度；为了争取时间，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我国的对外援助必须量力而行，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然而毛泽东却批判了王稼祥所代表的这些正确思想，将其称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革命援助要少），并提出：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及马列主义的派别。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7页）。

中国作为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反对一切侵略和民族压迫的国家，自然应同情和支持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当时，中国支援某些进行反帝斗争的国家，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维护我国安全的角度看，都是有益的。但从根本上讲，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本国社会发展的自身产物，主要应靠自力更生，中国的支援主要应在道义上。可是当时由于有那种扛大旗、在反帝斗争中争打头阵的“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心态，加上对民族运动的两面性估计不足，对其在反帝的同时可能滋长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未很好注意，对受援者有求必应，援外的数量完全超过了我国国力的许可，有时也超出对方的实际需求。当时，在憎恶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又叭“不当军火商”为原则，援外武器和多数物资都是无偿的。在六十年代前期我国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援外的金额就超过了偿还苏联债务的总额。这种过分的援助，不仅加重了我国军民的自身负担，影响了国内的建设，也助长了受援者不正常的依赖心理。一旦我国不能无休止地满足其欲望，有些受援者还反目成仇。这种“花钱买仇人”的可悲状况到了毛泽东逝世前后，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在六十年代，伴随着“反修”斗争日益升级，毛泽东对世界大势的估计也有了新的看法，认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1986

年版)。由于认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寿命不长了，随后又估计不久就会有埋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总决战，对内对外的许多工作也以此为前提进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以精辟的论据批判过“速胜论”，可是在这一时期里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从1965年起，我国国内宣传中就将“世界革命”当成现实任务提出。毛泽东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历来强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两个拳头打人，此刻却一度走到同时高喊“打倒帝修反”，四面出击、多方树敌的道路上去。这不仅使援外工作大规模升级，而且因暴力革命与战争紧密相联，准备世界性的革命就必然要设法应付世界性的战争。尽管在“左”的思想最泛滥的时候，中国也从来没有打算对外发动战争，但是对外部向我国发生战争的可能却长期做出了过高的估计。

除了对“世界革命”不切实际的估计外，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周边环境恶化也是实行过火战备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和苏联都对我国实行战略包围和“遏制”，但是它们双方紧张对峙，以争夺为主，各自的战略重点又都在欧洲，难以联手或单独大规模进攻中国。在我国周边制造紧张局势，主要是它们对我国施加压力和进行威胁的一种手段。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中国，这时却容易比国力较强的一方作出更紧张的反映，加上长期的封闭状况，更会助长错误的判断。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会犯20年“左”倾错误》一文中曾指出，“左”的错误一般都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他还认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1950—1970年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这种“过火反应”表现在军事问题上，就是长时间将应付战争作为国内各项工作的中心，以致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从六十年代中期完全改变了他在五十年代对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的估计，并在很长的时间里将战备放在经济建设的位置之前。1964年春，国家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原称“吃穿用计划”，即准备着重解决人民生活问题。这一计划草案原已得到毛泽东同意。同年8月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的“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马上改变了这一计划，随后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以战备为中心。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又特别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七十年代初毛泽东还强调：准备打仗！准备帝修反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一代人的和平（引自《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5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上已经陷入建国后最为不利的地位。虽然内乱有所缓解，可是在北面与苏联的对峙处于剑拔弩张的战争边缘，在南面又进行大规模的援越抗美，西部对印紧张关系未缓和，东部还要警惕台湾当局的窜犯。为此，在战略上就不能不准备“应付四面八方”。由于全国进行临战准备，六十年代中期军队总员额增加到500万，到七十年代前期竟一直保持了600多万人，超过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军费和直接的国防开支即占四分之一左右（还不包括与国防有关的三线建设和人防工程等），而且多年如此。当世界各发达国家都注重发展沿海的、外向型的经济时，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投资方向却转向交通闭塞的“三线”，自家积累的很有限的资金大量投入“山、散、

洞”式的建设之中。其结果不仅浪费惊人，而且已建成的企业大都经济效益低下，留下长期的后遗症。这一时期，我国的军费开支虽大量增加，却由于大量用于“人头费”，军队结构中又以装备落后的步兵部队占多数，国防科研力量削弱，国防工业水平提高缓慢，加上国家整个经济状况不好，实际上我国的整体军事实力并未增强。事过多年后人们才痛苦地悟出，过度的战备所造成的损失，有时并不比忽视战备为小！

种种无情的客观现实，使不切实际的“世界革命”的热潮不能不逐渐减退。七十年代初，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出发，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以小球带动全球，与不久前还为头号敌人的美国领导人握手，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作出的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之一，体现了在国际斗争中尊重现实的实事求是态度，这也是毛泽东的智慧光辉在晚年的一次闪烁。这一将我国安全利益放在首位的行动，不仅在国际问题上开思想解放之先河，也摆脱了一度应付四面八方的困境，大大缓解了我国周边的紧张局势。

对于过火的战备措施，毛泽东晚年也有所认识。1975年，毛泽东看到军队难以长期处于“弯弓箭不发”的临战准备状态，部队员额过多也严重影响国家建设和军队自身建设。因此，他同意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所提出的“消肿”建议，赞成降低军费在国家开支中的比例，减少部队员额，同时还发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这些，同样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在出现全局性的错误时，在某些问题上还能纠正偏差，并表现出求实态度。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在他临终前已经无法从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全面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改变对国际形势不准确的判断。正确地判断国际形势，将军队工作转向和平建设时期的轨道，最终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完成的。

毛泽东晚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失误，以及由此采取的一系列过分的战备措施，有着理论上和社会实际中的复杂原因。其中不可忽略的一项重要原因，也在于缺乏民主所造成的言路不畅。毛泽东曾对外国人说，自己每天主要看国际参考。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党内民主生活日益不正常，说真话动辄获罪。不能不严重影响到对国外情况的反映。一些驻外人员的汇报，不少外部资料的编纂，乃至国内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往往是根据领袖的喜好而发。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脱离群众和实际的领导人难免的通病，即他们看到、听到的情况反映常常并非实情，而是自己想听的话，一向最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晚年恰恰由于人为造成的墙，与客观实际隔绝开来。他始终充满推动革命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热情，同时还时时保持着关心国家安全的警觉，这些确实难能可贵，然而主观上良好的愿望，却未导致客观实际中如意的后果。

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晚年，因在政治上不幸踏入了误区，在从属于政治的军事问题上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相对而言。在毛泽东晚年出现全局性的错误时，军事问题上出现的偏差比其它方面要好一些。经历过长期戎马生涯的毛泽东，在有关战争的问题上还是始终持谨慎态度，并在一些军事工作中仍有过去的求实精神。像经济战线上“大跃进”那样以浪漫代替现实，以及“文革”中“天下大乱”的情况，在军队中毕竟还未仿效。毛泽东坚持国际主义，但是他更坚定地维护我们民族的利益，以致苏联领导人长期攻击他是“民族主义者”。在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毛泽东是坚定不移的。即使国家处于曲折发展的岁月中，以及在大动乱的年代里，毛

泽东始终要求军队稳定，确保军队一直成为共和国的坚强柱石，从而使我们国家未受外敌大规模入侵。不论如何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论如何研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对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正确之处始终应该肯定。

重新寻找毛泽

东经历了改革开放十余年的风风雨雨，自八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大地上重新兴起“毛泽东热”。久违多年的“红太阳颂”又在街头回响，毛主席像高悬在汽车上，毛泽东的书和描写毛泽东的书又畅销起来……这种民间自发的风潮，不仅反映了许多干部群众对社会风气特别是种种腐败现象不满而出现的怀旧情绪，更多的还是对探寻未来发展道路的前瞻。许多人在盲目模仿西方碰壁之后，又深切地感到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古老传统的泱泱大国里必须有适合特殊国情的政治经济方略，于是又回头查找认识中国国情的理论武器，并对真正出自于中国大地且有巨大精神魅力的领袖毛泽东重新产生了崇敬之情。

与社会上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出现的否定毛泽东的思潮相比，在军事系统内，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所受的非议还是较少的。然而，社会开放的大潮不可能不冲击到军事领域，一方面是某些人仍坚持“凡是派”式的僵化态度，不肯全面反思毛泽东的功过，并自诩为朴素的感情；一方面则是少数人全盘抛弃毛泽东的理论学说以及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历史传统，如同当年“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一样，走上“言必称西点”，奉外国的军事学说为神明的邪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现象又恰恰是前一种现象所促成的另一个极端。为了使我国国防现代化的艰巨事业更好地开拓前进，很有必要肃清这两种倾向所形成的障碍。近年来，人们在思想上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在现代化建设的宏大系统工程中，仍需要寻找毛泽东。这种寻找又不能是“三忠于、四无限”式的盲目崇拜，而应是从理性出发，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正确分析和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事物的武器。同时，还应该以毛泽东本人极为丰富的实践为参照值，为我们在变幻的国际风云及国内社会结构大震荡的正途歧路和漫漫里程面前，选择达到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最优途径。

我们谈到的毛泽东晚年在军事问题上的失误，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解释，当然不属于我们应该遵循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但是，作为毛泽东个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却都是我们在今后的道路上应该吸取和借鉴的宝贵财富。因此，除掉过去毛泽东身上笼罩的“神”的迷雾，向广大军民还原其本来的形象，是学习和借鉴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性的伟人，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踏踏实实地立足于中国大地，深入地研究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又如饥似渴地吸收了由国外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事实，那就是自近代以来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英美资产阶级曾最起劲地向古老的神州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念，可是在中国社会上一直并没有多少市场。恰恰是源出于德国并转经俄国输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唤起了中国最广大的进步人民。而他们革命的主要对象，也正是仿效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并与中国封建势力“中西合璧”的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同样都只需要适合自己战斗的思想武器。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的饱学书生，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知行并重的实践家，毛泽东能够对外来的理论学说按照中国最广大人民的需要进行消化和再创造，从而提出富有巨大的实践感召力的思想理论。毛泽东的一系列军事学说，正是其中最光辉的典范。从未进过军校的毛泽东在指导战争中却有举世震惊的杰出成就，就是理论应用于实践并能使最广大民众接受的最好证明。那些沉溺于外国兵书经典、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军事家，不论如何抵毁毛泽东，在历史事实的成败检验下，他们的理论武器及其在实际中的成效在毛泽东面前是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将战争放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并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晚年在军事问题特别是国防建设上的失误，恰恰也是因为在政治上陷入了误区。毛泽东作为一个凡人，又有其自身无法摆脱的一些弱点，这也是我们这块独特的土地上给任何人都会留下的与生俱来的胎记。

在我们古老神州的万里沃土上，千百年来哺育出多少威加海内兮的风流人物！他们各领风骚，却又冲不出各自时代的局限。恩格斯在谈论历史人物时说过：“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5页）毛泽东是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军事家，他所处的环境及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是本国传统的影响，中青年毛泽东的探索之艰辛，成就之伟大，以及晚年毛泽东的某些失误，无不是环境和时势所造就。不论辉煌与阴影，功业与惋惜，光荣与失误，都可以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找到影子。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基础农耕结构，特别是其千年不变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既要求以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方式进行治疗，同时也为其对立面即割据势力的产生提供了基本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反抗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农民战争、争夺皇权的残酷厮杀、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的争斗和地方军阀的混战，以及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的冲突引起的民族战争，历朝历代持续不断。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式样之复杂，都为世界古代史上所罕见。正是通过对如此丰富的战争实践的总结，中国历史上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兵书典籍，才出现了直至今日还令国际上许多人士赞叹不已的《孙子兵法》等一系列军事艺术的瑰宝。可是，长期停滞的生产方式及其造成的军事斗争手段改进的缓慢，又使中国传统的军事学说重于思辩而轻于技艺，这些对中国近现代军事科学的进步也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近代的中国过于贫弱，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巨大反差，使中国的领导人容易出现企图一举改变国家面貌的急于求成的心理。“大跃进”一词的发明者，恐怕应归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自投身革命战争起，就以深邃的目光探索着胜利的方向，并向全党全军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具体行动中，毛泽东却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谨慎行事。正如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早期的文章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有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6页）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以“诸葛一生惟谨慎”式的精神，从不弄险以求侥幸。可是建国之后，当他成为一国的当家人，国家间的强烈反差和历史使命感，又使他犯了自己过去一再批评过的革命急

性病，如确定若干年超英赶美的具体日程表等，恰恰是违反他过去正确论点的举动。

明白了这些，人们就不难悟出，古代中国为什么能在军事舞台上演出举世无双的如此丰富的战争剧目，近代中国却为何又在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此步履蹒跚；作为万里长征第一步的革命战争是那样的势如破竹，而建国之后国防建设却曲折反复。这些，都可以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影响中找到答案。毛泽东属于中国，他是中国历史的自豪和骄傲，他身上同时也有中国历史的重负。我们学习毛泽东，要学习他伟大的爱国主义胸怀和民族精神。至于因长久的历史积淀在伟人身上所造成的某些弱点，则是要正确地加以认识，并在今后现代化的道路上注意引以为鉴戒。

有探索就会有失误，勇于试验的失败者仍然值得敬佩，并远非株守坐待而平庸无过者可比。毛泽东曾以超出常人的胸怀和魄力，以及诗人的浪漫，在战争舞台上导演出举世惊叹的雄壮活剧。可是，当他的思维轨迹偏离正途后，也出现过凡夫俗子所不可理喻的失误。当然，毛泽东晚年在军事问题上的失误，与他一生在这方面的辉煌业绩相比只是白璧微瑕。

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一项极其复杂艰苦的社会整体系统的再造过程。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现代化，也只有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才能完成，而这一完成又必须很好把握历史传统与未来要求二者的结合。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革命战争造就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的基础之上，迫切需要注意继承和发展并重。毛泽东的个人活动，恰恰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最生动的榜样。同时，在这一历史转换过程中，我们会遇到种种挑战，会面临种种选择，需要真正有效的思想武器。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个人的名字命名并代表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又是其他思想所不能替代的有完整科学体系的学说。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不朽，并不在于毛泽东等老一辈军事家指导战争成功的某些范例，以及当时的具体工作方针，而在于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观察、认识 and 对待军事问题的方法。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武器技术和战争式样如何发展，这些基本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是长久适用的。对于将经历世纪交替的一代人来说，寻找毛泽东，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并以此更深入地理解其思想，将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当年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一项伟大的探索，如今在改革开放中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同样也是一项新的探索。道路尽管曲折，前途却无比光明。毛泽东在他刚刚点燃星星之火时，就以满腔激情描绘斗争胜利的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6页）以同样的豪情看待我们奋斗的前景，将会激励我们升华时代精神，高扬民族自尊，继承前贤，启发后昆，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及人类进步事业努力作出较大的贡献。

后 记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一个幽灵，毛泽东的幽灵，就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在清末和民国时代出生，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的人们，其生活的欢乐和痛苦、事业的荣辱与成败，大都曾与这个历史伟人的思想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从太平洋彼岸那个金元帝国的历届总统，到北方强邻的各位首脑，也时时关注着这位虽出自“一穷二白”之国却有着独特性格和惊人魅力的中国巨人。不论是他的崇敬者，还是他的朋友或同情者，甚至是他的敌人，在许多时候都不能不承认他的威力和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对于当今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始终是心目中最伟大的领袖，其神圣的位置是多少年里无人能够替代的。作为“载舟之水”的中国亿万普遍群众始终崇敬毛泽东，是因他们将自身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归功于毛泽东。毛泽东在世时，我曾倾听过无数来自旧社会的工农颂扬毛泽东如何解放了他们，虽说感激之情中可能还带有点个人崇拜和迷信的色彩，但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经历过“文革”浩劫和痛定思痛的反省后，我看到多数老一代普通群众仍然尊敬毛泽东。不论经历过什么生活曲折，包括“三年困难”和“十年动乱”，那场伟大的中国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还是这些人毕生最为难忘的幸福，而中国革命又是与毛泽东的名字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建国之后，中国人民在五十年代和“文革”前几年又曾经历过社会上返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圣洁时期，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性善”和物质上的寡欲不一定有利于刺激经济，可是人们在道德上无疑却要对此倍加赞扬和怀念。不久以前，笔者曾问过：“打的”的老年人，为什么他们信任挂毛主席像的司机？回答是，按照常人所思，挂这种像的人可能是毛泽东的信徒，就应“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一般不会“宰人”。

毛泽东作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一斗争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一生中有过许多敌人。然而，他那深刻的洞察力、坚毅的性格和机敏的谋略艺术，以及作为斗争胜利者的成就，使其有头脑的对手也不能不佩服。作为毛泽东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尼克松访华时，出自内心而非客套地当面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笔者也曾参观过号称世界最大艺术殿堂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二十世纪艺术展的人物肖像中，只有一幅巨幅领袖像——毛泽东像。在美国、日本的军事院校中，我也看到毛泽东的著作至今仍被作为重要的参考书。美国的一些史学家和老军人曾对我表示过，中美两国过去在战场上曾是敌人，然而正是经过朝鲜战争，美国才真正将中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通过实际较量才从内心佩服中国军队及其统帅毛泽东。许多西方人当然不会赞同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但是任何客观地看待和尊重历史的人却都会尊重毛泽东。

如果全面地看待历史，尽管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晚年有种种过失，但也能看到他曾为病弱古国振军威，曾为几亿人民增光辉。虽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不能仅将这些视为毛泽东个人的作用，可他确是功彪史册的辉煌业绩最突出的代表，是如此多娇的江山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仅从功名成败而论，数千古风流人物，以平民之身而能统一天下者，中国历史上除刘邦、朱元璋外，只有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其雄文卷卷，武略盖世，也无怪乎从饱学之士到目不识丁者都曾对毛泽东顶礼膜拜般的敬仰，将他视为中国的自豪和骄

傲。

如今，毛泽东虽离开人间已有十七年，可是历史伟人的去世，只意味着他个人的呼吸、思维的停止，却不表明其思想及精神的消失。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并以他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几代人。一些西方人过去曾讥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教育是“洗脑”，事实上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头脑只能靠环境改变，决非单纯的宣传教育可“洗”。过去，广大的中国人热爱毛泽东，恰恰是其所处的革命与战争的历史环境所造成。在今后的和平发展时期内，对适合中国特色的理论武器的呼唤，也使新一代中国人敬重并以理性的态度去重新寻找毛泽东。

笔者曾与许多过去的老将军、老战士及当年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论过毛泽东，深深感到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一代人虽然历经曲折磨难，其中也有毛泽东晚年某些失误所造成的原因，但他们却始终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并永远崇敬毛泽东。这是因为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奋斗和成就，都与毛泽东领导和代表的事业紧密相连，否定了毛泽东也就是否定了自己。特别是那些曾驰骋疆场的老一代将领们，无论他们的个人风格、习性和知识结构有多少差别，可是观察和对待政治军事问题的思维方式却近乎一致，即：都遵循着毛泽东过去教诲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不了解毛泽东，就不知道党和军队的过去，不会真正知道我们今天起步向前开拓的基础。

我们这些在共和国旗帜下出生，在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政治教材的年代中成长的一代人，对毛泽东同样有着特殊的情感。在那大动乱的年代里，我们曾将纯真的激情和最宝贵的青春付给了悲剧性的内耗。然而。在那一生最壮丽年华中，我们在人间正道沧桑上的追求，以及对虽未实现却不失其绚丽的未来理想的憧憬，毕竟也是在毛泽东的指引之下。“寻找毛泽东”，也就是寻找我们那些带有理想主义光辉的美好精神境界。在商品经济泛起的拜金主义大潮中，人们往往更需要这些代表真善美的东西。“毛泽东热”在中国土地上兴起后，许多中年人同样为之动情，并感染了并未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新一代人也去了解这位伟人。

世人都是以自己的心态来了解和对待领袖，如同读《红楼梦》一样，道学家、才子和革命家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作为新一代的军人，从毛泽东身上看到的主要是他那曾改变了中国和世界面貌的战争业绩，并思索着这些业绩如何能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军事舞台上再度辉煌。缅怀和追寻毛泽东的足迹，也恰恰是探求我们自己在现实和未来最重要的参照值。过去看到井冈茅舍、延安窑洞，往往只给人简单狭义的艰苦奋斗的教育。其实，毛泽东所创立的井冈风范、延安精神博大精深，远不是穿草鞋、自己动手开荒生产等具体形式所能代表的，它还包括不拘本本、一切唯实的思想解放，以及发扬民主、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尽可能发展经济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冲脱僵化的教条去回顾这些，无论对经过传统教育的人或是刚刚涉足社会和军旅的人，都将会使其受到极为生动的教育。

毛泽东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国家几代人需要认真学习和从中吸取精神财富的宝贵源泉，也是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不应缺少的基础课。如今的人们学习毛泽东的伟大理论，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像当年“天天读”那样背熟某些语录，套用某些论断，而重在掌握如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观察认识

事物，用以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如今学习毛泽东的伟大实践，也不能照搬过去的一些做法，主要应仿效他终生不倦的探索精神，勇于开拓和进取。

岁月无情，逝者如斯。听过了本世纪上半叶革命和战争的主旋律，又有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本世纪下半叶，我们这个国家和地球上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现代高科技的成果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我们军队在过去战争年代的许多拿手好戏在新条件下会失去以往的光辉，变成隔日黄花。例如，在敌方拥有大规模杀伤兵器的情况下，仍沿用过去集中兵力于敌多少倍的老办法，以庞大兵团用于一狭小战场，势必为人刀俎之肉。再如：毛泽东曾长期强调发挥我军擅长夜战的优势，而在如今对手拥有先进的夜视器材的情况下，夜战就不一定是自己的优势，甚至可能利敌而不利我。毛泽东“本本”上的现成论断和他当年指挥作战的许多方式，有些显然应加以改变。毛泽东在建国之后提到过去克敌制胜的十大军事原则时，也曾说过：“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75页）我们讲继承，讲发展变化，变中亦有不变。那就是，具体战法应该紧紧追随世界科技发展而不断变化，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的原则是一切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始终应遵循的。

要学习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仅仅知道实事求是的原则还不够，应该进一步掌握其在军事领域“实事求是”的方法，即军事辩证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名篇之所以不朽，正在于在军事领域中处处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掌握了这些，才会终身受益。例如，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研究战争特殊规律的方法，来分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内涵及其规律；我们也应该以《论持久战》中的辩证观点，预测中国国防建设的进程；我们还能学习《论策略》等名篇中所阐述的斗争策略和艺术，在国际战略舞台上掉圈纵横，争取对我国最有利的地位……总之，“毛泽东热”的正确方向，不应只限于让人知道这位老人家当年喜欢吃红烧肉、睡木板床，而应在更高层次上启迪人们效法毛泽东的理性思维，改变时下因追求物质而带来的精神匮乏，以正确的思想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目前，改革开放的大潮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人们的观念，毛泽东当初进行实践的环境与今日相差已不啻天渊，然而有一点是相似的，即都在进行着一种前无古人的无模式可循的求索。20岁的毛泽东以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之志，曾将屈原《离骚》中的名句引为座右铭：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同样，在今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使中华民族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防而奋斗的道路上，我们从毛泽东身上所能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不也正是这种求索精神吗！

笔者多年来一直有志于研究毛泽东。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应中央文献出版社之约献上此书。本书是为了纪念军事家毛泽东，却又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毛泽东，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力求以符合现代要求的思维方式，真正全面地分析并历史地还原这位伟大军事家过去的思想和实践过程，并从中揭示其宝贵的精神实质，对现实和未来提供一点启迪。因而受命以来，既感

已偿宿愿，又觉运笔维艰。

驰名世界的名著《君王论》的作者马基雅维里在该书献词中曾说过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风景画家如想描绘山岭与高地，那就得置身于卑谷；如想纵揽广野平原，那就得高踞山岭。同样道理，要彻底了解人民的性质，必须是一位君主；而欲知君王们的性质，却必须是一个平民。”时代的进步，使今日任何作者都可以求实之意畅论领袖。可是要真正写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却仍如马氏所言。笔者因个人的经历及职业原因，既从卑谷举目仰视过，又探足过从山岭俯察的角度。当我作为中学生、山乡插队知青和连队战士时，眼中的领袖和统帅确有高不可测的决策术和诸多难解之谜；可是当我进入历史殿堂，亲手翻阅最高领导人的浩瀚原始文稿，并与有忘年交的熟悉毛泽东的老人们坐而论道时，又发现毛泽东经手军国要务时，也同凡人一样思考和处理问题，其功过是非亦在情理之中。于是，键盘上春秋一度，有此拙著问世。虽然有种种自己不满意之处，作为一种尝试还是奉献于读者，并希望老一辈、我的同代人以及年青一代不吝指正。

无论是在书本上或是在实地探寻一次毛泽东，都会感到大有收益。笔者因从事研究和本职工作之故，多次去过井冈山及延安等地。每到毛泽东当年的故居，总是感触良多，浮想联翩。在井冈峰峦之上，笔者曾不避拙陋，步苏东坡《赤壁怀古》之韵填《念奴娇》一首，在本书结尾之际，特抄录于此为纪：

浩茫竹海，连云汉，藏卧天华万物。
凭吊旧踪，五哨处，众志成城铁壁。
赤帜惊空，锤镰动地，忠骨堆如雪。
绿荫松风，放歌一代英杰。
润之先生当年，朱彭汇聚了，哀兵励发。
草履粗衫，弹指间，百载苍龙灰灭。
兴国雄图，关山犹逶迤，征尘染发。
平生奋勉，此诚长昭日月。

最后，对为本书的完成提供过许多帮助的老前辈、学术界同仁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谨表谢意。

1993年6月

